

【编者的话】

还认为中国是世界发展最快的新兴经济体吗？印度已经悄悄将我们超过。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2010 年，印度 GDP 增速达到 10.4%，中国的数字则是 10.3%——这是近三十年来印度经济增速首次超过中国。此外，依据两国官方机构的经济数据预测，中国在未来五年的 GDP 增速预计为 7%，而印度则将达到 9%。美国花旗集团则预测，到 2050 年，印度将超越美国和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对于中国人来说，印度绝对是一个需要重新认识的国度。也许，你早已惊叹于宝莱坞电影《三个傻瓜》带来的震撼，早已听说印度 IT 行业的发达，甚至还对印度的民主政治有所耳闻，也读到过最近印度瑜伽大师拉姆德夫发起绝食抗议运动的新闻……但是，在你的潜意识中，是不是依然认为那是一个贫穷、脏乱、不开化的国家？

本期周刊将用七篇文章刷新你脑袋之中那个刻板的印度，它们将由表及里地展示这个南亚国家的各个侧面，并不断提醒我们：在观察中借鉴和反思。

鄢烈山和秦轩的游记是两篇感性化的开场，你会看到许多有意思的细节，以及个人化的感受与思索。秦轩文中所提及的“为什么想去印度”更是诠释了本期周刊选择印度为主题的目的。

在第二部分，我们将着重关注印度的非暴力抗争。摘自《非暴力抗争一百年》的《印度：自治运动》梳理了印度独立运动中非暴力抗争的历史，虽然由甘地领导的非暴力运动未能赶走英国人，但却撕碎了英国统治的合法性，让印度人民认识到反抗的必要。林达的文章则指出非暴力抗争的危险，“作为一个政治手段，非暴力抗议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号召者并不能因为‘非暴力’三个字就占据一个永远不错的道德高位和自诩‘政治正确’，不能因此就可以不负任何责任。在预见对方可能使用暴力，可能导致大量民众流血牺牲的时候，领导者是应该有所顾忌的。”此外，《印度的死亡在乡村》以印度水坝建设给印度乡村带来的灾难及乡村的抵抗为主题，呈现了一个可资国人自省的案例。

随后，你将读到对印度学者阿希斯·南迪的访谈，他对中印发展的对比，对印度民主政治的解读，对中国当下热点问题的评价，都切中要害。

最后，我们选择许知远的文章作结。对于印度这个主题而言，他的文章并不是最全面的，也不是最深刻的，但他在不长的篇幅内尖锐地提出了令中国人感到尴尬的问题，留给我们许多掩卷思考的空间。

1510 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每周出版一期，通过网络发布，所有非一五一十部落的文章均经过作者或首发媒体的授权，期待大家的关注和建议。

目 录



【望】

7-1 鄢烈山：隔着车窗看到的象鼻子



“中国发展基金研究会新近发表的《中国发展报告 2010》坦承，我国的‘土地城市化明显快于人口城市化’。印度则相反，人口城市化明显快于土地城市化。显然这是由现实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公权私权力量对比强弱不同等因素而形成的。”

一、 心仪神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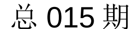
印度诗人泰戈尔 1916 年在致异国友人的信中写道：“我对广袤的世界充满着思乡之情。”所谓故乡，无非那里有载记着我们熟悉的故事的器物景致，历久而弥新；有我们敬重的亲友师长的身影足迹，虽逝而永在。在这个意义上，印度最是我思念的“故乡”。

从西天取经说起

“西天取经”是我们自幼就熟知的故事；上印度文学课才知孙悟空脱胎于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的神猴哈努曼。与热衷“少林功夫”不相干，1990 年代初，研究明代异端思想家李贽时，我寄情李氏所宗心学的源头禅宗的始祖、在中土首倡“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天竺僧人菩提达摩；在广州的闹市步行街“上下九”，伫立在纪念达摩东渡的“西来初地”牌坊和“西来古岸”的碑刻之前，徜徉在“西来庵”（今名华林寺），不禁浮想联翩。

我虽不是佛教徒，也念诵“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的《金刚经》，冥想那“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师徒讨论佛法的盛况。我知道，恰如著名印度学者阿玛蒂亚·森的论文集《惯于争鸣的印度人》第八章“中国与印度”所说，在公元第一千纪期间，中印互动的并非只有宗教和古已有之的商贸，还有数学、天文学、医学、建筑学等等，更有双方破除自我中心而向外看的世界观改变。

不过，我仍想有机会时参加印度及尼泊尔的佛教“朝圣”（文化寻根）之旅，在释迦牟尼悟道成佛的菩提伽耶，瞻仰巍峨的金刚宝座塔（大觉寺），拜谒释迦牟尼的诞生地蓝毗尼园



（Lumbini）、第一次跟五比丘宣讲佛法的鹿野苑， 以及他的涅槃之地拘尸那罗。遥想菩提伽耶，既是印度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阿育王成长的地方，也是今日印度国父圣雄甘地发起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之地。

而倡导众生平等的佛教，在印度本土虽被印度教教义部分吸收，早已衰落，仍是低种姓的印度人争取平权的社会政治武器。“贱民”出身的著名学者、印度独立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安贝德卡（Ambedkar）博士，曾于 1956 年带领数千追随者改信佛教，抗议种姓制度的惯性存在。

据多次访印的郭宇宽先生介绍，安贝德卡博士在印度独立后被任命为宪法起草委员会的主席，今天被称作印度的宪法之父，作为平等理想的偶像，在印度的每一个村庄都能看到他的塑像。(9 月 15 日在孟买访问印度科技学院 ，看到会议室主席台上方并排挂着三人的画像，居中的甘地和左侧的尼赫鲁我认识，右边穿西装打领带戴黑框眼镜的是谁呢？有同伴告诉我，他就是贱民出身的那位“印度宪法之父”。)

朝佛之旅当然不能不去那烂陀寺。那里是“唐僧”玄奘师从戒贤法师，悟道并说法多年的地方。另一位如今鲜为人知的大唐“三藏法师”义净也在那烂陀寺学习 10 余年。玄奘是从北方穿越沙漠经帕米尔高原入印，而义净是在玄奘逝世 6 年后坐船出海，经苏门答腊到东印和中印参访、修学，游历了 30 多个国家，历时 25 年，取回经、律、论 400 余部。他们殊途同归的，是对智慧与真理的不懈求索。

对“舍身求法”的人该心存敬意

我们可以是无神论者，不信仰他们的教义，但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对于那些“舍身求法”的人总该心存敬意。“求法”当然也包括求法之弘扬，如佛教的“普度众生”。我在写《李贽传》时，专门写了一节他与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的三次会晤。目空古今的李贽对人赞叹利玛窦是“一极标致人，中极玲珑，外极朴实”，称赞他的汉语作品《交友论》定义“友者，乃第二我也”，“其言甚奇，亦甚当”。

这个出身名门的意大利人，奉父命进了神学院，为求法传道到印度南部、阿拉伯河东岸的果阿，在那里的耶稣会亚洲传教中心修习四年，然后奉派进中国，由澳门而端州（肇庆）而韶州、南昌、南京，而获准定居北京；通过自鸣钟、三棱镜、日晷等实物将机械、物理、天文等当时最先进的科学知识介绍到中国。他主持绘制《《山海舆地全图》，让中国士大夫认识了世界之大；与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由李之藻笔录《同文算指》（数学）、《浑盖通宪图说》（天文学），等等。他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用《中国科学技术史》作者李约瑟的话说，是“两大文明之间联系的最高范例”；用他病逝后，明廷首辅叶向高的话说，是“勿论其他事，即译《几何原本》一书，便宜（破例在中国的京师）赐葬地矣！”

利玛窦和其他传教士的墓碑先后被义和团和红卫兵毁坏，1978 年月 10 月重修。1993 年我曾寻访到阜成门外北京市委党校内的“耶稣会士利公之墓”，写下《小园无径久徘徊》的凭吊之文。今年是利玛窦逝世 400 周年，上海复旦大学 5 月 11 日以“文明对话与全球挑战”为题举办国际论坛，有学者介绍了徐光启与利玛窦的“文明互动”。我则有一个心愿，就是到利玛窦当年修学的果阿邦去看看。我知道果阿的教堂和修道院是世界文化遗产，其仁慈耶稣大教堂是亚洲最主要的基督教朝圣地之一，但我并非基督徒。我知道那块地方，自 1498 年达·伽马初临，直到 1961 年 12 月，印度部队武力夺回果阿等三块葡属飞地的主权，数百年那里都是葡萄牙的殖民地，但我对葡萄牙风情并无特殊好感，就是想寻访利玛窦的遗踪……

印度籍学者阿玛蒂亚·森

这么写下去，写个大略也要两万字了，且拣最重要的说几句。

我最觉亲近最敬佩的当代经济学家，就是印度籍学者阿玛蒂亚·森。并非因为他是 199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并非他是哈佛大学及剑桥大学教授，曾担任过国际经济学会会长、联合国秘书长的经济顾问等学术或政治职务。我服膺的是他对自由和民主的笃定不移，对穷人福利的拳拳关怀，是真正的“经济学的良心”。

他翔实严谨地论证，“事实是显著的：在骇人听闻的世界饥荒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独立、民主而又保障新闻自由的国家发生过真正的饥荒。无论找到哪里，我们都找不到这一规律的例外。”生活经验告诉我，他讲的才是实话。福利经济学专著的水准不论，就是他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对孔子的解释”，也远比中国的于丹们高明。他指出孔子并不提倡盲目服从，当子路问如何事君时，孔子说应对他讲真话，即使这样会冒犯他（“勿欺也，而犯之”）；他说许多“亚洲价值观”的倡导者，把国家的作用看成家庭作用的延伸，而事实上忠于家庭和服从国家可能发生严重冲突，他以孔子认可“子为父隐”证明之……

阿玛蒂亚·森 1933 年 3 月出生在泰戈尔创立的国际大学校园内。“阿马蒂亚”这个名字就是泰戈尔所取。说到泰戈尔这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第一人，这位“世界公民”、真正的“东方之子”，他对中国作家郭沫若、冰心等人有着巨大影响，他对中华民族怀着深厚的情谊，1924 年访问中国受到知识界的热烈欢迎。

泰戈尔不仅是文坛泰斗。南亚专家、北大教授林承节在他的《印度近现史》一书中，专列一章论述“泰戈尔对印度民族解放斗争的贡献”。而不论是泰戈尔，还是阿玛蒂亚·森，最可贵的不是他们的睿智和优雅，而是他们超越名门贵族的善良，对底层人民的同情和关爱。

他俩都出生于孟加拉湾，在加尔各答生活过。而那里还留有 1979 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把一生献给穷苦人的阿尔巴尼亚裔的印度籍修女特蕾莎的身影。2009 年 10 月，诺贝尔基金会

评选她为诺奖百余年历史上最受尊崇的 3 位获奖者之一（另两位是 1964 年和平奖得主马丁·路德·金、1921 年物理学奖得主爱因斯坦。）加尔各答是何等地荣耀，令人景仰，它为世界呈现了三位“伟大的灵魂”！

甘地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的“非暴力”反抗信念

说到“伟大的灵魂”（Great Souled），在古梵语中其敬辞为 mahatman，人们进而专用“Mahatma”（汉译为“圣雄”）来称谓印度的国父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他带领印度人民争取独立，终于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这样的民族英雄在上世纪非殖民化的浪潮中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涌现；甘地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的信念“satyagraha”，英语译成“truth force”，意为“精神的力量”、“追求真理”。

他的“非暴力”反抗信念，既有印度教、耆那教等本土传统信仰成分，也上承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非暴力不合作”的人道主义思想、美国作家梭罗的“公民的不服从”行动理念，而下启美国马丁·路德·金和南非曼德拉等人领导的争取平等权利的社会运动，代表了一种人类文明进步的新潮流。

我们不能以“非暴力反抗”的进步性抹煞一定历史条件下暴力革命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事实上，英国殖民当局对甘地、尼赫鲁等人领导的和平抗议运动一再进行严厉镇压，甘地等民族解放运动领袖也多次被投入监狱；纵令二战期间印度人民站在反法西斯阵营而非入侵东南亚的日本军队一边作战，为欧亚两个战场作战的英军获胜作出了重大牺牲，英国人仍拒绝“退出印度”，印度人民自发地进行了激烈的反抗，从罢工、罢课到街垒战，一直到 1946 年 2 月发生孟买海军大起义之后，印度各族人民强烈的独立愿望才被英国当局于次年 2 月所承认。

“圣雄”甘地也不可能是一个超历史的神明。事实上，他从农民利益出发建设乡村社会的理念，他提倡织土布穿土布抵制英货的行动，与尼赫鲁等精英人物关于工业化、现代化的理念相比，是不合世界潮流的。然而，无论如何，他对真理必胜的信念（印地语格言“唯真理必胜”刻在今日印度国徽上），对独立自由的不屈追求，是令人钦佩的。

一次最廉洁高效的工作访问

也许是纪念中印建交 60 周年文化交流活动的一部分吧，受印度外交部邀请，我们 11 名中国媒体工作者于 9 月中旬对印度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这是最廉政高效的工作访问，从早到晚不是在赴访途中的交通工具上，就是在会议室里听介绍、讨论，比美国总统的国事访问还正经——2000 年克林顿到访，还安排参观过新德里之南 200 余公里的泰姬陵呢。据说因为参访的主题是经济及中印关系，连顺带的历史文化名胜也没有列上参观日程，比如在孟买，连乘车

路过壮丽的印度之门、火车终点站也没有考虑，更不用说参观维多利亚花园、威尔士亲王博物馆和象岛石窟这样的文化胜地了。

我们从广州出发的 4 个人，比北京和上海出发的团员要幸运。他们比我们先一天到德里，12 日适逢大雨在宾馆呆了一天；我们晚一天回家，19 日下午在德里参观了印度门、甘地陵园、红堡和莲花寺等 4 处景点。总算不虚此行，聊慰我对甘地的礼敬之意了。

雄伟的印度门固然壮观，不远处池塘里游船边，小雨中嬉水跃泳的赤身男孩所展现的天然和生机，更令我心动，仿佛看到了我的乡村童年伙伴。甘地陵园在德里东北部，恒河支流朱木拿河畔。那里是他 1948 年 1 月 30 日不幸被刺身亡后按印度教仪式举行火葬的地方。

陵园中央所谓的甘地墓，就是一块黑色大理石砌成的长宽各 3 米、高 1 米的方形平台，置一盏长明灯，简单朴实而庄严肃穆。络绎不绝的拜谒人群，显然是来自不同国家的团队，也有一眼可分辨来自印度不同社会阶层的男女老少。甘地无疑既是印度各族人民的精神领袖，也是一位世界级的杰出政治人物。

而莲花寺更是人类大同理想的结晶。它是创立于 1844 年以“人类同源、世界同一”为宗旨的“大同教”，根据印度的国情，以印度的“国花”莲花为基本造型，在 1986 年建造的，虽然大同教信众在全世界有 1000 多万而在印度还只有数万人。莲花寺的外观由三层白色大理石雕刻的莲花瓣建成，底座边有 9 个连环清水池。蓝天下，碧树红花间，显得分外纯朴圣洁。据介绍，庙内是一座既无神像又无任何装饰物的圣殿——中文名“灵曦堂”，只有一排排白色大理石椅供人们落座沉思默祷。我们因为没有时间排队未能进殿体验，心里从此却盛开了这朵白莲花。

二、最大关切

冲锋枪上子弹了吗？

拿到赴印签证，出发前两天，我按出国旅行惯例买短期意外保险。“新华人寿”的 L 小姐早上在电话中让我下午去，还告诉我保险额有哪些档次可选择；下午我去买，她却告诉我领导说不卖印度行的保险。我对其出尔反尔表达不满，却也没有深想这是为什么。

9 月 12 日晚在德里机场，入关检查算是顺利而高效。看着身材高大的警察手持短短的步枪，觉得挺好玩；酷似小孩子过家家，心想，也就是仪式性吧，挺详和的。车到酒店，那阵势如临大敌，气氛为之一变。尽管是酒店自家派到机场接客的礼宾车，也要在大院门口停下来，掀开前后盖接受仪器扫瞄，再通过减速弯道到大堂门口，行李通过安检黑箱，人“搜身”后通过安检窄门。经此“下马威”，随后两天到外交部座谈，到泰姬酒店午餐聚会，看到身挎冲锋枪的警卫人员，看到各机关各单位“八国联军”般各式服装的保安，便不再讶异了。

到印度的“经济首都”孟买，住 ITC 的连锁酒店，进印度进出口银行（EIBI），进 TIMES NOW 电视台，警戒森严也在预料之中。可是，到了浦那（孟买东南 140 公里的城市，马拉塔王国古都），紧张氛围有过之而无不及。在那里活动两天，一辆安保车，两个挎冲锋枪的警卫，一直跟随着我们，不论是在大企业，还是经济开发区办公楼，我们开会他们就在会议室外坐着。同伴好奇地问保卫人员，冲锋枪上了子弹吗？32 发，给你看看！

离开浦那前，三位女记者强烈要求找家大超市购物，出国一趟总得给同事亲友带点礼品嘛。全程陪同的外交部新闻联络官辛格先生，开恩同意给她们三人 15 分钟进一家名为 Puna Central 的超市，男人们就在外等着吧。超市院墙的正门不开，须从侧面进院子；先在停车处的大树下分男女接受开包和搜身检查，我们呆在那里看着无一例外；然后再上超市大楼台阶在进口处接受机场般的安检。到浦那机场（全印有 300 多家机场呢）返回德里，我差点进不去，因为我把机票行程单没当回事，不知放哪里了。殊不知在印度仅凭护照是进不了机场办登记手续的，我从德里飞孟买时随大流没有用心记住这一点。幸亏辛格先生找出了复印的行程单，我才通过了机场进口处的安检。

我们后走一天的 4 人，强烈要求 19 日白天看看德里，辛格先生说他要先回家，我们不能不同意，加之上午大雨，我们只好等下午出发。下午两点多到了红堡，它是莫卧儿王朝第五代帝王沙杰汗从泰姬陵所在的阿格拉迁都德里后修建的皇宫，不用一木一钉，全用红砂石和大理石建成，恢弘壮丽，虽然内宫宝物早被波斯王劫掠一空，毕竟城堡宫殿架构犹在。这里也是印度独立时升起第一面国旗的地方。可是，我们只是到了护楼前的广场拍了几张照，辛格先生就让我们急匆匆地离开了。

不就是要相当人民币 30 元的门票吗？比北京故宫值得多了，我掏 4 人的票钱也没一点问题嘛，心里不禁埋怨辛格先生敷衍我们。——等到回宾馆，电视台正滚动播出，两名台湾电视节目摄像师，于当天 11 时许，在红堡附近的著名景点贾玛清真寺门口遭遇枪手袭击，中弹受伤；印度伊斯兰激进组织“印度圣战士”声称枪击事件是他们所为。至此，才明白辛格先生的用心，才明白红堡、莲花寺那些旅游景点的大门口为何也不掩饰紧张气氛，才明白这些天的安检、冲锋枪手，不是存心吓唬人的。

印度希望我国在印巴关系方面持中立立场

上网一查，除了我所知道的，继 1993 年、2006 年孟买发生的大规模恐袭事件之后，2008 年 11 月 26 日至 29 日在孟买发生的，潜入印度的卡萨布等 10 名枪手进行的连环恐怖袭击，主要针对外国人特别是美英籍人员，造成至少 195 人死亡、近 300 人受伤；今年 2 月 13 日晚，浦那市一家德国面包房遭到炸弹袭击，造成 9 人死亡和 32 人受伤，其中遇难的外国人也是来自中国台湾。《印度时报》今年 5 月 4 日报道，根据阿萨姆邦警方情报，至少有 2 批恐怖分子、大约 140 人利用斯里兰卡渔船，通过西海岸潜入印度，可能发动大规模恐怖袭击……

作为个人，我不怕恐怖袭击，而相信死生有命，不出国不旅行我们被醉驾者撞死于街头或住宅区的概率远高于在任何国家遭遇恐袭，别说印度，就是伊拉克、阿富汗，有机会我也要去“叹世界”。但印度政府当然不能也不会这么想这么做，它要对自己的国土安全和社会安定负责，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其对可能发生的恐怖袭击的严重关切。当我们在印期间，作为外交部的客人，他们自然宁愿让我们抱憾没参观人杂目标大的文化名胜，也要确保我们的人身安全。

我们只是几个普通的媒体工作者，而非官方代表，亦不是南亚问题专家，在我看来，安排印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或东亚司官员与我们座谈，安排几个媒体及出版界人士、中印关系专家与我们交流观点，就足够了。但是，接待方不仅安排了这样两次会谈，还专门安排了外交部秘书（前任驻华大使、自信很了解中国的拉奥奇夫人）和部长与我们会见并交谈，另有印度防卫研究与分析学会（IDSA）研究人员、专家与我们讨论，国家安全顾问（也曾任驻华大使、会听会说汉语的梅农先生）在他那栋警备超严的办公楼与我们交谈。而据报道，今年 1 月受邀访印的中国记者团，也安排了与外交部长、环境部长等印度政府高官的会见，并与印度的媒体以及两大智库——印度三军研究院和印度外交事务委员会人员交流。

我理解，在这种场合，这种浅表性的短时间交谈，虽然言及中印巴三国关系，不回避克什米尔问题、中印领土争端及达赖喇嘛等任何新旧敏感话题，双方尽可能坦诚地发言，但都不可能与已公告的官方立场相距多少米；简言之，这主要是公共外交的一种姿态，是加强沟通和互信的善意显示。我在这篇短文所能传达的重要信息就是，印方对国土安全特别是反恐问题非常关切，希望加强两国的战略合作，特别希望我国在印巴关系方面持中立立场。

其实，印方的观点就写在驻华使馆出版的中文月刊《今日印度》上：今年 6 月号有国家安全顾问尚卡尔·梅农在第九届亚洲安全峰会上的演讲《安全新内涵》，那是一个关于亚洲安全合作的表达；今年 4 月出版的特刊《60 年建交 60 个思考》中，几位退役将军表达的对中国的看法，各有侧重，都说得相当坦率。实际上，中印作为两个谋求和平崛起的发展中大国和邻国，共同利益、长远利益远远大于竞争与纷争，需要双方的政府与国民都以大局为重，照料各自的重大关切，互相谅解与合作，而避免互相猜忌、互相拆台、在军备竞赛乃战争中两败俱伤，这应该是不言而喻的共识。

三、疑似炫耀

孟买西洋建筑之多之广远超上海

虽然看过美国大片《贫民窟里的百万富翁》，对孟买的贫民窟之丑陋早有思想准备，从德里飞孟买，一出机场，通往市区的公路两边的棚屋之众多之寒碜，仍然叫我们目瞪口呆。往来机场的公路就像一条平常的街道，既不宽阔又不专用，车多车杂自然走不快，两边的“风景”可以让你看得闭上倦眼。

左边的房子还有个模样，底层是些小店小铺；右边则多是用各色废旧木板、金属板、塑料及说不出名的材料而搭盖成的棚屋，一窝一丛，在多雨的南方或呈黑色或呈青苔色，好似弃置的旧船上附著的已无生命的生物体。为什么会这样呢？很好理解，不论是机场路还是普通公路，车来人往就有商机，便于谋生，交通要道两边自然是芸芸众生争趋之地，中外人同此心。

机场公路就这般素面朝天地“迎宾”，市区又如何呢？次日早上，从我们下榻的酒店出发到滨海大道上的印度进出口银行去，一路在市区马路上行驶一个多小时，沿途又是看够了“贫民窟”（这个词沿袭自我们过去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专用语，我们自己的则叫“棚户区”）。不过，这些破屋子并不成片，多是杂处在西洋式新旧楼宇之间。

想这孟买，如果不算 1534 年葡萄牙人的到来，1661 年葡萄牙凯瑟琳公主嫁给英王查理二世，孟买所在岛屿作为嫁妆送给英国，仅从 1668 年它们被转租给英国东印度公司，被殖民时间就长达 279 年，远早于上海“开埠”，远久于上海的“西化”。

孟买西洋建筑之多之广远超上海，如果没有这些贫民屋煞风景，搞一下“穿衣戴帽”、“美化”、“亮化”，其壮观不仅天津的租界区“五大道”、广州的沙面半岛，就是浦西全上海的原租界区也没法相比。能够说贫民屋与洋房共处，展示的是反帝反殖胜利的成果吗，就像北京的“京师大学堂”及贵人豪商的宅院在中国革命成功后一度变成了工人市民居住的大杂院？印度人或者说马哈拉施特拉邦的人是很想祛除殖民地色彩的，1995 年就将“马邦”首府孟买名称由 Bombay 更改为 Mumbai；只不过君子动口不动手，同时把许多地标性文物景点易名却并未歇斯底里地砸烂灭迹。

印度官民妥协而合演的“形象工程”喜剧

从印度进出口银行到宝莱坞电影城去，途经新近落成的班德拉—沃利跨海大桥，这座印度首座开放式斜拉桥是全印基础建设的最新代表作，8 车道 5.6 公里长，桥梁主塔高度相当于 43 层楼，据说可抗超 125 公里时速的暴风，6 米高的海浪也不会影响桥面通行。当你惊叹这样雄伟的建筑之时，却可以看到海岸边，黑色礁石上成片的贫民窟。多么有损城市乃至国家的“形象”呀，怎么就没有人来管一管呢？是诚实不欺，还是“虱多不痒，债多不愁”，多一处少一处无所谓了？

离开宝莱坞车奔浦那市，走的是近郊另一条马路，两边比市区有更多的贫民屋，可以看到马路边人行道上，有一些比贫民屋更贫的临时搭的遮雨篷，一两块塑料布之下，席地而坐的女人抱着孩子。根本就没有“城管”。

当时我忽然想，这是出于宗教的悲悯之心，还是出于不以乞讨为耻的某种宗教文化传统？是政府官员觉得自己先就亏欠了无家可归的国民，还是有意炫耀印度的迁徙自由？无论如何，

孟买市政当局将面对巨大的“外来人口”压力。问题不仅在于市政官员们是以消极还是积极的心态看待这“人口压力”（孟买于上世纪 70 年代末取代东部沿海的加尔各答成为全国第二大市，自 1991 年印度搞经济自由化以来，大孟买人口已达 2500 万之多，为全国贡献了工人岗位的 10%、所得税的 40%、关税的 60%、中央特许权税的 20%，“人心所向”是孟买吸引力和活力的生动表现），他们必须面对社会及城市管理体制的刚性约束。官员不可能仅凭自己的好恶来设计并用铁腕改变他人选择的运程。

其实，俗人爱虚荣、权贵好华丽搞粉饰，是人类共有的弱点。中国的隋炀帝为向外番夸耀天朝的富丽，不惜花大把真金白银营造盛世气象；俄国的波将金将军为取悦女皇叶卡捷琳娜，不也在她考察所经路线的视野内，用纸板、帆布和颜料营造繁华景象吗？

加拿大籍第二代印裔移民吉檀加利·科拉纳德，6 岁离印，成年后每年都回祖国居住，她在《文化震撼之旅·印度》这本书（张文渊译，旅游教育出版社 2009 年版）中写道：新德里为了举办高规格的国际活动，牛和贫民窟里的穷人都被赶出大街，集中用拖拉机运到农村去。“但是活动结束之后，这些人不但回来了，而且回来得更多。他们回来时乘坐的就是政府用纳税人的钱雇用的拖拉机，这些拖拉机是雇来进行高架桥建设以及新德里装饰工程的。这些人还会一直住下去。”（第 19 页红字部分）

我读到这里不禁会心一笑，这分明是官民妥协而合演的“形象工程”喜剧，我挺同情德里市政府的。印方所雇全程陪同我们的华裔翻译叶女士告诉我们，去年底，为迎接 2010 年英联邦运动会，强拆建在公共土地上的贫民窟，一些人的栖身之处被铲除，无家可归的贫民只得露宿街头，一名卖气球的男子被冻死；此事经媒体曝光，引发舆论对政府强拆措施的强烈抨击，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承诺在拆除贫民窟之前为居住者找到新安居处。

印度的人口城市化明显快于土地城市化

印度当权精英也曾想用政治铁腕推进变革。1975 年 6 月 27 日晚，总理英·甘地广播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随即逮捕反对派议员，全面审查新闻；紧急状态期间提出并实施包括节制生育、整顿城市等五点被认为激进的措施，结果使执政的国大党声誉一落千丈，于 1977 年 3 月丧失了独立 30 年来一直保持的执政地位。

孟买当局今天何尝不想改变市容市貌呢？但他们不能硬来。据同行的《新京报》记者谢来单独采访（9 月 26 日报道），孟买机场扩建就遭遇了“拆迁难”。负责该工程的住房发展和基础建设公司（HDIL）称，由于收购土地十分困难，计划于 2011 年竣工的日期已获准推迟到 2014 年。今年 9 月初，“马邦”政府宣布将于 3 个月内为孟买起草一份“住房计划”，其目标就是整合现有的廉租房和贫民窟拆迁计划，为此该邦住房部已经成立了一个有 23 名成员的住房指导委员会，确保住房改造计划能有效执行。

中国发展基金研究会新近发表的《中国发展报告 2010》坦承，我国的“土地城市化明显快于人口城市化”。印度则相反，人口城市化明显快于土地城市化。显然这是由现实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公权私权力量对比强弱不同等因素而形成的，至于历史原因那就说来话长不谈了。孔夫子说得好：“过犹不及”，两种不均衡都是有待解决的问题。

在我所接触的人里，中印双方看对方，都有怀着优越感的人。我方有人颇瞧不起人家大城市有贫民屋，却“看”不到我国贫困地区多有泥巴房，或不知人家的贫富差距实际上比我国小（今年，广东和世界银行合作研究的“缩小广东城乡贫富差距”课题组的报告公布：广东省的经济总量在全世界可以排到第 14 名，但广东贫困线人均 785 元，比越南低 20.4%，比蒙古低 55.3%；广东的基尼系数为 0.394，高于越南的 0.344、印度的 0.368）；印方则有人不客气地宣称自己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断言自己的发展后劲将比中国持久。

世事国运白云苍狗，我看，都不要以己之长较人之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才是正确的进取的心态。

工人罢工怎么办?

顺便说一下，在浦那市的一个经济开发区内，我们参访了中国“三一重工”印度分公司。其高管之一 Zeng Zhihong(曾志宏？)给我们介绍了该厂在印度的运营状况。

如何征地的？由“马邦”政府授权经营的开发公司与当地农民签约租地 99 年后转租给我方，据悉征的必是非农耕地，租价必得每一农户同意签约，还要给他们先找好安置处，并雇用他们的人员。我们随后参访了一家开发区管理公司（这种带国有事业单位性质的公司在“马邦”有 140 多处），与 Z 所言一致。

如何与当地官方打交道？国内来参观的官员问浦那市长是谁，我们不知道，没打过交道。除了照章纳税，雇当地律师处理相关业务，雇本地代理人与海关打交道，我们只管自己的生产与营销。

如何处理劳资关系？辞退印方的技术人员阻力小，他们容易找到工作嘛；辞退普工很难，一般是退回印方的劳务公司给他们另派可适应的工作，而再给我们派人来。工人罢工怎么办？发生过一次国内的劳务派遣工罢工，要求与本公司在编员工同工同酬。本公司实行的本是同工同酬，但派遣公司是营利性的（而非政府办的促进就业组织），从他们的收入中扣了“中介费”……

四、不可思议

朋友警告，到印度一定要喝名牌的瓶装或罐装水

临行前，印方送我们一袋印度政府旅游局北京办事处印制的关于印度的资料。袋子上印的就是“不可思议的印度”，英文是 Incredible India。查金山词霸，Incredible 译意是“<口语>难以置信的”。我感觉中文译成“不可思议的”更得体更有水平。它既不同于“令人惊奇的”、“奇妙的”（wonderful）有太强的广告式自夸色彩，又强调了印度的神秘而值得探访，似乎说印度“不可思议”，你可以去感知去感受呀，乐在过程，妙在不言中。

我感受的不可思议，第一条是在孟买，在浦那，街头路边，除了明显的标示穆斯林的头巾或白圆帽，锡克教男子的缠头布，男女老少的人们极少戴帽子，更不用说打遮阳伞、戴斗笠，只见到几个建设工人或学生模样的人头上有顶西式帽。须知，孟买和浦那与我国三亚纬度并不多，都在北纬 18 度左右。别说三亚的妇女在太阳下戴斗笠还要用布围脖颈，我国北方男子头上还要用毛巾打“英雄结”呢。我们小时候在夏天科头晒几天就会满头长疱，搞得脓呀血的。这里的人怎么就这么经晒？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呢！

说到水，出发前就有朋友一再警告，到印度一定要喝名牌的瓶装或罐装水，万万不可喝当地凉水和街边的饮料。有位在印旅行过的华裔朋友劝肠胃不好的我别去印度，说她闹急性肠胃病差点牺牲在那里了。我自然是百倍小心没出事，但如今仍想不明白当地人为什么就没事呢？那几天报上说克拉拉邦和德里的男人预期寿命都有七十几岁，这跟我国差不多。

还有个问题我一直没好意思向人求解：印度社会传统一向重男轻女，不说印度教早有“萨蒂”（将寡妇在丈夫的火葬柴堆上烧死）的恶俗，直到现代才被坚决禁止，就是女家要出不薄的陪嫁这一条也够厉害了，千百年来他们是怎样保持男女性别比例大体平衡的？须知，我国的传统尽管重男轻女，落后地方直称女孩为“赔钱货”，但女方家长一般是向男方索要彩礼的，就这样还出现不少溺女婴、B 超后流产女婴的父母，今天在农村男女青少年性别比严重失衡呢。

印度不是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

拉奥奇夫人在会见我们时强调“印度是一个世俗的、多元的、骄傲的、独立的国家”。我理解，她强调“世俗的”，不是否定印度是众多宗教汇聚的“博物院”，有各种宗教信仰的人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而是说印度不是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说印度是“多元的”，不是一般地说文化多元，而是强调在这个人种多、地域广、民族多、语言复杂、生活方式差异大的国度，包容性强，宗教和思想自由，广义的文化色彩丰富。

不论大都会德里、孟买，还是中等城市浦那或沿途乡镇，可以看到男人服饰的多样性，尤以锡克教男子俊美多姿，而成年女子绝大多数裹传统的纱丽，赤橙红绿蓝白，争芳斗艳。据吉

檀加利·科拉纳德那本书说，印度人能根据妇女的着装看出她来自哪个地区，信仰什么宗教，说什么语言，甚至能推断她早餐吃什么。细分到这种程度，如果固化了，正面说是多元共处，反面看就过于保守了。

印度社会的传统保留得多，是利还是弊，见仁见智，很可能是利弊互见。殖民者虽然 16 世纪就来到了印度，但直到 1858 年英国政府才收购东印度公司（这笔钱由印度人民出），对印度实行直接统治，此前英政府主要目标是做生意赚钱而不想管理印度事务，更无意改进其社会结构。

事实上，直到独立前夕，印度仍有封建割据的土邦 554 个，占全国面积的 2/5，人口的 1/4；1971 年，印度议会才决定正式取消土邦王公的特权和年俸。从 1949 年到 1970 年代，印度多次立法进行和平的渐进的土地改革，但问题远未完全解决。这些因素对社会阶层流动和风俗习惯演进的速度不可能不产生重大影响。我注意到，电视等传媒的广告上，宝莱坞电影拍摄现场，男女中小学生的校服，都明显地西洋化了。随着经济自由化、城市化和信息化的加速度推进，印度社会传统的变化将越来越快。

印度人用的世界地图跟我们的不大一样

值得一说的细节还有，在德里在孟买这样的大都市，各种车辆都有平等使用道路的权利，公交车轿车出租三轮车摩托车都在大马路上跑，跑不快，但从未堵塞过，即使在上下班的高峰期，可谓乱中有序。在浦那跟随我们两天的警车，也不曾用过警灯警笛，与我们在国内开会做地方政府的嘉宾大不一样。

德里孟买的私家车通常很小型，与我国上市不久就差不多淘汰了的菲亚特和奥托车差不多个子。哪像我们的北京人从自行车时代一步跃入私家车时代，还嫌用省油且少占位的小型车没面子？

最令我眼睛发亮的是看到印度人用的世界地图，三一重工分公司也入乡随俗：那地图与我们关于东方西方的地理概念很一致，美洲和大西洋一看就是在西边，而我们用的世界地图最西边是非洲，美洲在东边，还和利玛窦时代差不多（当时他不能不把“天朝”摆在世界中心，让中国不高兴呀）。至于民房未见加铁窗防盗，商店购物刷信用卡不用密码，这并非印度特色，不用多说了。

这就是我在印度一周大体可以诉诸笔墨的所见所感。我意识到极其片面。比如，我见到了外交部相当于常务副部长的“秘书”拉奥奇夫人，我知道现任总统帕蒂尔是女性，已故总理英·甘地是女性，10 多场会议都有女性，甚至与防卫研究所的交流也有女学者发言，这是否就代表印度社会已实行男女平等呢？

2005 年逝世的印度前总统科奇里尔·拉曼·纳拉亚南，出生于南部喀拉拉邦乌扎沃尔村低种姓的“达利特”家庭，他获得的政治地位可以代表印度社会的进步方向,但能表明社会平等已成现实吗?我们所熟知的盲人摸象寓言，源自印度耆那教的故事。我坐在汽车里隔着玻璃窗，看了印度的两三个地方，完全没有进入市民社会，更没有接触传统主导的乡村生活，因此对印度的了解连盲人摸象也谈不上，算是看了象鼻子一眼吧。

2000 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印时前往泰姬陵参观的路上，陪同的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对他说：“世界上的人分两种，一种是去过泰姬陵的，另一种是没有去过的。”我虽然去了一趟印度，仍旧属于“另一种人”。随笔杂志的海帆女士与李公明教授等人，2004 年自费到印度自由行了 20 天，她回来出版了一本《印度诱惑》诱惑我。她笔下描绘的印度我基本没看过，

这一趟回来印度对我的诱惑更强了。等着吧，我还会去的。

（鄢烈山，杂文家。原文链接：http://www.infzm.com/content/52784）

7-2 秦轩：印度游记

“印度有太多不一样的群体，是个共识太少，交流成本又很高的国家，所以它的崛起很奇怪。我想，这条路就像是印度崛起的姿势一样，不同的车和人，当然还有牛，象征着不同的群体，而向前走，是大家的共识，很遗憾，彼此没有良好的沟通，也没有形成秩序，谁先谁后，谁左谁右。印度人就像我们的司机，依然找到了向前走的办法。”



（作者注：本文所述仅记录个人感受，追求诚实表达内心，不追求公正报道，敬请谅解。）

（上）

缘起

10 月底去印度，11 月中旬回京，我在印度待了 17 天。头 10 天是 NGO 的交流项目，5 天在德里，4 天在北部喜马拉雅山脉里，和当地的学者、社会活动家、非政府组织代表对话，主题是关于中印的气候变化政策、环保等议题，1 天去阿格拉参观了泰姬陵和莫卧儿前期的王宫。

后 7 天是私人旅行，先向东，在瓦兰纳西 1 夜，加尔各答 2 夜，再折向西南的孟买 2 夜，回德里 1 夜。

匆匆忙忙，和此前两次在欧洲一样，是走过场式的，带有功利性目的的旅行，既把最该看最值得看的地方排座次，再根据时间的考量，决定顺序。行程与路线安排，主要来自朋友陈思的推荐，他在印度留学多年。行前我在 MSN 上和他聊，只告诉他我的时间和预算，1 分钟内他就给我设计了这条路线。

他给我设计的是火车加飞机的形式，这样可以省下好几天的住宿费。很遗憾我在行前完全没准备，到订火车票时，已经错过时机，只好订飞机，反复折腾，成本增大不少，这是后话。

匆匆而行，应该说，很难有独到深入的体会，是故只能写一些粗浅的个人感受，平常的细节不详述，若有兴趣，可用谷歌搜索去印度旅行的路书，会更有帮助。

见印度共产党

“请中国的朋友们也唱首歌吧。”像巴依老爷的长胡子老爷爷说，他的眼镜片很厚。那天晚上我们在他家里席地而坐。一边是我和其他几个来自中国 NGO 的朋友，一边是当地的知识分子，记者、工会代表什么的。带我们去的印度 NGO 负责人阿瑟夫说，他们全是印度共产党。

其实他不用介绍了，因为一进屋我就看见墙上挂着格瓦拉、列宁的像。老爷爷家在德里北部，喜马拉雅山脚下。在山那头的尼泊尔，毛派闹得正凶。

对方代表里有个当地歌手，是个短胡子大叔，他唱了一首据说是女工运动歌曲，曾经在印度很流行。曲调婉转、悲怆，可是我心里还是想笑。

见鬼了，跑到印度见共产党。我想。

对方提出让我们唱歌的要求，咱不能含糊，我和同伴你看我，我看你，想不出唱什么。我记得很久前在黎巴嫩也被人要求唱歌，那次我唱国歌，唱到一半居然忘词了，好在别人也听不懂，后来我唱的崔健，花房姑娘。

“唱国际歌吧”巴依老爷给我们出了个主意。

唱就唱。我们几个人装模作样地唱起来。我发现，也就是我记的词儿多。

这还只是开头。唱完，鼓掌，对方开始问问题，一个一个问。

“我们很想知道，毛主席以后的中国怎么样了，现在的中国人怎么看待毛，怎么看待共产主义，现在的中国社会主义者在干什么？”巴依老爷起了个头。接下来的几个问题我基本都没听清，印度同志们的英语太有地方特色了，我只听到列宁啊，资本主义啊，历史啊这些词，最后一个问题我听清楚了，某大学社会学教授问“我想知道你们的土地政策是什么样的。”

我心想，按日程我们的交流主题不是气候变化么。

后来我们开始给印度的同志们介绍党史，具体讲了些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依稀记得自己的态度有点不负责任。

而在交流完吃饭的时候，又有个人过来问我，中国的失业率是多少，我说对不起我是搞国际报道的，你问我中国外交我还能知道点。可是他又问我一个什么率，我只能说对不起我不知道。

喜马拉雅山里的水坝

我们在喜马拉雅山里转了 4 天，就为了看那座叫 DERI 的水坝。当地人因为水坝迁移，水位上涨，造成农田流失，生计成问题。水坝规模跟我 2008 年在岷江转悠时看到的差不多。在印度，据说这是很大的一个坝。

当地的律师给我们讲了那条江的历史。他说在现代印度建国之前，那地方一直是由附近的莫卧儿王朝的君主统治，谁来了都一样，对当地的老百姓生活没太大影响。现代印度立法把当地的山、河流收归国有，修了水坝后，禁止当地人用水库里的水，尤其是禁止用于灌溉。

这给我启发很大。我以前从没这么想过问题，既在前现代社会，所谓公共资源的界定是不需要清晰的，大家共享，也牵扯不到管理的问题。在现代化，被立法为国有资源以后，实际上就变成了中央政府才能享用的资源，当地人则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付出，如果不能得到补偿，就被淘汰出局。

从建水坝至今，一直有社会活动家帮助当地人和政府斗争，水库对环境的破坏，比如造成山体滑坡、塌方等也作为一大罪状。现在，气候变化的观念也被引入。据说河流到水库时的声音和以前不一样，当地人觉得这是气候变化造成的。说心里话我觉得他们不一定真正了解气候变化。

印度人问在中国是否存在这样的情况，中国当地人又怎么处理。我心想，我们肯定不如你们，你们能抗争，能去找议员。

泰姬陵牛逼不需要理由

想了好几次该怎么写去泰姬陵的感受，是开门见山还是循序渐进，是抄村上春树还是学普希金，基本上不考虑王朔，在这么牛逼的建筑面前玩解构，太愤青。

后来想明白了，怎么说不重要，对于举世无双的泰姬陵而言，丝毫不重要。她连时间都打败了。

从德里到阿格拉，也就是从 19 世纪北印度的都城到莫卧儿王朝前期的首都，火车 4 个小时。彼时，我看过照片，知道很美，看过贫民窟里的百万富翁，知道两个小孩在泰姬陵骗钱偷

鞋子。没多想。这些年看过不少中东风格的建筑，尤其是格兰纳达同样举世无双的阿拉汗布拉宫，有点审美疲劳。

按计划，这是例行旅行。像过去一样和火车站的司机砍价，像过去一样躲过围上来的导游。泰姬陵的导游都是小伙子，很帅，会和你热情地打招呼，指引你到外国人购票窗口，还要和你握手。他们说你要排很久的队，而他们知道条近路。哪怕反复说了 NO，已经排到大约 400 多米长的队尾，他们还是要说，嘿，给我 400 卢比，我带你进去。我很有自信地知道他们不过是可爱的骗子。

哥见得多了。

长队沿着三层楼高的红墙延伸，墙内是泰姬陵，我看不到，当然也感受不到她的存在。

前一天，我上维基补课，知道泰姬陵是莫卧儿王朝的皇帝沙贾汗给自己妃子造的陵墓，盖了 30 多年。后来沙贾汗被自己的儿子囚禁，从囚禁的房间可以看到泰姬陵。

这算牛逼的爱情故事，而阿拉汗布拉宫也有个牛逼的爱情故事。阿拉汗布拉宫的男主人，安达露西亚最传奇的国王兼诗人穆塔米德和爱妃伊塔米德的故事。穆塔米德为了解除爱妃的乡愁，在窗前种满雪白的梨花，而伊塔米德为她的丈夫写出如下的情诗：我要你，我的爱，像疾风一样到来，来耕耘我的身体，至少给它三次灌溉。后来，国王被流放到摩洛哥，爱妃陪他走完一生。

去年夏天，我跑去西班牙的格兰纳达看阿拉汗布拉宫。很明显，她青春依旧，风情万种，又落落大方。每走几步就看到她新的舞姿。有时是错综的空间分割构成不同的舞台，各种风格的廊柱则是伴舞，窗户也在变化，将光线切割成不同的线条，而最美丽的是无处不在的纹路，就像是刻上去的音乐。而在我看丢了魂儿的时候，忽然豁然开朗，花园切割成简单的长方块，围墙单一的浅黄色嵌着几个四方的小窗户。一股泉水从花园沿着饮水道引入堂室，这是从中亚到安达露西亚通用的空调。抬起头，很期盼从对面阁楼的窗户中伸出一个身影。刹那间，心情舒缓得有些忧伤。

你可能不信，离开阿拉汗布拉宫下山时，我觉得自己好像错过一段爱情，从此分离。

说这些，其实是想说，当我在泰姬陵外排队时，多少不报太多期望，哥阅尽人间春色。

排了半个小时队后，我走进大门，再前行 200 米，左手边是座红色门楼，典型的伊斯兰风格建筑，中间是拱形大门。

这时候没什么可想的，穿过去，看着一块白色渐入眼中，然后，我不敢迈步了。那时候周围都是人，以各种姿势拍照，可是我觉得好像世界在变得安静，我在变得安静。我觉得我永远都不想到那个地方，那里好像不是一座坟墓，而是遥不可及的珠穆朗玛峰，神秘、宁静。

我把相机端起、放下，不停有人进了摄影框，打乱构图，遮挡光线，不过不重要，一点也不重要。

从红色的入口到泰姬陵，大约 500 米，每一步都有人按动快门。同样，每一步都有人停下来转身，让同伴为他或她拍照，让自己和那座洁白的建筑停留在一个画面里，也有人抬起胳膊，手指向下，仿佛捏住泰姬陵顶部尖尖的塔尖。

而走得越近，我越明白，这都是徒劳的。无论镜头对着那里，无论谁站在她的面前，都是徒劳的，任何人在审视照片时，第一眼都只会看到她。对，只有她。而任何拍摄都无法捕捉到她，因为她是那种连时间都可以打败的建筑。

我见识到什么叫永恒。

我相信这也是沙贾汗的目的。他肯花 30 多年，耗巨资盖陵墓，一定是因为他想打败时间，没有别的理由。这哥们戎马一生，机关算尽，赢了很多，占有很多，可是，无论敌人、朋友、荣誉或者王国，都会灰飞烟灭，被时间打败。这些他大概都玩腻了，觉得无意义。他一定很寂寞。

或者反过来说，恰恰是因为那些事在当时太有意义，而意义是有寿命的。反倒是越抽象越纯粹越无意义的事情，才会打败时间，才会永恒。

泰戈尔也是这么说的，他说泰姬陵是永恒面颊上的一滴眼泪。他是个明白人。

说点题外的，我带了冰心翻译的那本泰戈尔诗选，如果翻译准确的部分至少有 70%的话，那我觉得泰戈尔做个时尚作家还可以，拿诺贝尔奖，似乎有点被高估了。（这一点得到我的偶像阿乙老师的认同，嘿嘿）

沙贾汗挺幸运的，因为他找到了能理解他的建筑师。

走过第一个水池时，我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我想，如果可能，就在这里坐一个星期，甚至一个月，也是可行的。别的都不干，就坐着看她。我有这个耐心。维基上说，泰姬陵的颜色随时间变化不同。而据说夜晚的泰姬陵门票比白天的贵许多。而我想，也许这些也不重要，哪怕立刻扭头离去，只看一眼也可以。对于她来说，一眼和一个月的关注，没有区别。

周围还是好几群游客在拍照。一个老头跟我打招呼，打手势，要我做出虚抓泰姬陵顶尖的姿势。他是个拍照片的，立等可取那种。

我有点烦，跟他说了句，你一点都不懂泰姬陵。他嘟囔了一句走开。我不期望他知道我在说什么，我只是想说。

也许我这样做是不对的，起身时我甚至想，若我是女子，有人愿给我建这么座墓，立刻自杀也值了。当然，只是想想。

接下来的一小时里，我跑到泰姬陵内部去参观，看到大理石墙面上乳白色的玫瑰花纹和红宝石绿宝石片在墙上镶嵌的花纹。它们守护着妃子和国王的石棺。

可是我的心情不在这墓地里面。我只想远观。进来前我也犹豫过，要不要如此近地与她接触。

或者这些也不重要，周围形形色色的人，有当地的，有外来的旅行者，我变得安静，开始以另一个角度想问题，能够让不同种的人都过来看她，这是好事。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到底阿拉汗布拉宫与泰姬陵，哪个更美，更永恒。

瓦兰纳西一夜

在德里遇到个华为的哥们，聊天时他说要是没去过瓦兰纳西，就等于没来印度，那地方天天有印度教僧人的祭祀表演。于是我就去了，由于时间紧，任务重，我只待了一晚。

瓦兰纳西在恒河边上，是印度教最重要的圣地。据说唐僧他老人家曾到此地观光，写回忆录时还专门介绍过。

瓦兰纳西机场到市区得 20 公里，为了省钱，我和俩老外拼车。其中一个西班牙姑娘是钢琴教师，去年就来过。在车上闲聊她说这地方很安静，她这次利用假期，打算待 3 月，打打义工什么的。

我遂一路幻想恒河边古城的美妙，那里一定神很多。

可是，当走到旅馆的时候，我很庆幸自己只订了一晚。我知道如果有去过的同学看我这么没文化这么不负责任地说话，会很愤慨，会鄙夷我。不过，兄弟我真受不了三步一屎，苍蝇满天飞啊。这里神再多，也没屎多。

屎是牛屎，准确地说是圣牛的屎，很大，一坨顶两到三坨人屎。这地方比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难民营还要脏 10 倍不止。好吧，我只能说这地方基本属于前现代社会，没有现代公共卫生的观念。换一个说法是，这地方牛可以随便拉屎撒尿，人不行。

好在旅店很干净，大理石地面。房间很简单，只有床和电扇，单间没窗户的合人民币十几块钱，我为了选个有窗的，只能要间大床房，房价翻一番。推开窗，能听到对面寺庙里念经的声音。我花了好大力气说服自己出门转转。

前两天读意大利人的侦探小说，主人公是中世纪最后一个，文艺复兴头一个文学家但丁。讲他在弗洛伦萨当执行官破案的故事。书里有个细节是但丁走路时要小心避开马粪。这让我一下子想起瓦兰纳西。

两个城市有点相似，大多是前现代的高楼，狭长而不规则的小道，旅行者人手一份地图，走几步就得看看，否则就会迷路。我想，如果但丁在瓦兰纳西，一边走一边绕过牛粪，当然还有牛的时候，他会想家的。

好吧，有文化的同学，拿弗洛伦萨来比较瓦兰纳西，你总不能说我看不起这里了吧。没错，只要不用肉眼，而是用相机看这座城市，它真的很美，很古老。

夜晚祭祀的仪式不必说，恒河边上打坐的印度教居士不必说，日出下的庙宇更不必说了。我只能说，我看到恒河时，首先想到的是，它并不清澈，有点脏。对于当地天天在恒河水里洗澡的人来说，水脏不脏显然不重要。他们在修行。

印度人真吃这套。电视里专门有电视台讲印度教，每时每刻地讲。我还看到过一个节目一群人扮演成印度教的神仙开会，就跟西游记里的天宫似的。

加尔各答见华侨

要想理解英国人在印度干过什么，就得去加尔各答。于是我去了，这地方的出租车至今仍然是 50 年代款式，比中东的二手车还要古老。顺便说一下，我在街上看到过一家缝纫机专卖店，装饰精美，像奔驰车的 4S 店一样。

在加尔各答，我用了大半天的时间看维多利亚时期的街道、建筑，参观博物馆。报摊上全是奥巴马的面孔，据说他要到加尔各答来。

维多利亚纪念馆很值得去，那里有太多关于英属殖民地时期的线索，可惜我没有时间多待，只抄了些有趣的人物名字，待以后有机会研究。期间我看到个 19 世纪成立的以研究亚洲为目的学术组织，好像也叫亚洲协会什么的，和美国那个亚洲协会名字差不多。傍晚我恰巧路

过了这个组织的办事处，就跑进去发名片，顺带想要点干净的水喝。可惜对方很谨慎，只发给我他们出的书的名录。我翻了一下，里面关于远东和中国的资料很少。

吃完晚饭，我从《孤独星球》的《印度》一册中发现有个地方叫中国庙，旁边还有条路叫孙逸仙路，就赶了过去。

那个庙是个妈祖庙，很破落，庙门紧闭，周围都是印度的穆斯林居住。而意外地我发现有中国字儿的店铺，是卖酱菜的，老板是中国人。他的门帘已经拉下一半，就要收摊，我说能不能聊聊，他说没时间，介绍个印度雇员带我去巷子里的会馆。

接下来就是本次旅行最大的收获之一了。

会宁会馆。门口一个华人大叔往里走，打招呼他不理我，索性厚着脸皮跟进去。里面两桌人在打牌。会馆里也供着妈祖，装饰着木雕，这种雕饰在广东福建一带很普遍。

我施展浑身解数，和大叔大妈们套近乎。讨水、递烟、吹牛皮。这帮人压根不知道有家报纸叫《南方周末》，还好意思问我会不会说粤语。我已经连最后两根中南海都递出去了。这意味着在接下来的旅途我没有中南海抽，这简直和没有中餐吃一样难受。

耗了快半个小时，终于来了个大叔和我对吹牛皮。这位大叔 50 来岁，是个牙医。后来聊开了他说自己是亲大陆派。我还笑他，有啥好亲的。前两天在读关于海外华人的书《炎黄子孙》时，我才理解亲大陆派的意思是什么。1949 年国民党赴台，大陆变色，全世界的华人跟着分了两个阵营。随后几十年一些地方的排华，其实也包含着亲台派对亲大陆派的排斥。

大叔介绍，60 年代中印战争前，印度有差不多 10 万华侨，中国在加尔各答也有领事馆。战争后华人倒霉，到现在还剩下不到 1 万，以广东和福建居多。大叔却是湖北人。祖上在抗日战争时向西逃难，一路以修牙为业，见火车就上，一直走到加尔各答。

大叔的兄弟姐妹，在红色中国成立后，有些回国上学，算是支援国家建设。我却忘记问中印战争对这些回国的印度华侨是否造成了影响。

大叔说，加尔各答的牛肉和牛肚很好吃，全世界头一份，现在还有中国人跑过来进货回国加工。可惜我当晚要去机场，错过了牛肚。

他还说在加尔各答西边这两年建了新的唐人街，做加工皮革的生意。我知道，按照印度教的教义，这是低等种姓做的工作。

走时我和他要了名片，如果有缘，我一定要找他带我去吃牛肚。

（下）

孟买碎片

大概是因为二战的缘故，我在孟买看到的维多利亚时期建筑，比在伦敦看到的，要多许多。仅由这些建筑，就可以感受到当初英国人数百年的苦心经营与投入。孟买应该是大英帝国的东方起点吧。从孟买向西，经苏伊士运河抵伦敦，在 100 多年前大概是大英帝国最繁忙也最为关键的海外航线。虽然还没有机会做更深入的阅读与研究，我已经被孟买的建筑感动了。

从立场上，我们应该对殖民主义持批判态度，私下我也觉得，能跑到几千甚至上万公里外干出这样的事情，这不是一般人。

孟买有个红灯区，《孤独星球》上说这是亚洲最大的，而且在 19 世纪就有，为当时的海员提供服务。那个啥，我就去观摩了一下。兄弟无能，找红灯区真不是长项。折腾半天，我才到了地方，福兰街。

可这地方简直就是一个乡镇市场，比发廊都不如。街道两旁几个站街女，基本都很丑。连本报编辑男扮女装都比他们漂亮。人在异乡，难免要上一些当。这次当，最给力。

顺便说一下，在印度十几天，我见过的勉强算美女的，不超过 10 个。

每次在印度看电视我都奇怪，广告里那些女的，皮肤一个比一个白，眼睛一个比一个大，鼻子一个比一个挺拔，身材一个比一个性感，为嘛现实世界只能用崩溃来形容。

找红灯区时还有个插曲。我路过一个药店，问路。主人和伙计都很友好，我们就聊起来。主人是个带黑色礼拜帽的老头，问我觉得印度怎么样，我犹豫没说话，他说是不是觉得脏。我谨慎地说，不是非常干净。后来再聊下去，主人说他是袄教徒，从伊朗过来的。袄神庙就在店旁。

我一听来了精神，跟他说我去过伊朗，还到袄神庙去看过。他有点不相信，因为在印度的袄神庙门口都挂着牌子，只有波斯人能进。

我说，在中国也有袄神庙，是他们萨珊王朝的王子逃难到中国修的，当然也可能是另一支粟特袄教的人干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聊起婚姻。他说他们袄教徒只能在教内通婚，结果现在数量越来越少。全印度不到 2 万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印度已经是袄教徒最大的根据地了。

想当年，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堪称帝国的国家就是这帮袄教徒干的，地跨欧亚利比亚三块大陆，那时领头的是大流士。至萨珊王朝灭亡，袄教被伊斯兰教灭了，1000 多年萎靡不振，也不知道他们自己怎么想未来。这个教，似乎从来只在波斯人中传播过。

走时，老板给我一张名片，上面写着药店的名字，阿胡拉，这是袄教善神的名字。

由于红灯区和沙滩都很脏乱差，我实在没勇气去贫民窟转转了。基本上应该和《贫民窟里的百万富翁》中的景象没差别。后来坐城际铁路离开市区去机场，要穿过平民窟，大约 40 分钟的车程，一路都是异味。

后来在飞机上俯视孟买，可以看到成片成片的铁皮棚户区，以蓝色为主。据说这个地方一半的人是文盲，这可不是个好现象。

德里

德里印象深的有这么几件事。一是刚开通几个月的地铁，和北京一样，也要查包，甚至更严，要搜身。入口还有沙包堆的工事，有穿军装的拿着枪躲在里面。最有趣地是，地铁车厢里有避孕药的广告，广告语是吃我一片药，三年怀不上，够狠。

另一件是在排灯节的夜晚，在路旁看到吸毒的少年，地上一堆火柴，几个小孩躺在地上，手里摆弄着锡纸，面前一根蜡烛。拐个弯就有人祭祀焚香。

排灯节是印度教很热闹的节日，放鞭炮，放假，见面打招呼说排灯节快乐，和我们除夕夜的气氛差不多。

第三件则有趣地多，是在住的旅舍。同屋 8 个人，我赶上一伙苏菲派艺人，他们来自拉贾斯坦，靠着巴基斯坦的地方。他们刚从哥本哈根一个音乐节回来，赶到德里，准备给访问印度的奥巴马表演。他们给我看他们和印度总理前总理的合影。

我猜这是因为我和他们说了我是记者的缘故。可惜，录音笔没电，没能录下他们的歌声和弦乐。

其中一个大叔盘腿坐在床上（床是上下铺那种）拉 KAMAYACHA，这是一种拉弦乐器。声音听上去就像从几千年以前发出来的，感觉和地中海东岸的音乐很像。这是我喜欢的那种声音。

以前看过本书说，欧洲的乐器和远东的乐器，绝大多数是从中东世界传过去的，包括小提琴、吉他、二胡、笛子之类的。我觉得这事靠谱，很靠谱。

好吧，再多说一件，巴哈伊教的莲花寺。我的偶像及老师黄章晋说过，在中国农民和知识分子信基督教，官员信佛教道教，国际化人士和时尚人士信巴哈伊教。我的另一个老师说过，巴哈伊教在联合国的某些机构渗透很厉害。或者换个说法说，巴哈伊教的教义天然和联合国有共识。

巴哈伊教在世界上有 7 个大寺，总部好像是在以色列。这个教源于伊朗，是伊朗现代化思潮的产物，今天在伊朗还受到打压。

莲花寺，顾名思义，建得像莲花，寺外还有水池。遵照导游的要求，我们进寺要脱鞋，要保持安静，而且禁止拍照。

寺内和教堂有些相似，但没有十字架。所谓参观就是进去随便在某排座椅上坐下，感受安宁。

基督教教堂给我的感觉是，很神圣也很压抑，总有个焦点，你得时刻把自己内心像祭台上的祭品一样放上去。礼拜寺则不拜物，面对麦加方向，按照仪式冥想就好，礼拜殿并不压抑。而巴哈伊教这个教堂，感觉则是很柔和，四周的墙和天花板不会带来任何的压力感，很适合让自己的心念释放出来，达到安宁。

我挺喜欢的。也是当时一闪念，给国内一个信巴哈伊教的姐姐买了个小礼物。

记一次堵车

说来你不信，我在印度看到最好玩的事情不是和印度共产党一块唱国际歌，不是踩到圣牛的粪便，不是在清晨到恒河看人洗澡，而是一次堵车。

那排灯节前两天，我和一伙中国 NGO 代表从喜马拉雅的山里出来，住到圣城瑞诗凯诗。第二天早上我睡到 9 点才起，头 4 天在山里，我们都是天不亮就起床。圣城瑞诗凯诗是个镇，以瑜伽著称，建在恒河两侧。9 点半，我们离开酒店，在河边转了一圈，跑到吊桥上向河里喂鱼食。桥很窄，人、摩托车和驴走桥，猴子在人的头上，走桥的吊索。河水是黄的，两边建着不少印度教庙宇。

我没什么心情，身上脏的不成样子，顾不上去河边的银器店购物，只盼着早点回到德里，去旅店洗衣服，上网，休息。此前 4 天，我们每天早上 5 点起床，吃完早点上车，天黑下车住店，中间偶有与当地人交流的环节。不怕笑话，兄弟从 08 年 5 月，再没过过这种苦日子。若早知如此，很可能吓得不敢来印度，晕车、山路、操他妈的咖喱、休息不好、冻得感冒，全赶一块。（即便现在想起，还心有余悸。）

大约 10 点多，我们离开瑞诗凯诗，看路牌，这里到德里不过 230 公里，一路平原。我以为，怎么下午也能到了，谁知道，到旅店时，已经是晚上 9 点半，也就是说，这一路，除去吃饭、休息，我们走了差不多 8 个小时。

这是因为路上总是堵车，不停地堵，且和以前遇到的堵车不太一样。

第一次堵车在城外的桥上到来。我们抵达时，已经堵了几十辆车。车道是双向的单车道。我们的司机并没有按规矩排在等车队伍的末尾，而是义无反顾地冲向逆行的车道。后来有几辆车跟着我们向前。等车的司机见我们上去，有的抱怨，有的愤怒，有的却挥手，示意我们赶紧，那意思似乎是在说，哥们你丫有种，上吧，看你死得惨不惨。某种程度上他是对的，我们后来的确是和对面的车顶上，不得不做退让。

与后来的几次堵车相比，这只是个小小的前奏，考虑到这一点，我决定把细节忽略不计，只说解决问题的关键人物，我们的领队阿瑟夫。

在陷入僵局的时候，阿瑟夫下了车，和穿军装的指挥说几句，又不停地和身边的司机交谈，或者说，嚷嚷更准确。我想跟着下去照相，被萨碧娜拦下。另一个穿军装的走到车头和司机对吼几句，我们可怜的中巴就被勒令向后退，向后退。我看到阿瑟夫站到旁边长队的中间，一辆大卡车前头，义正言辞地遏制着它，和卡车司机对吼。他在用生命为我们捍卫刚刚露出的空间，我们顺利的插队了。

顺便说一下，后来我们看到，堵车的原因是桥那头有个军营，一辆货车要拐进去，它后面拉了一辆装甲车。

路过装甲车时，坐在后排的贝尼忽然说，在北京也堵车，前两天新闻说你们北京堵了 7 个小时。我心里说，是的，不过我们不会因为一辆车掉头就堵成这样。

经过装甲车不久，我们上了正在修的快速路，这条路双向有 4 车道，新铺的柏油路，我坐在司机旁边的座位，看到时速一度保持在 7、80 公里每小时，心里美的很。

走了一段，司机突然从快速路上拐下，掉头走上一条土路。土路上双向都在堵车。萨碧娜说这是要北方邦与首都德里的交界处，要先去交过路费。

在国内当然也有过路的收费站，而且均在路中央拦着。眼前可不一样，收费站设在路旁。我想，这些印度人还真自觉。

堵车时我再一次见识了司机的技巧，他果断地从土路下去，走旁边坑坑洼洼的便行道，然后没多久就挤到了警察的身旁，没想到警察见他冲过来，反倒急着招手，让我们的司机掉头。司机和他争了几句才明白，收费站改在别处了。

可是后来我们再也没找到收费的，抽查的也没遇到。

扭过头，再想回到公路上，又要排好长的队。因为这是个三叉口，三条路上的车互相挡着，只能交叉着过。

我们英勇的司机这次依然选择走便行道，然后在即将上路的地方埋伏着，寻找上路的空隙。试两次，他就成功了。

有个插曲，在我们埋伏的时候，有辆相向行驶的车要穿过车流，司机是个大胡子。他一边按喇叭一边喊，让车流里挡路的车让出个空来，那辆车的司机是个小伙子。小伙子的车往后倒一点，就可以让大胡子的车通过，这对小伙子并没有什么损失。可是，小伙子不让，还踩了脚油。他扭过头爬在方向盘上不看大胡子。气得大胡子哇哇乱叫，吹胡子瞪眼。

天色渐晚，窗外的农田变成了一排排楼房。我们的车速从 80 公里/小时迅速降为静止经过的路牌显示，距离德里还有 35 公里。

这是条双向 4 车道的马路，路中间有铁栏杆拦着。周围都是楼房，两旁有很多门脸，摆着花环、招贴画、炮竹、彩灯和神像什么的。我猜这地方对于德里就相当于昌平和北京的关系。

很快，我见到了从未见过的堵车景象，应该说这是印度最让我深刻的景象之一。

在道路上，我看到小轿车、中巴、大巴、大货车、拖拉机、三轮摩的、摩托车、马车、牛、三轮自行车、自行车和行人。大家都在拼命往前挤，任何空档在 2、3 秒内就会消灭，每一刻都有车或人避开主路，到路旁的便道抄近道。4 车道根据路旁便道的宽度在 5 车道和 8 车道之间变化，时胖时瘦。周围的喇叭没有一刻是停的，虽然一点用都没有。

我想起在旅店看到过的电视广告，关于一辆两厢的小轿车，广告语是随心所欲的转向。这很现实。同时我也明白了头一天到德里看到的现象，很多汽车都把车两侧的后视镜合起来，这能瘦身。当然，也很容易推断出绝大多数车都是带伤的。

我们的印度教司机也开始不耐烦，只不过情绪丝毫不影响他果断地加塞儿和转向。一路他接到好几次电话，我猜是家里老婆催了。

折腾了大约半个小时，我们终于摆脱了堵车，路牌告诉我们，刚才走了不到 2 公里。车速上去，车里的人开始欢呼，我坐在头一排，对着身边的司机大叔说，您是一艺术家，博得车里不少人的认同。

我很累，又很兴奋。这辈子我还从没见过这么多不同种类的车和生物挤在一条道上。想想，在这种路上开车得处理多么复杂的状况。

我想起曾读过的书，比托马斯•弗里德曼牛逼 10 倍的《金融时报》记者记者爱德华•卢斯写的一本比《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牛逼 10 倍的书，叫《不顾诸神：现代印度的奇怪崛起》。这本书的一大观点是，印度有太多不一样的群体，是个共识太少，交流成本又很高的国家，所以它的崛起很奇怪。

杂乱无章的交通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就像阿瑟夫，他需要下车和司机沟通，和指挥沟通，再和后面的车沟通，每次沟通都要大嗓门的喊出来，夹杂各种手势，目的就是为了得到即时的行驶权。即使在红绿灯少见的德黑兰，也没见过这么玩的。

我想，这条路就像是印度崛起的姿势一样，不同的车和人，当然还有牛，象征着不同的群体，而向前走，是大家的共识，很遗憾，彼此没有良好的沟通，也没有形成秩序，谁先谁后，谁左谁右。

印度人就像我们的司机，依然找到了向前走的办法。

很遗憾，我的兴奋是短暂的。在进入德里城区之前，我们又经过了三个一模一样的卫星城。

我真恨不得司机直接给我们开到德里机场，那是我一生当中最想念祖国的时刻之一。

随感：为什么想去印度

大半夜写游记，没写出来，倒写了这么个怪东西，见笑。

从写第一篇国际新闻报道算起，至今 9 年。而我的印象里，关于印度的报道只有两篇，一篇是 2005 年关于藏南跨境河流发生堰塞湖，导致两国交涉的报道 [1]，另一篇是关于印度某些地区反对可口可乐工厂过量抽取地下水导致农耕用水困难的报道，已不记得时间。

印度是中国邻国，自古互通商贸文化，目前同为新兴国家，世界第二人口大国，亚洲格局核心因素之一，应该说，无论从什么样的角度、立场和利益诉求，印度都不应该在国际新闻报道中处于冷门地位。可实际上它恰恰又是我们视野中的“灯下黑”。

究其缘由，最为主要的，可能是因为话题敏感。比如中印战争、边界划定、西藏问题、与巴基斯坦关系等等，党在外交上一贯正确英明神武，但谦逊，不许我们宣传。另一方面，则大概是东方民族的文化忽视问题，既大家关注的焦点都在西方，美国、欧洲等。这样的问题在中东、南亚以及东亚均存在。

最典型的例子，关于“东西方文化比较、交流”是个长期流行的研究课题，在所有东方国家都可以找到。但在不同的文明体中，所谓东方，均以自己的文明为核心，为代表。近东以伊斯兰世界，印度以南亚文明，中国自不必说。

这反映了东方国家的世界观念，其实是彼此忽视的。这也推演出，现代亚洲这个概念是否立得住脚。 [2]

所以，我想去印度的第一个理由就是想为未来做准备，谁知道哪天党不谦逊了，我们可能有报道空间？

报道空间出现的可能并非没有，尤其是在气候变化议题上。去年我在哥本哈根大会上，中国代表团成员曾透露，巴厘岛以后，基础四国代表在 2 年来的历次会议上有个惯例，每天开完大会再开个大约半小时的内部会议。而在立场和利益诉求上，中印两国是最铁的。

另一个证据是，今年年初印度环境部长访华，印度大使馆竟然搞了部长与记者交流的活动，当然，主要还是面对在华外媒。在活动现场，我感到印度外交官的态度很友好，甚至开放。有趣地是，这位部长回国后，因为夸中国而遭到国内部分舆论批评。

第 3 个证据大概算是这两天温家宝总理的高调访印。据新闻他此行带了不少礼物过去，双方商业合作前景看涨。这是他自 2005 年以来的首次访印，和上次一样，还是先去印度，后去巴基斯坦。

我想去印度的第 2 个原因当然是，对印度好奇。我好奇的地方有 4 点：首先，印度发展的现状。以前周轶君姐姐推荐给我一本好书，《不顾诸神：现代印度的奇怪崛起》，作者是《金融时报》记者爱德华·卢斯。 [3] 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收获是，古印度很少像现在这么统一过，过去是北部印度一体，南部诸多邦国共存的文明体，而现代印度是被他者，主要是英国人造出来的国家。这简直就是个先有国家后有共识的地域，这意味着，在印度，确立国家共识、确立中央政府的权威很难，国家各个层面的交流成本都很高。说得直接一点，任何立场、观念或利益，似乎都存在强大的对立面。有人说 YES，就有人说 NO，有人说往东，一定有人说往西。

如果这个推论是正确地，也就意味着，在印度的政治家要想在全国层面去推动件事就非常难，这将对全国的发展造成很大困难。

有趣的是，后来在印度的经历加深了这个印象。当然，这也是个问题，既在去印度之前，我脑子里已经形成了这样的认识。

好奇的第 2 点是，西方在印度的殖民史。我看过与印度有关的另一本书是《亚洲史》[4]， 对我来说，这本书最有趣也是最有收获的部分之一，就是西方列强在亚洲地区的殖民历史。可以看到，不同时期的殖民者对于在印度的殖民地采取了不同的态度，比如最早期是温文尔雅的，抱有美好幻想的东方主义者，他们以东方为西方的镜像，比较的对象，学习的对象。早期的英国殖民者喜欢给自己划个圈，自己活在圈里，印度人活在圈外，除非必要，不与本地人做过多的交流，不介入当地的公共事务。而在 19 世纪以后，英国殖民者变了，他们开始扩大地盘，从口岸城市深入内地，介入内地的政治斗争，进而直接统治，我猜测这大概跟工业革命有关，游戏规则变了，能力变了，资源、市场的需求增加等等，当然这仅仅是猜测。

基本上由于教育，我们的印象里，殖民主义与殖民者基本就是妖魔，是邪恶的。但《亚洲史》中并不乏伟大的极具道义感染力的殖民者，更不乏电影《加勒比海盗》中杰克船长那样富有个人魅力的人物。我想，让我离开熟悉的故乡，跑到非洲赞比亚去殖民，这需要什么样的动力和理由？

可是，在我看来，我们对那个年代的理解远远不够，甚至是幼稚的。举例来说，在印度殖民地，英国人的地方禁止一般印度人进入。比如在英国人的公园门口立个牌子，写上印度人禁止入内。我很怀疑，英国人把这种习惯带入了中国，导致了那句传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传言。 [5]

所以我相信，在做简化的单一价值判断之外，应当对那个年代的人和事做更深入的认识，不仅是认识当时的殖民者，也要认识被殖民者在面临外来因素时产生的反动。我也相信，通过中国与其他东方诸国的比较，会对理解中国的近现代化进程提供另一个视角，从而有助于理解我们自己。 [6]

我对印度好奇的第 3 个理由则是它对诸多文明的包容。说直接点，这地方神多，外来的神也多。我的个人兴趣集中在 3 个宗教，伊斯兰教的伊斯马伊利派，这个派别的历史变迁非常有趣，在中国，可能有一部分塔吉克族从属于该派，该派现在的领袖比达赖小 1 岁。而在历史上，该派最著名的人物，是山中老人哈桑，曾让奥斯曼人和十字军闻之色变的好汉。据说英语“刺客”一词的词根就来自他。这个教派在蒙古人灭了波斯后潜伏到了印度。 [7]

另一个是袄教，萨珊王朝被大食灭掉后，他们也有相当一部分跑到印度。第三个是巴哈伊教，几乎是伊斯兰教什叶派中唯一一个成功转型现代化的宗教。据说他们在联合国势力强大。80 年代新疆有一些穆斯林直接转教为巴哈伊教。 [8]

我在印度注意到的另一个宗教是锡克教，本来很想去他们的圣地去看金庙，从照片看那真是人间罕见的美丽建筑，可惜时间的问题，错过了。 [9]

好吧，我再补充一个，关于在印度的中国人，印度人怎么看中国人也是我好奇的一部分。

-------------------注释---------------------

[1] 即使在今天，这依然是中印关系的敏感话题。但老实说，我觉得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上游下游之争，大概是最古老的国际关系议题之一，有无数的先例原则可寻，而且基本上不是零和博弈。

[2] 说句题外话，这种现象会让东南亚显得非常有趣。因为东南亚地区是三个东方文明均渗透影响过的地方。在一个东南亚城市，可以看到清真寺、印度神庙、中国佛教、会馆、妈祖庙等等。我在越南看过很有趣地一个现象是，外面看是个印度庙，而内部供奉的，却是天后。

[3] 这是我见过的国际报道记者写的最好的书之一，最可贵地是能够在写作上，将印度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多方面融入一体，却不显乱。这本书让我对《金融时报》肃然起敬。从成就上，我认为它比《纽约时报》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那本著名的《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高很多。当然后者也是好书，好读、好玩。托马斯老师的最大特点大概是善于用最简单的语言报道。

[4] 关于亚洲的概念问题，我的偶像及老师黄章晋曾有过论述，这里做点补充。亚细亚的观念，最早应该出现在地中海世界周边。据希罗多德在《历史》中介绍，他同时期及此前的地中海周边居民把世界分成三部分，亚细亚、欧罗巴、利比亚。亚细亚的东部边界至多到印度北部的印度河，先被波斯人后被马其顿人占领到的地区，西边到博斯普鲁斯海峡。博斯普鲁斯海峡以西至直布罗陀海峡是欧罗巴，红海以西，地中海以南是利比亚地区。而希罗多德自己则认为埃及应该单算一块区域。

无论如何，那时候的亚细亚并不包括远东、东南亚以及印度河南部的地区。现代亚洲沿用了这一名词，但范畴将近东、南亚、远东囊括其中。问题是，这种分法掩盖了内部的分歧。由于波斯人、雅利安人、蒙古人甚至阿富汗人的征伐，南亚与近东勉强算融入一个世界，但远东只有在元朝的短短几十年与南亚近东被圈入同一个世界里。

有趣地是，现代亚洲运动会的起源，其实是两个，一个是远东运动会，一个是南亚运动会，主要的发起人分别是中国和印度，都是在 20 世纪上半叶，奥林匹克精神成为近代化潮流波及到两个地区的时候。两者其实是奥运会在各自区域的山寨版。只是在 20 世纪的下半叶，二者被奥林匹克委员会招安合并，才形成一个在表面上统一的亚运会，它的特点之一恰恰是允

许地方特色的山寨运动存在，比如卡巴迪、藤球、武术等。这些运动往往是各地传统竞技与现代体育精神、规则的妥协产物，当然，也有来自殖民者的运动，比如板球。

经过数十年十几次亚运会的举办，地区性运动也渐渐有其他地区的队伍参与，这和亚运会的宗旨一样，体现了某种促进“亚洲一体”共识的努力，但会否成功，还需要历史检讨。很显然，这种努力程度的波动，与两地区的交流合作趋势相关。

[5] 去年在采访时我曾问过一个研究上海近代史的老师，据她说，上海英属殖民地的公园门口确曾立着牌子，上有关于华人禁止入内的规定，也有关于狗禁止入内的规定，但两者并没有写在同一条款里。考虑到英国人惯有的骄傲感和时代背景，歧视本地人的情况很可能存在，但明显具有挑衅性质的公开的侮辱性的规定却显得很反常，因为它只会给在华英国人带来不安全，而不会有别的好处。

[6] 稍加注意就会发现，近东至远东的近现代过程几乎是同步的，比如伊朗的立宪运动是在 1905 年，中国是在 1906 年，观念和人的出现也有相似的地方。比如民族主义的出现，对传统的反思浪潮的出现及采用的修辞、理论等等，甚至可以断定，各国都有自己的孙中山。因西方世界的刺激而近代化及对近代化的反动，这大概是亚洲国家与民族的最大共识。而且在殖民者将亚洲诸国联系在一起以后，各国互为镜像、比较的思潮也出现了。伊朗礼萨汗与土耳其凯末儿的惺惺相惜自不必说。中国和印度的民族主义者也曾相互勾搭，在加尔各答，就有一条路叫孙逸仙路。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印度及尼泊尔至今还有毛泽东的粉丝。

[7] 前年去伊朗在张湛老师的引领下我去过山中老人的总部，收获很多，那是另一个故事，有机会再讲。

[8] 巴哈伊教起源于 19 世纪的伊朗，是伊朗什叶派受到西化刺激的产物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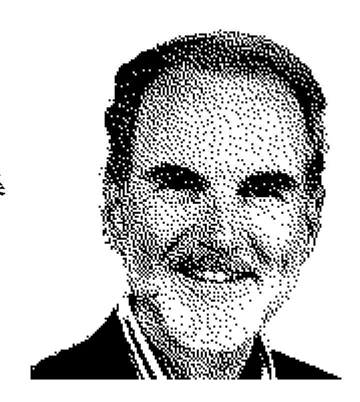
[9] 锡克教基本上是吸收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教义，攒出来的宗教。它的流行区域主要就在印度西北部，但从人口算，却是世界第五大宗教。

（秦轩，南方周末记者。原文链接：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7d90ab55767e5694、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f88a5937f4e0bb4d、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4a2769f1aae135a0）

【闻】

7-3 Peter Ackerman、Jack DuVall：《非暴力抗争一百年》之《印度：自治运动》

“如果印度不能把自己从英国人带来的残暴和低贱的生活方式中解脱出来，即使像恐怖分子所想的那样用暴力把英国赶出去，又怎么样呢？”





一种更强有力的解决方法

在世界各地数百万关注报纸上关于 1905 年俄国革命的报道的读者中间，没有谁比在南非的一位低调的印度律师更加满怀热切。对 36 岁的莫汉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来说，发生在俄国的事件是一个新世界的征兆。了解到俄国人早先曾试图通过暗杀统治者来推翻独裁统治以后，他相信他们现在“找到了另一种虽然简单，却比叛乱和谋杀更强有力的解决方法。”甘地写道，俄国人“宣布总罢工并停止了所有工作。他们丢下工作，告诉沙皇除非正义实现否则他们决不会恢复工作。沙皇又能怎样应对这种情形呢？……用刺刀驱使罢工者重返工作，这甚至是沙皇的权力都做不到的。”1

这不是甘地第一次了解到人们用非暴力行动手段（nonviolent sanctions）来反对政府。19 世纪 80 年代末，当甘地还是伦敦的一名法科生时，他就开始密切关注包含抗租（rent strike）行动在内的爱尔兰自治（home rule）运动了。他也知道南非和印度已经在抵制白人统治者强加的限制和税负。而正当他评论俄国事件的时候，他又了解到一场孟加拉印度教徒为反对英国分割他们领土的计划而抵制英国布料的行动。2

甘地注意到，在这每一个案例中，人们都是通过拒绝合作而非攻击来挑战政府，它们的经验表明，“即使是最强大的政府，离开被统治者的合作也就无法统治下去了。”在俄国正确的东

西，在他那印度人正在反抗英国统治的家乡当然也同样正确。甘地断定，“英国对印度的统治之所以可能，仅仅是因为那里有服务于它的人民。我们也能展现出俄国人民已经展现过的同样力量……”不过在 1905 年，当这位年轻律师的思绪从已经发生在俄国的事件，飘向可能会在他的家乡印度发生的事件时，他依然是南非正在进行的事态中的重要部分。3

甘地在南非

“容不下一位自尊的印度人”

甘地出生在印度西海岸一个小土邦（princely states）的讲古吉拉特语的（gujarati-speaking）家庭，和孟买、加尔各答这样的城市相比，这里比较闭塞。家人希望他能走父亲的老路，当一名地方行政官员，这就是他们送他去伦敦学习法律的原因。但在英国的学习并没有让甘地准备好在印度从事法务工作，1891 年回国后，他被证实在法庭上极端胆怯：他在代理的第一起案子中结结巴巴，在进行交叉询问的中途放弃了。他不久便沦落到回到家乡的拉杰果德（Rajkot）撰写法律文书维生。当他得到一份代表一家印度公司在南非的贸易商的工作时，他抓住了这个机会——离开在职业上惨遭失败的印度，在新的大陆寻找新的起点。4

成千上万的印度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大多数是为了清偿债务而去割甘蔗或捡咖啡豆的契约劳工（indentured laborers）。他们挣得自由以后，很多人还是会留下来从事商人、园丁或仆人之类的营生。也有从甘地的家乡古吉拉特（Gujarat）地区移居而来的印度商人。世纪之交时，仅纳塔尔（Natal）一地就有 5 万印度人，虽然远远少于 40 万非洲人，但大体上和白人人口持平。到处都有规模较小但迅速发展的印度人社区。5

印度人，无论是印度教徒、穆斯林还是基督徒，富人还是穷人，受过教育的还是未受教育的，高级种姓还是低级种姓，在南非都有。不过在白人看来，他们都是“苦力”（coolies）或“亚洲人”（Asiatics）——一个低等种族。对他们的歧视已经被固定为一系列的成文法律（这违反了维多利亚女王在英帝国范围内保障免受宗教或种族歧视之害的 1858 年文告）。他们的选举、入境及在国内旅行、从商以及选择居住地的权利都受到限制。6

没多久甘地自己就感受到了这些限制。就在到德班（Durban）一周以后，和任何一位体面的大律师一样，他订了张头等火车票，去比勒陀利亚（Pretoria）为一桩案子辩护。在一位白人乘客投诉他以后，他被要求离开头等车厢；他当场拒绝，然后被踢赶下火车。随后，也是在同一行程中，他不能和欧洲乘客一起坐在公共马车内，而不得不和驾驶员一道坐在外边。“我明白，南非容不下一位自尊的印度人，”他后来写道。7

在德班，甘地经营着自己欣欣向荣的法律业务并以高道德标准——也因乐意妥协——而闻名。此时，印度社群饱受一系列歧视性法律之苦。当纳塔尔政府提议拒绝承认他们的选举权

时，甘地组织印度人反对这样的立法。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先是在德班，之后在约翰内斯堡——他开展了新的抗争，通过诉讼、请愿以及媒体，反对向前契约劳工征收人头税、限制移民、为印度商人设置的许可程序（licensing procedures）以及对印度人从商和居住地点的限制。他虽然取得了一些暂时性的胜利，但不可能阻挡住反对印度人的浪潮。8

令甘地印象深刻的俄国事件发生一年后，德兰士瓦（Transvaal）（甘地后来生活的地方）通过了进一步限制印度移民并要求他们持有登记卡的法律。甘地义愤填膺，觉得他们必须采取新的行动方式。1906 年 9 月在约翰内斯堡帝国剧场的一次聚会上，甘地请求每个人宣誓不遵守新法；当法律生效时，他组建的“消极抵抗协会”在登记机构外进行纠察。接着，登记卡在一所清真寺外被付之一炬，人们大规模非法越境进入德兰士瓦，而且矿山工人举行了罢工。数千人被投入监狱——甘地本人被关三次。最后，政府在 1914 年态度软化，撤销了登记法案及其它一些冒犯印度人的法令。无论是印度教徒还是穆斯林、矿山工人还是商人，都参加了甘地领导的这场运动，并以违反不公正的法律和因此入狱的方式迫使变革发生。9

“消极抵抗”

在南非的多年奋斗把曾在印度吞吞吐吐、不成功的年轻律师甘地，塑造成了一位工作在另一个复杂而多样的社会中的自信政治家。但在这个小巧的印度人身上，也发生着另一个同样重要的转变。差不多一到南非，甘地就开始寻求一种他此后一生坚持的灵性认识（spiritual understanding）。尽管他依然是个印度教徒，但他在家乡、伦敦和南非认识并结交了穆斯林、基督徒、拜火教徒（Parsis）以及耆那教徒（Jains）——他受与之通信的耆那（Jain）教徒、珠宝商和诗人梅塔（Rajchandra Ravjibhai Mehta）的影响尤其深，梅塔向甘地强调“真理的多面性”——没有哪个人或者宗教可以全然知晓“真理的多面性”。1909 时甘地写道：“各宗教是通往同一地点的不同道路。既然到达的是同一目标，我们选择不同的道路又有什么关系呢？”10

对于认为所有生命都有共同源头的甘地来说，灵性和实践活动不可分离，而他也努力身体力行。在他看来具有实践价值的一项灵性原则是 ahimsa 或（大体上可翻译为）“非暴力”（nonviolence）。既然没有哪个人或者组织能够宣称绝对掌握真理，就没有人应该使用暴力强迫其他人反对他们对真理的不同但也同样真诚的理解。非暴力（Ahimsa）在耆那教、佛教（Buddhist）和印度教思想中有很深的根源，不过甘地在基督教思想中也找到了同样有力的箴言式表达，特别是在《登山宝训》和托尔斯泰的作品中。1894 年他阅读托尔斯泰的《天国在你心中》时，发现自己完全被这位俄国人反对暴力的雄辩说服了。11

非暴力（Ahimsa）对政治冲突来说有着非常明显的意义。甘地相信，用以反抗压迫的暴力不仅是不道德的（wrong），而且是一个错误（mistake）。它不可能真正地终结不公正，因为它所激发的偏见和恐惧正好助长压迫。对甘地来说，不正当的手段从来不会产生出正义的结

果。1909 年时他写道：“手段可以比作是一粒种子，就是一棵树的根部。手段和结果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正和种子与大树之间的联系一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12

然而，甘地还得找到奏效的政治行动方式。作为印度人的领袖，他在南非的行动是非暴力的，但是演说、请愿、通信及与官员会谈几乎不可能改变种族主义的态度和法律。他寻找的是一种能迫使白人认识到印度人应被平等对待这个道理的方法，而在帝国剧场宣誓之后的抗议运动中，他找到了它。

最初他称它为“消极抵抗”（passive resistance，后来他对这个提法弃之不用）。手法很简单：宣布反对一部不公正的法律（例如对迁徙自由的限制）；（以非法越境的方式）违反法律；最后承担后果（逮捕、人身伤害、监禁）。甘地相信，抵抗者从容而不失尊严地承受苦难，会开启压迫者受蒙蔽的双眼并削弱压制背后的敌意；这样，他们就会不得不认识到什么是正当的，而不是他们的对手被迫要屈服了，这将使他们改变自己的想法和行动。甘地把这种行动命名为“非暴力抵抗”（satyagraha，该词糅合了印度教中的“真理”和“坚持”这两个词的意思）。13

不过，“非暴力抵抗”（satyagraha），很快就有了更宽广的含义，这种含义更多地与其可行性有关，而较少与其灵性作用有关。甘地认识到个体牺牲的示范价值的局限：即使是最坚定的抵抗者，所能承受的苦难也十分有限，难以尽快消解稳固的政权所惯有的傲慢和偏见。甘地认识到，要让“非暴力抵抗”（satyagraha）变成一种实用的政治手段，它就必须产生让它的对手来承担的压力。“如果没有无论是道义的还是物质的力量来支持，我不相信呼吁会有用”，甘地写道。14

甘地相信，“非暴力抵抗”（satyagraha）改变对手立场的潜力，源自统治者依赖可以在服从和抵制之间做出选择之人的合作。尽管他一直主张“非暴力抵抗”（satyagraha）能够向对手揭示真理并争取到他们的支持，但他经常用军事术语来表述它，并策划意在使对手不退步时利益受损，却对感化他们着墨无多的行动。就这样，他使“非暴力抵抗”（satyagraha）成了那些关注如何产生变革甚于良知判断的人的一种现实可行的选择。15

因此，甘地并没有使非暴力（ahimsa）成为绝对的信条。他在官方有组织的暴力和受压迫人民的自发暴力之间做了区分。他对前者痛心疾首，对后者虽不宽恕，却说它是“可以理解的”，甚至还会有助于实现维护尊严的目的——终其一生，他都坚持诉诸暴力总比卑躬屈膝的怯懦可取。甘地的非暴力（ahimsa）和“非暴力抵抗”（satyagraha）不是专为圣人准备的；它们被构思出来，供热爱正义的人民用以规划如何促成变革。16

1909 年夏天的伦敦之旅促使甘地更多地思考如何将“非暴力抵抗”（satyagraha）应用于印度。虽然甘地此行的目的是为南非的印度人游说，但他卷入了关于他的祖国的争论。在他到达

前不久，居住在伦敦的一个印度青年暗杀了英国官员威廉•柯森威利爵士（Sir William Curzon-Wyllie）。这个行为，以及移居国外的印度人抱有的恐怖主义是实现解放的最有效途径的观点，都让甘地非常震惊。为了反驳这种看法，在乘“基尔多南堡”号（Kildonan Castle）返航的途中，他花了十天时间，在轮船的信笺上写一篇文章。他写得如此飞快和紧迫，以至于右手发酸时他只是换到左手继续写。17

写成的作品《印度自治》（Hind Swaraj）最先发表在甘地在南非主持的古吉拉特语周报《印度评论》（Indian Opinion）上。在这篇对话体文章中，“读者”表达的是印度恐怖分子的观点，“编辑”代言甘地。文章谴责把恐怖当作民族抗争的策略，鼓吹非暴力的“非暴力抵抗”（satyagraha），在关于暴力的争论之后，文章还很好地讨论了印度民族主义者所追求的目标。民族主义者声称他们向往“自治”（swaraj）——和英语中的“政治独立”（political independence）或“自治”（home rule）的概念相当。甘地说他太向往印度自治（swaraj）了，但是他把它定义为“自我治理”（self-rule）：“我们学会管理我们自己，这就是自治（swaraj）。”18

甘地问道：如果印度不能把自己从英国人带来的残暴和低贱的生活方式中解脱出来，即使像恐怖分子所想的那样用暴力把英国赶出去，又怎么样呢？甘地呼吁印度人重返他们本真的印度之根；他认为一旦这种形式的自治（swaraj）实现了，政治独立的问题便会迎刃而解。“如果我们整理好自己的屋子，那么只有适合住在它里面的人才会留下来。其他人会自觉离开。”

不过自治（swaraj）的含义可不止抛弃西方作风那么简单。他承认印度生活中有不能归咎于外来统治者的严重“缺点”，比如童婚。他解释说，自治（swaraj）同样意味着变革印度自己的作风。它可不只是赶走英国人就能获得的政治境况。它也是通过先驱除自我之恶才能获得的社会和个人境况。19

在南非的二十年中，甘地对这种形式的自治（swaraj）身体力行。他放弃西式作风，身着朴素的印度农民服饰，让自己的孩子在家里而非欧式学校里接受教育，他或家人生病时也不使用西药。甘地还抛弃了一些根深蒂固的印度习俗，特别是和种姓有关的规则：他和家人完成全部家务，包括像洗衣服、理发、清洗夜壶等被认为只有最低级的种姓才做的事。他的生活以体力劳动、简朴和纯净为特征，这在他克制的饮食习惯和 1906 年的禁欲起誓中表现得最为清楚。20

不过，他返回印度却是由于在外工作的原因。南非政府决定废除登记法案以后，甘地认为结束那里的政治和精神体验，而把所得的学识应用于印度的时间到了。他带着独特的经历归国：生活在国外让他有了全面审视印度的视角，而空间的阻隔又使他远离国内政治争论的陈腐氛围并帮助他发展了自己的思想。1914 年 7 月，怀揣他自力更生（self-reliant）且自由的印度之梦，甘地启程回国。

英国统治

领主

十六世纪英国人最初来到印度时，他们的身份是商人而不是征服者，他们在沿海建立起坚固的据点，并未染指尚在中亚入侵者的后代穆斯林莫卧儿（Mughal）皇帝控制下的印度内地。但莫卧儿王朝并没有建立中央政府，而代之以同地方统治者做交易，由后者为他们征税和提供兵源。十八世纪时，这套体制由于印度内部不同势力之间纷争涌起而分崩离析。

由于政治动荡危及商业，垄断英国对印贸易的东印度公司组建了军队，并于 1765 年控制了它在加尔各答的总部周围的孟加拉。在随后的五十年里，东印度公司把它的势力向西和向南扩展，覆盖了印度次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它的军队也增长到 2 万 5 千人以上。它拥有的领土（domains）被分为三个“辖区”（Presidencies）：加尔各答、东南沿海的马德拉斯（Madras）和西部的孟买。英国统治（raj）牢固地建立起来了。但是统治印度——面积相当于除俄国之外的欧洲——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东印度公司为节约直接管理的成本起见，以提供军事保护为回报，和支配着广阔区域的王朝（princely dynasties）签订了协议。21

英国人一直明白，他们离不开自己的印度盟友们。马德拉斯的东印度公司官员托马斯•蒙罗（Tomas Munro）1817 年时写道：“毫无经验以及对人民情况的无知，使得我们更需要寻求既有权势集团（regular establishments）的帮助以管理这个国家的内部事务，而出于安全考虑，我们应该有乐意支持我们统治的村庄头领群体。”服务于英国的印度人可是好处多多：薪水、地位、影响、分红（rights to revenue）以及其他物质和象征性的奖赏。22

在收买失败的地方，英国人诉诸武力。1857 年印度士兵和平民的反抗横扫整个印度北方，英国人不但花了一年多时间才控制住局势，而且援军也来自海外。地方统治者对英国统治（raj）久已不满的地方，自然麻烦不断。但在乡村权贵因地位和财富而向英国人感恩戴德的地方，他们维持着秩序，没有发生动乱。一份政府报告承认，忠实的诸侯们是“防止我们被波浪卷走的防波堤。”23

在东印度公司被解散，印度成为英国的直辖殖民地（crown colony）以后，政府接管了保持印度权势人物的忠心的工作——用金钱、土地和荣誉等奖赏，并提拔他们进入谘议会（consultative assemblies）。他们的控制手段从一开始就在改进，但英国的战略始终如一：通过为合作者提供相应的奖赏和保护来控制印度。甘地 1906 年时这样写：“英国人并未征服印度，是我们把它献给了他们。就力量而言他们无法在印度立脚，但是我们帮助了他们。”24

民族主义者

一些印度人一直在反抗英国统治（raj），而到 19 世纪末期时，少数人加入进来，让这种反抗成为一种全民性的事业。这些人大多是专业人员，他们所受的英语教育帮助他们跨越了印度杂乱的方言所带来的障碍。作为记者、律师或者公务员，他们常搭乘英国统治者（raj）修建的快速而便宜的铁路在全国四处流动。对他们而言，印度逐渐不只是一堆风格迥异的条块，而同时也是一个完全融和的整体。他们不但使用英国统治者（raj）的语言和铁路，而且开始带着民族主义的新思维吸收和应用欧洲十九世纪的政治观念。25

民族主义政治的中心是成立于 1885 年的印度国大党（the Indian National Congress）。每年十二月代表们聚集在一个城市，进行三天的会议、演讲和社会活动，最后通过决议并呈送英国官员，然后闭会。国大党最初根本不是个煽动性的团体；它由主张改革而非推翻政府的温和派控制。他们批评英国统治（raj）加剧了贫困，设法减少帝国对印度资源的攫取，但他们的方法十分温和——决议、请愿和媒体宣传——并以“忠实的反对派”自居。英国人只当他们是刺头，从来不认为是什么威胁。26

政治活动可不是民族主义者的唯一出路。有些人更沉不住气，完全终结英国统治（raj）的决心更坚定，因此乐于采取军事行动。第一个秘密恐怖团体组建于 19 世纪 90 年代。他们认为摧毁英国统治（raj）就像杀掉管理它的英国官员一样简单——一种后来的 20 世纪的革命者所共有的关于暴力力量的错误观念。虽然他们选择的制裁方式和温和派不同，但激进分子也有同样的战略构想：自上而下地改变印度。

在波澜壮阔的印度民族主义潮流中，有两股不同的倾向：一种是力主促进本土工艺和教育发展的“建设性工作”（constructive work）；另一种更具政治性，由国大党中打算动员民众停止和英国合作的极端分子领导。极端派领袖之一保•甘加达•提拉克（Bal Gangadhar Tilak）1902 年时说：“虽然被压制和忽略，但你们应该意识到自己拥有使政府管理失效的力量，如果你们选择使它如此的话。是你们在管理铁路和电报，是你们在帮助解决问题和收税……”27

任何设法使印度人加入民族主义运动的领袖，都不得不先解决印度林立的宗教和语言的隔阂问题。和多数印度人一样，大多数国大党领导人都是印度教徒。但 19 世纪末时，约四分之一的印度人是穆斯林，他们有些是早期入侵者的后代，有些是从印度教皈依而来。穆斯林在印度北方的部分地区和孟加拉是多数或接近多数。有少数印度人是锡克教徒，他们多数居住在印度北部平原上的旁遮普（Punjab），在当地是规模可观的少数族群。

虽然许多国大党成员和受过教育的印度人都精通英语，但其他人都说地方土语。印度有两个主要的语族（linguistic groups），每个语族包含许多不同的语言，每种语言又包含不同的方言。印度北方以印度伊朗语系（Indo-Iranian languages）（包括印地语、乌尔都语、孟加拉语

和古吉拉特语）为主，德拉维语系（Dravidian languages）（像泰米尔语和泰卢固语）则在南方占优势。结果形成了政治和文化风格迥异的混杂语言区域。

在这些差异之外还有另一个难题：无论何处，人们生来就有特定的种姓，种姓决定了他们的社会阶层归属和在宗教仪式中的角色，还有他们可以和谁结婚以及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在大多数地方，像婆罗门（Brahmans）这样的高等种姓被禁止从事体力劳动，他们一般是地主、行政官员或商人。最底层则是从事鞣制皮革或掏粪之类工作的"贱民"（untouchables）。虽然种姓制度不是全然僵化——人生选择并非绝对捆绑于出生时的运气——但它还是把许多印度人区隔了开来。

英国人竭力强化印度的这种区隔状态。比如，当东印度公司 19 世纪 40 年代中期吞并锡克教徒治下的旁遮普时，它使用以孟加拉人为主的军队来进行这项血腥工作。而当孟加拉士兵十年以后在印度北方叛乱时，锡克教士兵则被征召来报复和镇压。然而，这种分而治之的策略只会加剧早已存在的紧张局势，其中最严重的是宗教问题。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敌意经常升级为群体暴力冲突。比如，1893 年一场印度教徒阻止穆斯林在节日里宰牛的运动引发了许多严重的骚乱。28

如何使印度矛盾重重的地区团结起来，只是二十世纪开始时民族主义者们面临的困局之一。最终目标是改革还是结束英国统治（raj）？如何把运动拓展到受过良好教育且富足的国大党成员的小圈子之外？应该使用合法且无破坏性的手段、大众动员，还是也使用暴力？1914 年时，无以解答这些问题——也没有人来指引方向。但这种情形即将改变。

"我看到了弹痕"

就在甘地从事社会改革和组织地方非暴力行动的同时，国大党继续鼓动自治（home rule）。但它的领袖们很快认识到，他们需要甘地无人能比的声望及其作为组织者和战略家的能力，而甘地也越来越多地确信，在领导层实现自治（swaraj）与建设基层自治（swaraj）密切相关。他们都准备进行合作了。

最终英国人给他们提供了合作的契机。1919 年的《罗瓦特法案》（Rowlatt Act）扩大了战时紧急措施的适用范围，包括对煽动行为进行行政拘留、由法官而非陪审团审判的规定。甘地感到非常震惊。"我觉得我不可能再对能如此立法的权力通过的法律表示平静的服从了，"甘地说。现在，他首次考虑进行一场全印范围的"非暴力抵抗"运动（satyagrahas）。35

甘地首先策划了一场由宣誓不服从法律和杜绝暴力的守纪律的积极分子进行的小规模运动。他指定在 1920 年 4 月 6 日，模仿习俗中称作"罢市"（hartal）的哀悼日，进行绝食和祈祷；然后抗议将局限于公开出售禁书。甘地向温和派政治家们保证，这样行事会使反对英国统

治（raj）的活动远离暴力。他在给一位温和派领袖的信中说："成长中的一代将不会满足于请愿等行事方式。在我看来，'非暴力抵抗'（satyagraha）是阻止恐怖主义的唯一方法。"36

罢市（hartal）基本按原计划进行：遍及全国，人们停止工作，关闭商铺，进行集会。然而，罢市之后发生的事件脱离了甘地的控制。他已遭逮捕的传言激怒了阿姆达巴德的作坊工人（mill-hand），那里超过五十栋的建筑被烧毁，二十八人身亡。在印度北部的旁遮普，罢工和集会演变成了抗议者和警察的街头冲突。驻守旁遮普阿姆利则市（Amritsar）的雷吉纳德•戴尔将军（General Reginald Dyer）觉得这实在太过分了，因此他决定镇压动乱——也算是给人们一点颜色看看。

13 日，戴尔决定禁止超过四人的公开聚会。民族主义者们对其置之不理，召集人们于当天下午在贾利安瓦拉广场（Jallianwallabagh）——一块开阔的露天场地，四周都是砖房，仅有几个出口——集会。数千人开始聚集时戴尔置若罔闻，不过下午 4 点刚过，他就指挥着两辆装甲车和大约五十名士兵赶来了。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他就下令开火了。十分钟后他们撤走了，而现场四处都是死伤者。（一个英国官方委员会的统计是 379 人被杀；印度的说法则是高达 1500 人。）随后，毫无悔意的戴尔承认集会本来可以不流血而结束，但是他使用了"从军事角度而言能够产生必要的道德的和普遍的效果的最低限度武力……不能仅考虑在现场的人，而要顾及整个旁遮普。"37

接下来的几周里，英国人贯彻执行了这项"道德效果"。戒严开始，禁止集会，举行走过场的审判，刑讯囚犯并在公共场所执行鞭笞和死刑。军用飞机轰鸣而过，从上面扫射印度人。在很多城镇，印度人被命令向英国军官敬礼或鞠躬。戴尔更要求，印度人在经过英国妇女受到过攻击的道路时，必须手脚并用地爬行。38

幸存者永远不会忘记阿姆利则和它的创伤。后来的拉合尔大学（Lahore University）学生活动家希瓦•杜阿（Shiva Dua）记得自己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被家人带到贾利安瓦拉广场时的情形。她回想道："我被慢慢地抱起来，我看到了墙上的弹痕。我们带回了被血染成红色的泥土……姐姐说：'这是圣物，应该存在银匣子里。你必须每天为它献花，这是每天清早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旁遮普的腥风血雨只能使人们更渴望自治（self-rule）。39

反罗瓦特法案运动不经意引起的暴力使甘地感到震惊。他禁食三天进行忏悔，但他对英国统治的态度也开始强硬起来。他把英国官方的阿姆利则事件报告称作"粉饰"（whitewash），戴尔将军成了部分英国民众心目中的英雄的消息尤其使他愤怒。他之前还对印度在英国的宪政框架下实现自治（swaraj）抱有希望，而现在却认为英国统治（raj）"穷凶极恶"且"毫无诚信可言"。他认为，印度人不应该再容忍这样一个政府了。40

不合作

为了团结印度人反对英国统治（raj），甘地转而向国大党寻求组织上的支持，并介入其党务，使其发展壮大，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一个精英辩论社团上。国大党扩展了它在各省和地方的委员会，吸收新成员并为发动大规模抗议活动进行鼓动工作。温和派对宪政之外的手段充满疑虑，但是甘地的才干使得他们难以阻挡。很快，他就赢得了国大党对不合作的认同，他起草的旨在使其更有效率、更具代表性的新章程也得到了批准。从形式到实质都在发生改变：西装革履不再成为风尚，取而代之的是甘地所倡导的手工布料或印度土布的衣服。41

不合作的不同阶段也设计好了：在筹集起资金、建立好组织以后，开始抵制学校和法院；接下来将抵制外国布料，同时推广手工纱线织成的布料。不合作将以印度公务员辞职和在筛选出的少数地区进行谨慎的公民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作为结束。甘地希望通过细心地筹备、循序渐进地进行以及对以身试法的严格控制，这场新的运动不会像在旁遮普的那样衍变为暴力。42

虽然很少有律师抵制法院，也没有多少公务员辞去工作，大多数学生也很快返回了学校，但是国大党首次把民族自由的事业带到了印度民众中间。甘地是排头兵：他跑遍全国——搭乘火车、马车甚至徒步——向人们传播他的观点。各处的人民，无论是否受过教育，也不分穷富、城乡，印度教徒也好穆斯林也罢，都响应召唤，或纠察出售外国布料的商人，或加入义工团体，或者以其它方法来支持这项事业。43

但是国大党领导人在证明他们能够发动群众抗议的同时，也发现自己很难驾驭它。茶叶种植园外来务工者的罢工让阿萨姆（Assam）的国大党领导人措手不及；孟加拉和安得拉三角洲（Andhra delta）的领导人未能阻止农民拒交租税和违反森林采伐规定。甘地明确表示，运动的目的是结束帝国统治而不是解决繁杂的地方不平等问题，因此，他把罢工和反对地主的行动排除在外。但这并不能阻止很多人乘便假公济私。44

在甘地看来最糟糕的是，有骚乱发生了。在联合省（United Provinces，简写为 U.P.，即后来的北方邦（Uttar Pradesh）），农民哄抢集市、查抄地主。在孟买，人们聚众攻击欧洲人、英裔印度人及拜火教徒。甘地这样回应："我承认除非完全的非暴力精神在人民中产生，否则我无力通过公民不服从运动成功解决任何问题。不过，我既然能摆脱与政府有组织的暴力的任何干系，那就更能与人民这种无组织的暴力一刀两断了。"1922 年 2 月，正当国大党准备新一轮的公民不服从时，甘地由于联合省的 22 名警察遭到残杀而取消了所有的不合作行动。45

发展到现在，在甘地领导才能的推动下，受国大党变革的促进，并经日渐成长的社会基础的强化，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呈现出一种新的成熟状态和活力。但是，甘地的盛名却是件好坏

参半之事。无论他到哪里，人们都成群结队地来听他演讲，或者只是为了一睹他们心目中的圣雄（mahatma）的真容。“这个人日益增加的影响力太惊人了，”马德拉斯的行政长官这样说，他的一位助手也“对到处人山人海，而人们秩序井然并对领袖表现出深切爱戴，印象极为深刻。”46

然而，他的声名并不能自动转化成人们对他的理念的接受。尽管忠实追随者的数量在增加，但和那些与甘地绝少共识，只是把他当作实现他们的目标或手段的伪装的人相比，还是很少。对联合省某处的农民来说，“甘地的自治”（Gandhi’s Swaraj）意味着一个没有地主和地租的世界这样的极端图景，他的名字甚至被用来为打劫开脱。47

此外，尽管甘地使印度人逐步对他们的力量有了新的认识，但他的运动还是没能实现自治（swaraj）。无论是传统政治家寻求的政治自治（political autonomy），还是甘地视为自治（self-rule）的脊柱的国家统一和纪律，都毫无踪影。不合作运动之后的年月里，甘地和国大党都放弃了大众非暴力行动，转而通过其他手段追求他们的目标。对许多国大党成员来说，1919 年英国主导的改革在省一级给了他们有限但切实的权力，为他们个人开启了新的契机。也许在体制内努力可以促使英国进行更多的改革——或许这不过是他们的一厢情愿罢了。

1922 年，不合作运动停止几周以后，甘地被捕，被监禁了差不多两年。这是他阅读和深入思考的时间。获释之后，他继续在国大党框架下活动。但现在他基本上把精力投到回国之初即主张的“建设性工作”，诸如促进纺纱、缓解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反对“贱民”制度之类上来了。他没有放弃政治领导权和“非暴力抵抗”（satyagraha）的打算，但至少在目前，他重返建设性工作。48

公民不服从

“全国性的呼声”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是民族主义运动的衰退和混乱期。甘地基本退出了，国大党的政治家们则在怎么对付英国统治（raj）的问题上争吵不休。那些赞成通过选举进入省级议会的成员，受到主张继续追求完全独立的激进派的非难，地方和省级委员会衰落了。同时，由于印度教党员热情高涨和穆斯林成员锐减，国大党也遇到了宗教关系紧张的难题。49

和以前一样，英国人的动作再次刺激了国大党。1927 年，他们成立了以约翰•西蒙爵士（Sir John Simon）为首的委员会来审查 1919 年改革的效果，这是进一步改革的前奏。但是这个委员会中连一个印度人都没有，这传递出的信息是，英国人在构造国家的宪政远景时，并不把印度人当作合作伙伴。用甘地的话说，这个委员会是“对一个民族有组织的侮辱”。印度领导人们抵制它的听证会，而当委员们在全国考察时，恭候他们的是罢市和示威。50

印度政治家们现在迫不及待地想成立一个反对英国统治（raj）的联合阵线。抵制委员会的团体派出代表组成了各方会议（All-Parties Conference）。会议受命为一个自由的印度起草宪法，产生了把印度拟想为不列颠王国自治领、由全部有选举权的成年人选举产生行政机关和全印立法机构的尼赫鲁报告（Nehru Report，以起草者之一莫提拉•尼赫鲁命名）。但大多数穆斯林领导人拒绝接受该报告，因为它忽略了他们提出的地方分权（decentralized states）和在省立法机构为穆斯林预留席位的要求。此外，尼赫鲁的儿子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和他的国大党激进派同伙对报告未要求完全独立便嘎然而止愤怒不已。

由于分歧威胁到刚刚复苏的运动，甘地被搬来救场。甘地回应说，只有"当这个民族主动要求我领导并有一个全国性的呼声时"，他才会重返领导工作。不过他同意出席 1928 年 12 月在加尔各答举行的一场国大党会议，并在那里提出了激进派和温和派都接受的解决方案。国大党会采纳尼赫鲁报告，而英国被限在 1929 年结束前决定是否接受它。如果拒绝，那么一场争取完全独立的非暴力抗争将会启动。同时，甘地坚决要求国大党重振组织并进行建设性工作——由于他以再次退出国大党政务相威胁，他们接受了他的提议。51

得益于 1928 年古吉拉特巴多利（Bardoli）地区的一场运动，此时他们对"非暴力抵抗"（satyagraha）的潜力也有了全新的信心。建设性工作已经在巴多利扎下深根，尤其在富足农民的种姓帕地达人（Patidars）中间。在甘地的鼓励下，帕地达人建立了推动纺纱、节欲和公共福利的修行所网络。当英国人决定将土地税征收额（land revenue assessment）提高 22%时，他们利用这个网络进行对抗。他们以和甘地有密切联系的帕地达律师瓦拉帕伊•帕特尔（Vallabhbhai Patel）为领袖，决定拒交所有租税，除非政府满足他们的要求。52

这场运动成功地获得了巴多利全体居民的支持。当政府拍卖因拒交租税而没收来的土地时，拍得它的人也受到抵制。帕特尔定期和甘地沟通，甘地则在他编辑的两份期刊上传播巴多利"非暴力抵抗"（satyagraha）的消息。省府原本打算出兵镇压，但英国统治当局（raj）担心运动扩散，施加压力让省府官员和帕特尔谈判，致使征收额度最终大幅削减。53

巴多利的行动不仅是帕地达人的胜利，它同时也是甘地的远见卓识的证明。它表明非暴力抵抗在由有组织、有纪律且团结的人民推行时，能够取得成功，而且英国人也能被迫让步。"确实是解铃还需系铃人，"甘地说。现在他再次准备好在广袤而多彩的印度尝试"非暴力抵抗"（satyagraha）了。54

"我知道……如何领导"

巴多利的成就应该更大规模地复制。而只有国大党能为此提供必要的全印范围的组织结构。但是它的许多省级委员会只是在名义上存在，没有正式的资金、成员登记，甚至连像样的办公室都没有。只有像古吉拉特这样的少数几个地区，才有结构健全的委员会。55

所以，甘地于 1929 年采取措施为国大党注入新的活力，一波波新成员和朝气蓬勃的迹象由此在某些省级组织中出现。比如在联合省，国大党旧班底半死不活，因此对省部进行了大变动，加快招募成员，还筹集资金来维持义工工作，这些消息也通过媒体和群众集会传播了出去。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和甘地各自的联合省之行更是激起了巨大的热情。但发生在那里的并非皆可放之它处。应该做的实在太多，国大党无望在区区一年之内返老还童。56

基层力量的复杂和不均衡情况，是国大党高层持久分歧的结果。老一辈一直不愿意卷进这种破坏性的群众抗争中来，他们希望和英国人达成某种程度的和解。斗志激昂的年轻成员们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妥协，对暴力策略跃跃欲试；孟加拉国大党委员会及其领导人苏哈斯•昌德拉•博斯（Subhas Chandra Bose）甚至和恐怖分子过从甚密。部分通过运作使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当选为国大党主席，由此保持激进成员们的忠诚，甘地成功地避免了国大党的分裂。57

甘地还面对着弥合族群不和（communal discord）的艰巨挑战。在之前所有的“非暴力抵抗”运动（satyagrahas）中，无论是在南非还是在印度，他都能和穆斯林领袖结盟并说服普通穆斯林参加。但是现在，甚至和国大党曾有过合作的穆斯林领袖，也对这场由印度教徒为主的政党领导的运动产生了疑虑。甘地努力让他们相信国大党不会以“印度教统治”（Hindu raj）来代替英国统治（British raj），但是他自己对印度教象征的倚重，可能削弱了他的可信度。谋求穆斯林政治精英支持的努力失败了：只有一小部分所谓的民族主义穆斯林愿意把国大党看作合作伙伴。58

种种迹象都显示新的非暴力运动不会一帆风顺：恐怖分子在 1929 年频频袭击英国官员，包括试图暗杀总督；受共产主义影响的激进工会在孟买、孟加拉及其它地方发动了大规模的罢工，这显示，阶级斗争对产业工人的吸引力不亚于国家团结。59

即使是在甘地政务繁忙的 1929 年，他的建设性工作也没有丝毫懈怠。他继续痛斥“贱民”制度和妇女所受的恶待，并为抵制外国布料而斗争，借此拓展政治行动的范围。任何人——甚至幽居家中的老人、病残者和妇女——都能通过他们生活中的简单改变，加入到这场争取自由印度的运动中来。在这场浩大运动发生时还是个小女孩的埃露•达斯图尔（Aloo Dastur）看到，人们在各处，甚至是在火车上，都在用小纺车纺纱。当她的学校采用白上衣和深蓝色裙子作校服时，母亲让她买来蓝色染料，给她缝了一套印度土布衣服取而代之。60

甘地再次开始在全国到处演讲和筹钱。没有其他政治家会以他这样的方式来认识印度，但他的所见所闻使他对这个国家是否为另一场非暴力运动做好了准备产生了疑问。他写道：“我知道如何领导公民不合作行动，但前提是存在准备好以我所要求的方式来实践它的人民。但我看不到一线这样的希望。”甘地在一个地方找到了一小群愿意接受他的方式的活跃分子：萨巴玛提修行所。因此，他开始把这个修行所看作发动一场有限规模的“非暴力抵抗”

（satyagraha）行动的替代基地。他依然在为全印范围的运动做准备，但他对能否进行心存疑虑。61

另一位颇具正直和智慧之名的人正在从统治（raj）的高处审视着这些进展。爱德华•弗里德里克•林德利•伍德，即欧文男爵（Edward Frederick Lindly Wood，Baron Irwin），自 1925 年起担任印度总督，他之前和此后都有着长期的卓越政绩：他将在安东尼•伊登（Anthony Eden）之后担任纳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内阁的外交大臣。正如后面这个职位所表明的，他是个可以和任何人坐下来谈的人，甚至是跟希特勒或者墨索里尼。他更喜欢谈判而不是战斗，即使他自己濒临险境时也是如此。

欧文出生在约克郡，父亲是第二代哈利法克斯子爵（Viscount Halifax），他一生都浸染着笃厚的宗教信仰和对同胞的深切情怀——有时候以出人意料的方式表达出来。1928 年他就写信给甘地，吊唁甘地侄子马甘拉尔（Maganlal）之死。欧文说："我能体会到失去他对您还有他的家人意味着什么，因为不幸和故亡对我们所有人都是一样的，人类在共同的经验上也是基本相通的。"62

1929 年对甘地来说是不完美的一年，对欧文来说也是。他提出了一个给印度自治领地位的新改革方案，具体细节则要待印英双方代表在伦敦召开圆桌会议来决定——尽管他所在的托利党强烈反对，但他的政策还是得到了新的工党内阁的支持。但是，政府的提议未能满足国大党去年 12 月开列的条件。不过，欧文还是希望国大党温和派能够在不失颜面的情况下，赞成这个方案。63

温和派确实催促给予表示和解意愿的回应，但国大党中的其他人依然反对妥协。对甘地来说，对欧文的动作的恰当回应并不是不言而喻的。最初他倾向于达成协议，但短短几周之内他就产生了疑窦。他怀疑把宪政改革寄托在与政治脆弱的工党内阁的会谈上的明智性，特别是在这项政策在伦敦遭遇麻烦之后。而且，他也知道他一旦同意欧文的提议，博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以及他们跃跃欲试的追随者就会脱离国大党。12 月底，甘地和其他印度领导人与欧文会面。欧文拒绝了他们提出的参加谈判的条件，于是双方都准备面对冲突了。64

几天以后，国大党年会在拉合尔开幕。甘地的方案——国大党的目标是以公民不合作争取完全独立——在绝大多数成员的支持下获得通过。但是，他在国大党中的权威更多来自他调解各派分歧的技巧，而不是成员们对他的计划的倾心。温和派抵制强迫国大党成员退出各省议会的做法，并阻止甘地把抵制法院、学校和市镇委员会采纳为正式方针。看来，统治当局抛出的诱惑——名望的诱饵和遥遥无期的渐进改革——对很多人来说还是赏心悦目的。

与此同时，国大党激进派则要求采取诸如总罢工等甘地不认可的策略。此外，一份谴责暗杀欧文的企图的决议仅以微弱多数通过，这揭示出为数不小的少数派在反对暴力上并不坚定。

甘地再次恳求他的政党中桀骜难驯的派系尽快归队，他告诉他们：“如果你们要我来指挥公民不服从，我会担起这个责任。但是你们也必须成为这场战役的士兵。”65

行动策略

甘地没有确切的运动计划就离开了拉合尔，在新的年份里他也不急于制定出一个来。相反，他把大多数时间花在了萨巴玛提修行所，他常常在他简陋家中的阳台上与人谈话，并独自思考，等待明智的策略浮出水面。与此同时，国大党也做了一些准备工作。

1 月 6 日，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走向前台并命令所有国大党成员退出各省议会；拒绝执行者将被从党内选举产生的机构（elective bodies）中除名。由此引起的反应强烈但不一致，许多人依然不愿意放弃合作可以得到的奖赏。最让甘地困惑的是，甚至是在前一两年的风暴之后继续和国大党合作的穆斯林，多数也拒绝遵从辞职的命令。66

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把 1 月 26 日命名为独立日，由甘地和尼赫鲁起草的宣言会在这一天四处宣读。整个次大陆的印度人都聚集在树下或公共广场上，聆听托马斯•杰弗逊在美国独立宣言中召唤自由的呼声的当代回声：“我们相信印度人民和其他任何民族一样，享有不可剥夺的追求自由的权利……我们也相信对任何一个压制他们的政府，人民都有改变或废弃它的更高权利……因此我们相信，印度必须切断它和英国的联系，获得高度自治（Purna Swaraj）或完全独立。”67

甘地和工作委员会在几周之内解决了一旦出现激进分子的暴力事件将如何应对的问题。1922 年时，作为对杀害警察事件的回应，甘地取消了当时的公民不服从行动。但尼赫鲁认为，如果甘地这次采用同样的处理，那英国人就可以通过引发暴力轻而易举地使新运动流产。甘地承认了这一点，决定不对那些弃绝他的策略者的事端负责。他不会让他们的暴力打断他的运动。68

现在到了关键时刻，因为如果甘地把他对暴力的深恶痛绝置于所有其它利益之上，那他无疑会授人以柄，让他的反对者破坏这场依然非暴力的更大运动。他认识到，非暴力抵抗的力量不是一个说开就开、说关就关的水龙头。即便是，他也不可能一直控制着它。工作委员会于 2 月中旬决定由甘地来督导公民不合作的第一阶段——但在甘地不出所料被捕以后，国大党自身特别是各省委员会将会承担起领导职责。逮捕的人越多，主动权也就越往下传递，也就越贴近人民。69

在修行所的这段时间里，甘地萌生了将一场以食盐税为对象的“非暴力抵抗”行动（satyagraha）作为公民不服从运动的开局的想法。政府自 19 世纪就垄断了食盐这一饮食必需品的制造并对其销售征税。现在甘地计划通过发动印度人自己制盐来破坏这项法律。对一些

印度领导人来说，在和英国的斗争中，食盐问题不过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对争取政治自由的崇高目标而言也无异于不务正业。但甘地有他的考虑。

首先，食盐税是完全不公正的，它对最贫穷的印度人的损害最甚，而英国官员也难以为它辩护。甘地主张说，事实上是政府从人民那里窃取了它，然后再让人民花费巨资把它赎回。他宣称："当人民意识到他们的权力时，他们完全有权利拿回本来属于他们的东西。"因为食盐税具体体现了殖民统治的不公，所以破坏食盐垄断能以对最底层的印度人有实质意义的方式促进自治（swaraj）。食盐运动中所展示的自治（swaraj），不只和光荣的政治目标相关，而且也关乎印度人对他们日常生活的控制。70

甘地希望制盐不仅可以吸引穷人们加入自治（self-rule）事业，而且也能使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团结起来。一道反对这项对他们有同样影响的错误制度，会加强他们的共同目标感。在所有对英斗争中，食盐运动还具有战略价值。由于它并不威胁英国统治当局（raj）的重要利益（食盐税在政府的全部收入中仅占一小部分），因此它不至于招致先发制人的阻挡或激烈的回应。相反，它会使运动从容发展，并吸引同情却不敢贸然犯险行动的人们加入。71

确定了这个目标以后，甘地主动提出如果欧文在废除食盐税之外，再满足包括变动汇率、降低土地税额度、削减军事开支以及对外国布料征税在内的 11 项要求，他们就取消运动。尽管欧文根本不理睬这些要求，但它们的影响超出了印度政治精英的头脑，赢得了更多的支持者，特别是商界和农民。甘地释放出的信息是，自治（swaraj）有实实在在的经济价值。72

3 月 2 日，还是在萨巴玛提，甘地给欧文写了一份公开信。他把这位总督称为"朋友"，说他对英国人民没有恶意，只是反对统治当局（raj）的制度。在强调了帝国统治带来的经济重负后，他要求欧文帮助避免迫在眉睫的冲突，并告诉他——如果他们无法达成协议——公民不服从将在 3 月 11 日从食盐"非暴力抵抗"开始。他得到的全部答复，是来自欧文秘书的一份承认信已收到的函件和一个对甘地的意图表示遗憾的声明。甘地公开了他的信和收到的回复：他已向对手伸出了修好之手，但他的好意被拒绝了。73

欧文无意妥协。"目前，食盐运动的前景还不能使我彻夜难眠，"3 月 20 日他在给伦敦的信中这样写道。他的官员们相信，就像他们抵挡住了不合作运动一样，他们承受得了公民不服从。利害所在再清楚不过了：甘地和其他印度领导人相信他们能"通过造成政府失灵迫使我们屈服，"国务大臣皮尔爵士（Lord Peel）在 1929 年 1 月给欧文的信中说。"我们当然会果断地让他们知道那不可能。"74

虽然国大党不会合作，但欧文依然想举办圆桌会议来讨论宪政改革，同时他也认识到，如果国大党之外的印度政治团体也不参与的话，圆桌会议会成为一个笑话。尤为重要的是穆斯林领袖和更温和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参与。为了得到他们的支持，政府在应对公民不服从时将

不得不避免过火行动，并要保证最低限度的合法性。此外，印度事务大臣威廉•威基伍德•贝恩（William Wedgwood Benn）警告说，中断普通文官统治会破坏印度在国际市场中的信誉。

与此同时，政权也离不开在军队、政府和警察岗位上服务的印度人的忠诚，这就意味着无论遭遇如何强烈的反对，当局都得以一切都牢牢在握的形象示人。"必须记住，如果我们使警察都觉得政府无力维持它的地位和权威，那必将导致灾难，"情报局主管写道。政府政策必须足够强硬，以使服务于它的人相信他们正在为一个会在印度继续掌权的政权工作，但也不能太严厉，以免吓跑国大党外仍然愿意接受英国统治（raj）的温和派。75

给地方政府的指示是："政府的控制行动必须有效，但不得超过情势的实际需要。"同样至关重要的是，甘地一旦违法就要逮捕他；超过情势需要而任其逍遥法外，只会鼓励他的支持者，并削弱政府的力量。76

"绝不退缩"

在 3 月 5 日的祈祷中，甘地号召修行所的同仁 7 天后和他一道参加前往海边的游行，他们会在那里制盐。游行是甘地轻车熟路的战术。在南非时他曾领导一大帮底层群众，不顾当局的持续骚扰，穿越不友好地区，进行了 5 天的游行。这次，行进者人数虽然较少，但彼此关系紧密，他们的行程也会更远，并将经过极端崇拜甘地的古吉拉特农村。甘地把游行看作向亲眼目击者和通过媒体向全国进行形象表演的政治舞台。77

甘地知道这 70 人左右的游行者都致力于实践他提出的原则，而不像国大党中的很多人那样。他们忍受体力劳动和修行所的克制生活，他相信他们的行为准则足为其他印度人效法。他们来自不同地区、宗教团体和种姓，暗喻国家在一项正义的事业下结合。然而，甘地指示游行不接纳妇女参与。当一些妇女积极分子被拒绝时，他解释说如果妇女参加，英国人会指责说印度男人把她们当作避免警察袭击的挡箭牌。他希望妇女为自治（swaraj）做出贡献，但是在这件事上，如何应付英国人的现实考虑更为重要。78

开始前的一周是紧锣密鼓准备的时间。甘地在他在古吉拉特的主要盟友帕特尔的帮助下，设计了一条从阿姆达巴德向南到海边村庄丹迪（Dandi）的 240 英里长的路线。游行者途中会在近年来建设性工作和"非暴力抵抗"运动（satyagrahas）产生了回响的村庄停留。学生勘察路线，搜集这些村庄的信息，在各地停留的时间表发表在甘地主持的古拉吉特语周刊《Navajivan》上。为在印度乃至外国媒体上宣传行进，已经做了一切努力。79

随着 3 月 12 日的临近，修行所和阿姆达巴德的氛围变得一触即发。甘地抑扬顿挫地说道："这是终结之战。面对子弹的威胁我们当面无惧色……无论代价如何我们都决不退缩。"当局加剧了本已紧张的局势：一位地方官员 3 月 7 日逮捕了帕特尔，由此引发了一场罢市，导致

纺织厂、学校、商铺和市政办公室都关门停业。12 日晚，人们彻夜不眠地守候，并在拂晓时祷告和吟唱灵歌。然后是甘地发言："这场斗争不是一次公开表演；它是最后的抗争……我要求你们返回到这里时，要么已为自治献身，要么是它的赢家。"甘地的妻子卡斯图巴（Kasturbhai）为他戴上印度土布制成的花环，又给他一支手杖。在大步走出修行所时，这位印度领袖在围观者中引起了激动并多少有些矛盾的情绪反应。对他的秘书马哈德夫•戴赛（Mahadev Desai）来说，甘地使他想起两位伟公民不服从以集体行动为形式，但参加这些抗争的个体面临的是强烈的个人抉择。拉合尔的大学生以挨家挨户地搜集外国布料，把它们堆积起来付之一炬的方式来参与。希瓦•杜阿的家人已经改用土布，丢弃了大部分外国布料的衣服。仅剩的一样是杜阿从她已逝的母亲那里继承下来的一匹莎莉（sari）。她怎么可能把这东西弃之火海呢？但当她看到邻里们朝下面街道上的学生们扔东西时，她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她下定决心："母亲归母亲，但祖国高于母亲，必须放弃莎莉，所以我交出了它……"111

英国人也好，国大党领导人们也罢，他们都没有想到妇女们会如此热烈地参与到运动中来。妇女们把大水罐搬到海边，烧水制盐。在村庄里她们抵制拍卖被没收的物品，还骚扰和羞辱购买者。她们被警察抽打，可能有 2 万人在 1930 年入狱。妇女也成了省区和全印公民不服从的"发令人"（dictator）。拉合尔的一位学生抗议组织者说："印度妇女给了英国政府沉重一击。我们再也不是……甘于待在四壁之内，胆怯、温和、目不识丁的那种印度妇女了……"112

就多方面而言，甘地在妇女问题上还是个传统主义者，尽管他认为妇女拥有更强的道德纯洁性和忍耐苦难的能力，这使得她们成了"非暴力抵抗"（satyagraha）的理想人选。最初他想把她们限定在纺纱和为家人们制备土布衣服的范围内，后来才允许她们执行纠察布料和酒品商店的任务，但表示违反法律的行动应该留给男人们。当妇女们对这种排除抱怨连天时，甘地让步了。甘地无疑激发了许多妇女参与公民不服从，但大多数妇女是自发参加而非受他鼓舞。113

尽力维持，遭遇挫折

1930 年，公民不服从几乎涌现在印度的每个省份，尽管英国为扑灭它不惜使用严酷手段。一次又一次，统治当局不得不依靠警察来重获控制。有时——在白沙瓦是暂时的，在古吉拉特持续数月——甚至连棍棒和监禁都难以奏效，官员们只得承认他们在一些地方的统治去日无多。在许多地方进行的镇压措施，动摇了英国统治（raj）的财政和心理基础。

抵制酒品、拒交土地税和联防员税款以及劫掠森林，在一些省份造成了财政收入减少。比如，比哈尔和中央省都倚重酒品消费税（excise taxes），因此在那里酒品抵制的效果立竿见影。布料抵制减少了中央政府课征的关税（并导致英国工业收益下降）；布料进口额一年内下跌了一半。这部分是由于经济萧条，因为它削弱了印度消费者的购买力；但布料进口的降幅要比其它商品为大，这可就是抵制造成的差异了。114

由于警务工作花费颇高，新增的直接开销使非暴力制裁引起的预算紧张更加严重。从食盐游行到与帕地达人的斗争（1931 年年初时还在进行），一度有 6 万人因公民不服从而被关押。孟买、孟加拉和中央省不得不增加监狱投入，寻找安置囚犯的临时办法（如临时营房），并往动乱地区配送额外的警力。地方官员蜂拥辞职更使恢复秩序的活动雪上加霜。115

但相比之下，统治当局的大老爷们更担心的是运动对他们的印度雇员们、特别是省警察部队的斗志的影响，而不是打击公民不服从的财政耗费。阿姆利则惨案以后，英国宁可依赖警察，而不愿再动用士兵去驱散或制止印度抗议者们了。他们敏锐地意识到，如果民族主义者们能够削弱警察部队中印度人的忠诚和纪律，那他们就动摇了英国在印度继续统治的根基。116

公民不服从给警察带来了可怕的负担。正如一份关于联合省情况的报告所承认的：“他们遭到公开辱骂和贬低，而且频频遭受攻击；店主们有时候拒绝为他们服务，他们不体面的工作使他们不被接受；甚至连他们的妻子和家人也经常遭遇社会抵制。”孟买的总警督报告说，他都不确定是否可以依靠他的警官们去执行政府的镇压。117

曾在孟买市服务的英国警官约翰•考特•克里（John Court Curry）在他的自传中坦承说，他“对必须驱散这些非暴力的民众感到非常不满，尽管违法者受到的伤害几乎总是非常轻微，但对这些人使用暴力还是和使用暴力来对付危及他人生命的暴徒的迫切需要相当不同……我对这种做法的反感逐渐增加，以至于每有国大党举行大规模游行，我就感到身体严重不适……”118

英国官员给那些承受运动主要压力的人们提供慷慨支持。比如，马德拉斯政府使警察免于其他公务员都承受的减薪，并给和抗议者打斗的警官优厚的奖金。警察们也得到保证说，高层会使他们免于因暴行而受指控。相比之下，国大党破坏警察忠诚的努力就从来没有连贯性。最初，国大党诉诸他们的爱国情操；在马德拉斯，积极分子给警官邮寄明信片，恳求他们克制针对“同胞”的暴力。但是警察的越轨行为使国大党转而反对他们，而指责警察又有助于凝聚民众的支持。国大党消减英国统治（raj）合法性的目的和赢得它的保卫者的支持的目标相抵触。119

1930 年 9 月，总督终于可以向伦敦报告说国大党在动摇警察的士气上已然“确定失败”，新警员也很容易招收到。结果是，印度作为一个整体没有被公民不服从搞得难以统治。随着时间一月月过去，欧文和他的同事对他们抵挡住国大党攻势并把运动分割成一系列地方问题的信心与日俱增。在 1930 年的最后几个月里，运动的浪潮好像到了顶峰并开始衰退。虽然抗税（anti-tax）行动在少数地区依然顺利进行，但当局觉得已经安全到没有必要颁布仲夏时起草的《紧急状态权力法令》了。120

尽管国大党发动了一场反对英国统治（raj）的全国运动，但它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均衡地进行，而且还被甘地早就预料到的社群分裂所削弱。1929 年年底时，他已经明白穆斯林领袖们不会和国大党正式合作。但他希望通过把民族主义者的要求和对经济不平的非暴力制裁紧密结合起来，国大党可以克服普通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不信任，并且在激烈的战斗中锻造平时难以实现的情谊。国大党也通过重申没有他们同意不会接受任何宪政协议的承诺，努力消除穆斯林政治家们的疑虑。

但良好的初衷和政治姿态没能唤起多少穆斯林对公民不服从的热情。大多数穆斯林领袖坚持公开指责国大党的立场，而普通穆斯林不愿参与国大党地方组织者策划的抗议。1930 年 11 月，在因为公民不服从违法行为还在狱中的超过 2 万 9 千名囚犯中，只有 1152 名是穆斯林，这可作为全国参与程度的一个衡量标准。没有穆斯林的有力参与，运动在地理布局上就只能不完整了：以穆斯林为主的旁遮普和信德（Sind），1930 年没给英国造成多少麻烦，而穆斯林的冷淡也削弱了其它地区的运动。唯一的例外出现在偏远的西北边境，贾法尔汗在那里用甘地的原则来鼓舞他的义工们。121

阶级分化削弱了运动的力量。国大党和特权团体——比如资助国大党并支持布料抵制的商人、作为乡村地区中坚的地主——有着财务和组织上的联系。尽管甘地向包括最贫穷的人在内的社会所有阶层都伸出了手，但国大党和富裕、有权势的印度人的关系还是抑制了它对下层社会的感染力。甘地甚至避免策划一场总罢工——这在损害英国统治（raj）的同时，也会伤及印度商业——而工业区富有战斗力的工人阶级 1930 年自始至终都是一块未开发的资源。122

对运动的限制不都来自内部；政权所采取的措施同样妨碍了它。虽然早期的下放控制权和分散行动的策略帮助运动从高压攻势下存活了下来，但警棍抽打、大规模逮捕、惩罚性的警察袭击、宵禁以及其它形式的迫害所造成的人身伤害，限制了公民不服从在全国部分地区的扩散，并消解了其它地区的运动。

在政权的暴力没能吓退运动参加者的地方，统治当局找到了惩罚不服从的印度人的其它办法。扣押抗税者的土地是一个毁灭性的策略。准备好入狱甚至经得住人身伤害的人，发现难以承受丧失他们的土地、从而使家人陷入穷困这样的事实。比如，比哈尔的土地扣押迫使农民们 1930 年年底重新开始缴纳联防员税费。123

经济疲软也制约了运动。最初配合抵制的布商随着损失的增加，开始失去信心。刚到 7 月，孟买的商人和温和派政治家们联合起来，试图说服甘地和尼赫鲁父子与统治当局达成妥协。同年晚些时候，由于商人们暗地里出售外国布料，集体纪律几乎在孟买之外的所有地方开始涣散。124

1930 年下半年时，国大党自己就疲惫不堪了。逮捕迫使领导层把主动权交给了在镇压下陷入混乱的省级委员会，而双双不支的中央和省级控制则削弱了非暴力原则。印度很少有地方像古吉拉特一样，那里的帕地达人有“非暴力抵抗”（satyagraha）的经年经验，并承诺恪守非暴力。米德纳普的抗税者、中央省的森林劫掠者以及孟买市和加尔各答的民众都对暴力的风险缺乏判断，针对警察、护林员和英国统治当局（raj）中其他人员的攻击开始增加。甚至古吉拉特也有一位拒绝辞职的地方官员被谋杀。公民不服从越是肇始于地方性的不满而非战略意图，就越有可能偏离非暴力的标准。125

休战

当国大党还全神贯注于一场在许多地方逐渐衰落的运动以及一个支离破碎的组织时，英国人正注视着伦敦圆桌会议桌子另一边的其他印度代表。圆桌会议从 10 月底开到次年 1 月中旬，参与者包括英国官员、土邦代表以及穆斯林、印度教徒和自由主义的领导人——但没有一个人来自最有资格代表印度的组织：国大党。

会谈产生了一个非国大党的印度与会者和英国都能接受的宪政改革方案：土邦和英国治下的印度组成一个行政权向立法机构负责的联邦。总督在转型期间将享有某些“保留”权力，比如防务和财政。在印度自由派看来，这个协议是朝向自治的进步。穆斯林也对保护他们免于印度教支配的联邦结构感到放心。甚至强烈反对欧文 1929 年改革努力的英国自由派和托利党人，也支持这种安排下的自治领地位。但非民主的土邦在立法机构中的影响力，以及为行政控制之便保留的权力，怎么看都是为了捍卫英国统治（raj）。126

但是，由这群没有代表性的印度代表在伦敦开始的进程，如果排除国大党的话，将不会有多少发展潜力。虽然欧文对说服国大党参与下阶段的会谈还没有把握，但他觉得使印度人同意一个相当有利于英国统治（raj）的协议的机会失不再来。他也希望缓解公民不服从对他的统治及国库造成的重负和消耗。这样，表态愿和国大党和睦相处的时机就成熟了，而他也于 1 月 24 日宣布，将无条件释放所有工作委员会成员。127

甘地一获得自由就坚持国大党不会停止公民不服从和参加会谈，除非政府先满足某些要求——诸如允许进行纠察和制造食盐、返还没收的抗税者的财产及废除镇压法令。然而在幕后，他听到国大党内外都认为该是和政府达成协议的时候了。一直对公民不服从颇为犹豫的国大党温和派现在想放弃它了。而抵制温和路线的激进派在莫提拉•尼赫鲁于 2 月 6 日去世以后，也失去了领头人。

甘地也仔细调查了商界的意见，他发现他们渴望妥协。加尔各答印度商会主席凯坦（D.P. Khaitan）2 月 11 日宣称：“我们提醒甘地和国大党，现在是他们考虑达成一个体面协议的可能性的时候了，这大概不会有错。我们都想往安宁。”最终，甘地自己抱有的“非暴力抵抗”

（satyagraha）的实践者所承受的苦难能改变他们的反对者的坚定信念，让他相信这种改变可能会在和政府的当面会谈中显露出来。于是，2 月 14 日他写信给欧文要求会面。总督毫不犹豫地答应了。128

被认为正派、虔诚的欧文，给甘地的印象是解决冲突的理想合作者。而欧文，作为对甘地的尊重的回应，也有意加强这种印象。他写信给威基伍德•贝恩说，他努力让甘地相信他的诚心、“同情”和“对他的期望、犹疑和失望的理解”。他采纳了一位印度自由派人士的建议，带着他“最深沉的精神面貌”出席会谈。129

2 月 17 日下午，甘地围着毛织披肩，像几年前一样，阔步踏上了新德里总督府的台阶。娱乐喷泉和大象雕塑，笼罩在高拱的圆屋顶下，恰当地表露出了帝国精神。他爬上宽阔的阶梯，被带往欧文的书房，欧文正坐在那里的壁炉前烤火。甘地每天和欧文谈完后，就回到一位朋友的家里，在那里和工作委员会成员们一连几个小时推敲事情。

这是初步的、没有约束力的商讨——澄清作为第二轮会谈基础的议题和立场。首先是来自最近的圆桌会议的宪政问题：国大党是否应该在联邦制、负责任的中央政府以及行政部门暂时保留各项权力的框架内谈判？其次是如何对待公民不服从的问题。欧文清楚表示，如果国大党停止运动，他会释放所有公民不服从囚犯、废除相关法令并召回惩罚性的警察部署。但是甘地要求的更多：恢复辞职的地方官员的工作、归还抗税者被没收的土地、允许制盐和执行纠察酒品、布料商铺的任务以及调查警察滥用权力。

不过最棘手的问题并不是宪政方面的。尽管政府的改革方案远远没有达到独立的目标，但甘地得到欧文的保证，他说国大党在下一轮会谈中可以提出印度脱离帝国的权利的问题。此外，从甘地个人的观点来看，宪政问题——印度是得到自治领地位还是完全独立，以及转型如何进行——并非他心目中所想的印度自治（swaraj）的关键。

但是让甘地在其它问题上放弃原来的主张没那么容易。毕竟，他的运动战略以抵制诸如食盐垄断和布料进口之类英国统治最切实的表现为基础。如果他在这些问题上让步，公民不服从就会被前线的许多印度人认为是一场失败。对帕地达农民而言，宪政改革和他们失去土地的沉重打击相比，微不足道。同样，在达拉萨那流过血的儿女们几乎不会接受一个保留他们的抗议对象、并豁免警察对暴力的任何责任的协议。在这些问题上妥协，对欧文来说困难一点儿也不少。他的省级官员们明确说，任何惩罚警察或者让运动在日常问题上得胜的协议，都会使每个英国统治（raj）依赖其力量才得以维持的人失去信心。“我们不得不主要用来判断任何拟议中的行动路线的，并不是它对国大党的可能影响，而是它对我们的支持者、我们的警官以及其他人的可能影响，”欧文的一位部长在德里会谈前几天提醒说。130

2 月 27 日，甘地和欧文开始再次商谈。在联邦制、责任政府和保留权力这三点的基础上，他们很快就宪政谈判的原则达成了共识。但是在运动如何终止的问题上，会谈几乎破裂。最终，欧文只让步了一点，而甘地则作了大量妥协，他们这才达成协议：公民不服从将终止；政府会废除镇压法令、撤走惩罚性的警力、释放囚犯并允许被取缔组织恢复运行。原来辞职的印度官员，只要他们的空缺没有被正式填补，也能重返岗位。

另一方面，不会对警察滥用权力进行调查。农民也不能重获已出售的被占土地。对布料和酒品商铺的和平纠察可以继续，但不再作为一种政治制裁。并且，尽管食盐法依旧存在，但政府不会干涉家用的小规模制作。贾瓦哈拉尔•尼赫鲁非常失望，但甘地设法获得了工作委员会的同意。休战条款于 3 月 5 日公之于众。131

甘地的赌注是，和坚持下去相比，通过取消公民不服从和参加圆桌会议进程，国大党会收获更多——或者损失较少。尽管在几个方面保住了面子，但他难以声称在任何基本问题上获得了明确的胜利。然而，他似乎赢得了重建国大党被破坏的组织的时间，而领导层也保持了完整，尽管激进派不满甘地的和解路线。他们之所以能保持一致，是因为相信一旦 8 月召开的新圆桌会议无法达成协议，他们就能重捡法宝、继续运动。

《德里协议》（Delhi Pact）签署四天之后，欧文写信给在伦敦的威基伍德•贝恩，如释重负地说他终于不用在“诸如警察行为、镇压手段之类……困扰双方的诸多问题……”上让步了。总督关注的依然是他的控制手段，而协议对此并无妨碍。虽然协议没有阻止国大党重新组织起来，但它同样没有对英国统治（raj）拥有的充分强权构成约束。欧文强调说：“纵观整个事情，我确实认为甘地能被说服达成一致是非常让人惊讶的。”132

警察和公务员队伍中的许多印度人对协议就没有欧文那么热情，而英国官员们则决定必须使警察明白，重新发生冲突时他们不会束手束脚。孟加拉的省政府告诫说，“在无异于宣布政府决意维护自己并镇压颠覆性运动的毫不含糊的条款之后，紧随同样毫不含糊的切实证据”会保证警察的忠诚。于是休战协议墨迹才干，官员们就迫不及待地起草了新的《紧急状态权力法令》。133

由于双方的强硬派都坐待休战破产，事情似乎正在走向失败。方案的设计师欧文勋爵 4 月回到英国，一去不复返，而接任他总督职位的威灵顿勋爵（Lord Willington），却是另一番秉性。对于现在负有保持和平义务的国大党来说，民众针对地方问题的抗争也成了问题。在古吉拉特和联合省局部地区，部分是由于经济上的困窘，部分是为了抗议，农民们继续拒交土地税款。在西北边境，贾法尔汗的力量再次活跃起来，他们监督布料商店并呼吁抵制土地税。甘地自己一边劝告地方活跃分子们保持克制，一边敦促官员们进行妥协。帕特尔和尼赫鲁等其他国大党领导人开始怀疑，为了遵守休战规定，失去地方的支持是否值当。134

甘地 8 月启程前往英国，作为第二次圆桌会议的唯一国大党代表，他在会议上面对的是英国以及印度其它党派和土邦的代表。英国人坚持认为关于印度最终地位的任何进展，都得取决于在不同社群如何被代表以及国家的联邦结构如何精确布局问题上的协议。正如他们所预料到的，印度代表们在这些问题上陷入了不可收拾的僵局，而甘地化解分歧的努力也无济于事。当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12 月 1 日结束会议时，印度没有比会议开始时多靠近自治领地位一步。135

随着圆桌会议无果而终，重新进行公民不服从成了承认失败之外的仅有选择。甘地返回印度时，政府已经发出了严重的挑衅。孟加拉、联合省及西北边境的省级官员重新制订了镇压性的法令，同时还关押了包括尼赫鲁在内的一些国大党活跃分子。甘地要求和新总督威灵顿勋爵亲自商讨所有这些事情，但被断然拒绝了，于是国大党在 1932 年的第一天宣布重启公民不服从。

然而，这次政府已经知道了即将发生的事情，在挫败非暴力行动上也显示了更多的信心。数月前就计划好的一场先发制人的镇压，通过一股汹涌而来的逮捕和新法令实现了。甘地自己也在 1 月 4 日被关押。事实上，英国的新政策无非是戒严法。与此同时，由于运动先前的中止和对地方行动的限制，国大党的许多关键支持者都已脱离运动。现在他们不愿再次加入，把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奉献给另一场运动。新一轮公民不服从虽然在两年内从未正式宣布结束，但最初的 6 个月之后，它就完全不对英国统治（raj）构成严重挑战了。

印度 1930 年至 1931 年反英公民不服从运动的结果显然喜忧参半。就国大党的既定目标，以及像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这样坚决的民族主义者的希望而言，运动失败了。当第二阶段的运动最终在 1934 年偃旗息鼓时，无论是在帝国内取得自治领地位还是完全独立方面，印度人都进展甚微。在甘地认为至关重要的经济及日常问题上，他们也都没有得到任何较大的让步。

但是，纵使运动没能产生宪政改革或者物质利益，它还是表明普通印度人拥有推动事件的力量。在印度一些地区，民族主义者成功削弱了支撑统治的基本结构。抗税、产品抵制以及辞职，耗竭了政府两股紧密相连的力量——收入和人事。少数几次——4 月底的白沙瓦，1930 年大部分时间的古吉拉特局部地区——公民不服从向英国人展示，如果他们再也不能把担任殖民政府和执法职务的印度人的可靠性看作理所当然，那会是一副什么光景。而且，英国人也不能确定始于这些地区的小规模运动不会传递到次大陆的其它地区。遏制运动的代价大到足以促使欧文以他的同事们并非全都乐意的条件来谈判，以结束冲突。

然而在表象之下，英国统治从未面临过一场整体性的统治危机。民族主义者根本没能削弱警察部队的忠诚，而镇压尽管经常不便使用且总是代价高昂，但也从来没有被有效制止住。运动在设计时即倾向于进行分散性的打击——当全印领导人们被捕的时候，地方积极分子们没有

错过一次打击的机会，并且有太多人参与其中，又散布在太广阔的范围，这让当局难以扑灭所有的反抗。但是，殴打、监禁、土地扣押及其它手段，在许多地方使抵抗陷入疲软。而不论国大党为抵消镇压做出什么样的战略调整，都不会改变有大量印度社群不参加运动的事实。没有穆斯林及产业工人的齐心协力，甘地的追随者所进行的公民不服从也就只能做这么多了。

国大党虽然没能摧毁英国统治（raj），但它确实成功地撕碎了英国统治的合法性。在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政权向以和善自居，支持健全的经济和渐进式改革——而且从长远来看，好像有意朝自治方向发展。只要印度人尽他们的本分，并与它的法律和制度合作，英国人就能维持这种假象。但公民不服从摧毁了它。

印度人一次又一次并且此起彼伏地违抗他们认为不公的法律，而他们的统治者则殴打他们、监禁他们、夺走他们的财产、禁止他们的出版物并取缔他们的组织。在勒克瑙的街道上、达拉萨那的食盐厂里、古吉拉特的村庄中，政权在光天化日之下显示出殖民统治只不过是一种控制形式的本质。在可能的任何地方，英国人都乐于看到印度人的顺从，不过，一旦顺从缺位，他们就会用棍棒和枪炮来统治。公民不服从揭示了这个真相，而这一真相对未来的英印关系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没有什么能比入狱对印度人的意味的变化，更能揭示英国统治（raj）所遭受的权威流失。入狱曾经是耻辱的标志，而现在则成了荣耀的象征。纳拉扬•戴赛（Narayan Desai）记得自己还是孩子的时候，他父亲（甘地的秘书）被抓往监狱时在警车后座里充满欣喜的叫喊：“这次不会少于两年！”监禁依然是一种人身强制手段，但在大多数印度人眼里它已不再可能带来耻辱了。136

国大党领袖们所做的可不止是摧毁英国统治（raj）的权威；他们还努力成为代言人民的唯一力量。在这个意义上，非暴力大众行动是这样的一种努力：国大党为从英国人那里夺取政治上的主导地位而试图以压倒性证据证明，尽管是英国人在统治印度人，但“领导”他们的却是国大党。国大党宣布进行和暂停运动，国大党领袖和义工们进行最广为人知的公民不服从行为，并承受赤裸裸的暴行。而且在大多数冲突中，甘地和他的同仁们都设法保住了主动权。

但是他们的地位从来都不是不受挑战的，至于原因，则更多与印度人而非英国人有关。国大党对自己的定位是引导民众进行有纪律的非暴力行动，但是它的全国和省级领袖们经常批准他们没有发起也不可能控制的行动。国大党经常发现自己是在追随而不是在领导，是在约束而不是在动员。此外，没能使大多数穆斯林和锡克教徒加入抗争，意味着国大党不能代言全印，也为以后印度的分裂及延续到英国统治之后的激烈社群冲突埋下了隐患。

然而，公民不服从的实践改变了经历过它的人民。就在上一代，印度是一个独立国家的热切意识还局限于主要由受过教育的城里人组成的少数人，对宗教团体、种姓制度以及语族的忠

诚也遮蔽了公民身份。但遍及各个社会阶层的印度人在反对触及他们所有人的不公体制的集体非暴力行动中联合之后，一种新的公民精神在印度诞生了。

食盐游行使印度人产生了一种共同的冲动，并在来自不同阶层和地区的印度人之间铸就了持久的纽带。为坚持布料抵制而放弃衬衫生意的孟买商人，由于纠察而被投入监狱的拉合尔大学生，以及在达拉萨那遭受痛打的国大党义工——所有这些印度人现在彼此、同时也与像甘地和尼赫鲁父子这样受人尊敬的领袖一道，分享着一段共同的历史：他们为了促进将英国赶出去这一国家利益而不顾个人得失。印度不再仅仅是地图上的一块拼图——它也是公众心目中的一个成熟理念。

对抗当局的简单行为驱除了殖民统治所助长和需要的自卑感。乌莎•梅塔（Usha Mehta）回想起家里上了年纪的妇女们参与食盐“非暴力抵抗”（salt satyagraha）时的那种自豪来。她大婶和祖母把盐水带回家，熬出盐来，“然后她们扯开嗓子喊：‘我们违反食盐法了。’”运动还改变了人们看待英国领主们的方式：英国人不再不可战胜。他们的总督和莫汉达斯•甘地谈判，虽然短暂，但承认了这位因明确表达他的人民的憧憬而获得权威的人。纳拉扬•戴赛说，在他们和甘地坐到一起之前，英国人“都是老爷（sahibs），而我们顺从他们。但自那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137

甘地在公民不服从运动中有着突出的个人作用。对数百万印度人而言，他是国家目标的化身。他的才干使他在国大党内部有着极大的影响力，他借此把不同派系团结在一起，并推动国大党向大众政治组织转变。此外，甘地的“非暴力抵抗”（satyagraha）和自治（swaraj）的理念，激发了国大党骨干们的思考，1930 年他们中的多数人致力于以非暴力行动来追求独立。

然而，公民不服从运动源于甘地的领导，并不意味着那就是他的理念的纯粹体现。甘地最初构想的“非暴力抵抗”的进程是，以违抗英国统治当局（raj）的法律开始，然后迫使英国惩罚抗议者。他们的苦难将打动压迫者，暴露出其统治的不公并创造条件让英国选择离开。甘地甚至天真地相信，欧文愿意谈判象征着他本心的改变。但是甘地和欧文不等同于印度和英国：欧文钦佩甘地，不过他的政府可没打算承认印度人民的主权。

除了欧文以外，英国人单纯地把甘地看作一个鼓动无知民众的部落巫医；丘吉尔说他是一个“骗子”。尽管从外表来看，他是一个圣徒般的不谙世事的人物，但甘地其实非常明白印度解放的现实政治。他知道公民不服从必须重创帝国控制，让英国得不偿失。而他的“真理力量”（truth force）适于这个世俗目标：他的大多数追随者加入非暴力行动不是为了寻求某种道德理想，而是为了战胜他们的对手——通过拒绝给予使其控制印度成为可能的合作和税收来进行。让英国人知道他们错了根本不是重点所在；目标是赶走英国人。138

非暴力行动在 1930 至 1931 年间没能赶走英国人，也没有产生甘地所期望的效果——但它产生了效果。抗议者所受的苦难没有改变英国人的看法，但它改变了印度人对英国人的看法。对数千万印度人而言，“非暴力抵抗”（satyagraha）及其结果使与统治的合作从幸事变成了下作。英国心安理得地依靠印度人的默从来控制的旧秩序被打破了。查尔斯•英尼斯爵士（Sir Charles Innes），一位省行政长官，在公民不服从期间向他的同事表达了他对事件的分析。他承认：“英国只有在得到同意的基础上才能保有印度。我们不可能依仗刀剑来统治它。”139

英国人失去了那种同意，而如果公民不服从更有纪律，如果国大党成功剥离了英国统治的压迫手段，以及最重要的，如果印度团结一致，那么，英国人可能会远在失去帝国这颗最耀眼的宝石之前很早就丢掉了它。

余波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由于公民不服从暂时停止而英国统治依旧，印度民族主义者制订了新的方针。甘地仍然是他们事业的统一象征，在情势需要时他会短暂地走上政治舞台。但他所致力的首先是建设性工作：解放“贱民”和妇女，推动村庄实业，改革教育和公共卫生。好像是为了象征这些，他把家搬到了位于印度中部村庄赛瓦格拉姆（Sevagram）的新修行所。

国大党继续关注印度独立，但在 1935 年的改革放宽选民资格、提高选举出的省立法机关的地位以后，它的领导人们转而在体制内努力。它把自己的公众影响力变为选票，在 1937 年选举中赢得了一些省的多数席位并组成了省级政府。

第二次世界大战见证了这种参与的终结。殖民政府跟从英国议会，在没有向任何印度代表征求意见的情况下对德宣战，并拒绝用满足民族主义者的要求作为对忠诚的回报。1939 年 10 月，国大党命令它的各省部长们辞职，再次进行全面反抗。1942 年，一项“滚出印度”（Quit India）的决议引发了一场主要是自发进行，而且十分暴力的人民起义，差不多 10 万人被捕，超过 1 千人遇难。同时，苏哈斯•昌德拉•博斯（Subhas Chandra Bose）在国外组建了一支“印度国民军”，同日本人一道对英作战。

统治当局克服了这两个问题，但英国刚走出战争就面临着国大党的新一轮反抗，并且不得不在镇压运动或接受民族主义者的要求这两者之间选择。他们以前多次对付过激烈的抵抗——暴力的和非暴力的都有，但警察的纪律和忠诚在战争期间严重下滑，而印度战士的可靠性也存在疑问。在印度国民军中和英国作战的那些人被当作英雄称颂；他们的例子也许会使政府士兵对他们是该向英国统治者（raj）效忠还是向印度效忠提出疑问。

而且，在印度进行任何新的镇压都会成为英国空虚的战后经济的沉重负担。尽管丘吉尔依然把印度视为帝国的宝石，但他的怀旧并不被英国公众广泛认同，并且它显然不是英国的强大

盟友美国的兴趣所在。在工党于 1945 年 7 月大获全胜并承诺优先重建英国自身以后，变革的时机成熟了。

到那时候，任何政治协议不仅要赢得国大党的同意，而且也要赢得作为穆斯林抱负的主要载体的穆斯林联盟的同意。现在，问题的性质已经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印度内部的社群关系了，而是可能另外创建一个把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合并而成的独立国家巴基斯坦。没有任何族群由此受到的威胁比锡克人更大，他们在旁遮普的家乡眼看着就要被分割给两个国家了。由于穆斯林脱离一个印度教为主的印度的决心不断增强，紧张状态最终在 1946 年和 1947 年骤变为暴力。印度教徒、穆斯林和锡克人都参与并遭受了暴力。

由于印度眼看着就要在他们周围崩溃，英国人开始急着离开了。1947 年 5 月达成的方案——之后不久就得到国大党、穆斯林联盟和锡克领袖的同意——要求给予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两个国家自治领地位。英国议会和王室在 7 月批准了《印度独立法案》，两个国家从 8 月 14 日午夜开始获得自由。

甘地卓尔不群，没有参加在德里举行的庆祝活动。印度赢得了独立，然而却是以一分为二为代价，这打碎了他的统一之梦。新的印度依然保留着甘地视为对印度文明的极大玷污的阶层不平等、种姓歧视和性别压迫。这位伟大的贤者活着看到了英国统治（raj）的终结，却在 1948 年被一位印度教地方自治主义者刺杀，直到最后一刻他依然相信印度自治（swaraj）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甘地可能对印度作为国家的品质非常失望，但他当然知道自治之门最初是由他所唤起和领导的民众非暴力运动开启的。对一个没有代表性但稳固的政府发动系统的非暴力反抗，之前从来没有被召集到这个程度。汇集和发展这样的反抗，使印度领袖们培养了对于运作可行的民主而言至关重要的政治技巧。这项改变了国家历史的运动同样为维持一个公民社会铺就了基石。甘地之后又三代人了，印度仍然被信仰、阶层和种姓所分隔，不过它同时还是一个自由和民主的国家。

（Peter Ackerman，美国国际非暴力冲突中心创办者。Jack DuVall，美国国际非暴力冲突中心主席。译者：刘荻、张大军、任星辉、范冠萍。校对：张大军。原文链接：http://my1510.cn/article.php?id=783187b11342e061）

7-4 林达：重读《甘地自传》

“非暴力是否成功，不是单方条件能够决定的。挑战一个有合理价值观的政府会产生作用，对日本军国政府、希特勒的纳粹政府是无效的，更不要说以非暴力反侵略了。”

一、带着热烈宗教情感的社会改革者

我想自己和大多数人一样，最早遇见甘地，遇到的是一个有定语的名字：“圣雄”甘地，还有他“非暴力之父”的声名。后来，我又发现，自己和大多数人一样，对圣雄甘地其实耳熟而并不能“详”，许多人在景仰宣扬了甘地很久，可能对甘地的“非暴力”落实到具体之处，究竟是些什么主张，也并不清楚，在印度独立的历史上，它究竟在发挥怎样的作用。

说起来有点不好意思，我第一次对甘地事迹有些了解，不但很晚，而且是通过一个故事片，Richard Attenborough 执导的《甘地》，它在 1982 年获得十一项奥斯卡金像奖题名，最终获得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等八个奖项。如此得奖的传记大片，一个特点就是对史实会相当考究不敢掉以轻心，所以从大众普及角度，这确是普通人了解一个历史人物和一段历史的捷径。电影是一种很煽情手段，一般来说，被电影煽过一煽，会对你喜欢的人物更喜欢，对你尊重的人物更尊重。所以那次看电影的经验着实让我吃了一惊，我可以说是带着景仰走进去，满怀狐疑走出来。从此提起甘地，我条件反射般的反应是问号。要消除这些问号，还是要看书。于是在去年我看了甘地自传 Mahatma Gandhi:His Own Story，然后匆匆忙忙在年底去了一次印度。

在印度旅行四十五天，最后在德里有一天空闲时间。我也记得德里应该有个甘地纪念园，最后没有去，心里也没有太大遗憾：在印度，到处都是甘地塑像，遇到的没有一打，七八个也不止了。甘地事迹是印度学校对孩子们最正面、地位不容动摇的教育。虽然近年来印度学界研究的“复杂甘地”也逐渐向民间扩散，一个例证是印度到迪拜的飞机上，就在播放刚刚上映四个月的新电影——《我的父亲甘地》。虽然这不是一部精心制作的大片，可它是货真价实的“印度电影”——由印度导演 Feroz Abbas Khan 执导，由印度宝莱坞明星 Anil Kapoor 制片，通过讲述甘地大儿子失败的人生故事，折射了甘地作为人的个性的另一面——在家里的专制，剥夺孩子们上学的机会，给他们的人生带来极大困扰。虽然这无损圣雄光环，可是一个民间解构，对印度也并不寻常。

曾经困扰我的，是在非暴力运动中看到预期发生的暴力。这让我想有更多的了解，甘地的非暴力究竟是什么？对甘地本人是怎样的概念，它怎样引向印度独立的操作，又引出什么后

果？这是我想读一些书的原因。从印度回来我又读了一遍甘地自传，查了一些不同的甘地传记，还有一些印度历史。

甘地自传可以让读者理解他成长的环境背景，获得他个性形成的第一手资料。甘地于 1869 年出生在印度一个西部半岛的小邦国 Porbandar，人口七万左右，首都人口一万五千。甘地家三代都当过几个类似的小小邦国的总理，当时印度遍布这样的小邦国，直到印度独立时还有五百多个。这些小邦国的日常管理高度自治。我在另外一本传记中读到，甘地祖父曾经和 Porbandar 的摄政王政见不合，宫廷卫兵在他家门口架起大炮，一炮就把他轰走了。这些复杂的邦国政治宫廷争端，英国人是根本不管的。早年生活在这样的小邦国，感受不到什么多少殖民气息，却能够沉浸在浓浓的本土宗教氛围中。尤其是母亲对甘地影响很深，她不仅恪守斋日，还经常额外给自己整日和数日禁食。禁食对于甘地是一种带有强烈宗教意味的行为。

甘地自小是个极敏感和自卑的孩子。在少年和青年时期，甘地的学业事业都不顺利，打击特别大的是进大学后第一年就读不下去而辍学。同时，他却有着三代小邦国总理所形成的家族压力和自我期许。一个长辈告诉他，时代不同了，按照过去模式，他已经不可能子承父业，假如仍然有此雄心，就必须接受现代教育，建议他赴英留学。甘地因此在 1887 年离家去英国。他的目的是取得律师资格，却似乎不是尽量扩展自己的知识。当时英国考律师非常容易，有的学生突击几个月就可以通过，有些应付考试的参考书甚至可以带进考场。但另有规定，必须上课三年。甘地也就在英国住了三年，他花了很多时间和兴趣在素食协会活动和对不同宗教的探究上。1891 年 6 月 10 日，甘地顺利通过考试、取得律师资格，但却并没有大学毕业。

英国这个律师考照制度的特点是：取得执照容易，而要在法庭站得住脚、赢得顾客却很难。它的淘汰环节是在后面的开业执业阶段。甘地取得执照后归心如箭，马上启程回国。三年过去了，他拿着执照却发现自己读书不多，实际并不具备在律师界执业的知识和能力，再加上个性羞怯，因此困难重重。他一开始试着在孟买作为律师开业，遇到并不难的小案子，却在法庭上落荒而逃。最后他在孟买的律师生涯彻底失败，被迫回到故乡。此后，又发生了被甘地认为是带来他人生转折的事件，使他感受羞辱难当。

甘地的哥哥虽然没有成为小邦国总理，却一度在家乡地位显赫。邦国虽小，印人自治的上层却是一潭浑水。此时邦国已经有了英国人的政治联络官。甘地的哥哥被人告到联络官那里，被指涉嫌误导政治上层。他得知弟弟甘地在英国和此官员相识，就要甘地去说情。甘地明知不妥还是去了。官员很秉公办事的样子，说你不至于要利用我们这点友情来徇私吧。这名官员对甘地哥哥的印象完全负面，认为他是个政治阴谋家，也就特别不能容忍甘地的说情。他阻止甘地继续说下去，请他离开，甘地坚持不肯走并且继续往下说，该官员一怒之下就令仆人把他推了出去。甘地生性敏感，感觉自己受了奇耻大辱，他立即写信表示要告对方，对方回信叙述事件经过，表示自己没有做错什么，你尽管去告。关键是从法律角度看，也确实如此。对自尊心极强的甘地来说，这真是很糟糕的心理处境。

甘地冷静下来后细看家乡，不仅政治纠葛复杂，而且，他要在当地开业，就难免要和那位官员抬头不见低头见。幸而甘地家族属于当地政治上层，社会关系和机会也多。此时一个在南非的印度商人有了财务纠纷，需律师帮忙，甘地因哥哥的介绍得到了这个工作机会，就这样出走南非。

到南非后，发生了他被赶下火车的事件。在种族歧视的南非，乘警因甘地是个有色人种，不顾他拥有一等车厢车票，令他离开车厢。甘地拒绝后被拖下火车，行李也被扔下了车。历史学家们把这一事件看作“甘地开端”，是很有道理的。

火车事件对于甘地，是在精神上绝地反击的开端。不久又发生他在坐马车时遇到车夫的歧视，他拼命反抗成功。甘地曾经形容自己是一个失败的学生、二流的律师，在此之前，他面前需要去征服的对象，不论是学业还是事业，似乎一直过于强大。作为三代邦国总理的后代，敏感的甘地始终胸怀大志，却又在现实面前自卑。人和人不同，每个人适合的领域也各不相同，对甘地来说，需要丰富学识知识和分析推理才能实践的事业，并不是他的长处；坚持信念和追求真理才是他的特长。导致他离开印度的那次羞辱事件，几乎是青年甘地失败的象征。可是这一次，他的对手貌似强大却并不占理。看上去是对手打上门来，而在甘地内心深处，也许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准备这样一场精神翻身仗，已经很久很久了。他会不惜一切地以他的生命去抗争。他小小的身躯突然开始迸发出无尽的热情和能量。

从自传可以看到，甘地拿着英国律师执照，却不是一个具备西方律师气质的人。他更像个僧侣或者说信徒。他没有皈依某个宗教，却显然是印度教的基础。看甘地的讲话文章，常有长篇大论的感性表达；相反，理性推理、逻辑叙述的部分却弱得多。他注重精神探求。他对于素食、禁食、禁医药、禁欲和其他禁忌等等，有着非常专注的思考，反复推敲体验、不断检讨自省。在妇女地位极低、童婚制的印度，甘地夫人成了他的绝对顺从者。甘地正当壮年时决定禁欲，他对夫人的态度是“禁你没商量”。妻子对他的决定大多言听计从，其中包括在病危时不顾医生警告离开医院、禁医药和营养等等。甘地对学校有自己的看法，孩子想上学也就不能够做到。而这些决定的背后，都有在甘地看来很深奥的宗教思考和精神。他是在履行信念，追求真理。

这些家庭中的问题看上去是“小事”，却也折射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就是个人的精神探求、宗教信仰，当局限在个人范围，若强加于人，或者说以某种强势向社会扩展推行，终有一些隐患在其中。

有件事情可以看出甘地思路和现代律师有所不同。南非的德兰斯瓦在 1885 年通过一条法律，其中有这样的条款：有色人种和印度人都不能在公共人行道上行走。这条规定其实不仅是一个种族歧视的问题，还有劳工歧视，甘地最感到不平的，是印度人算在有色人种之列，而阿

拉伯人却不算。究其原因，还是大多印度人在南非是被称为“苦力”的契约劳工。去年在印度火车站，印度人呼唤那些替旅客头顶手提五六个大箱子上旱桥、赚几个小钱的搬运工，就还是叫“苦力、苦力”。这条法律更是对“苦力”的歧视。因此，身为律师的甘地，常常不感觉自己也在被禁之列，总是走人行道。可是有一天，甘地被一个官员的门警从人行道上推开，打到街上。

甘地的白人朋友正好经过，当场表示，自己作为目击者愿意为他到法庭上作证。甘地的回答是:“我已经决心不再为自己个人的疾苦打官司。”他的意思是，需要解决的是社会根本问题，他关注的社会不公正如果能够解决，假如社会问题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也就随之解决了。这当然是一种有道理的角度，可也很典型地折射了甘地的思维方式。西方法律工作者的本能反应是，每个人当首先从维护自己的权益开始，自己受到不公正待遇，自然马上诉诸法律，以司法挑战的方式抗争，保护自己的权益就是在为社会公平奋斗。而甘地的态度不仅更偏向一个社会改革家的角度，甚至隐含着某种东方式思维。

作为一个带着热烈宗教情感的社会改革者，甘地产生以“非暴力”的方式进行政治斗争，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带领南非的印度社区以非暴力方式抗议歧视，是甘地找到自我位置、找到自信的起点。他在南非二十二年，虽然达到的目标是有限的，一些歧视法律被取消，可是新的歧视立法还在产生，可是，这毕竟是印度侨民的第一次胜利。消息传到印度，甘地已经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英雄人物。南非的成功给了甘地巨大的鼓舞，1914 年回国的时候，他已经准备在一个更广阔的天地里推行他的非暴力运动，不知道他当时有没有为印度捏把汗，毕竟整个南非只有十万印度侨民，抗争的标的也小，而印度有两亿多人口，其目标和在南非的诉求也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他要的是印度的独立。

二、“非暴力之父”

非暴力，是能够历史悠久地坚持下来的大多宗教的核心内容之一。不论是哪个宗教，不论它们的神灵为何，对经典的解释都是由人在做，对非暴力的理解也是其中之一。非暴力概念本身的发生发展非常有意思，因为非暴力由“施暴”和“受暴后是否暴力反抗”这两方面组成。一开始，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开始对残酷敏感、不愿意施暴，这和文明引发人的本性中善良的一面契合，而面对他人施暴，自己能不暴力对抗，不以暴易暴，宁死不反抗，却已经有违人的本能本性，必须仰仗非常强烈的宗教信念去坚持了。

个人以被动承受暴力的非暴力坚持，再转化为以展示坚忍主动挑战暴力，不惜承受悲惨后果。这种个人自发的所谓非暴力抗争，在宗教冲突刚刚开始的一刻，就已经在发生。记得读法国人让·德科拉写的《西班牙史》，里面就提到在三世纪初，罗马人的宗教迫害就启动了基督教的“殉教时期”，有大批教徒，甚至女童，主动挑战罗马权威，甘受酷刑处死。以身试法的非暴力抗争，即殉教，是宗教的一种极端行为，在初期，基督教教会对如此殉教显然是完全正面

评价的。正因为如此，这样几近狂热的宗教热情会在民众中迅速传染，“殉教”才会一波接一波地高涨而形成“时期”。

宗教信念都是个人化的体验，所以，当时即便殉教人数众多，也是分散的个体事件的集合。七百年后，在十世纪的西班牙南方，基督教再次受到伊斯兰教的压制，又发生新一波非暴力挑战的殉教浪潮，使得双方民众情绪激昂达到巅峰状态。这一次，基督教的主教们终于认识到非暴力挑战隐含了民众情绪失控的负面隐患，那些牺牲是不必要、不值得鼓励的，于是出来谴责挑战行为。替代的解决方案是两个宗教的高层政治交涉以达成妥协。历史在作出指点，哪怕是宗教性的社会改革，面对非公正权威，还是可能有两种不同的思路和处理方式。

这么说来，甘地的非暴力似乎并不能算是一个发明。可是，他被称作“非暴力之父”是当之无愧的。“信仰”本身是宗教，而“争取信仰自由”却是政治概念。群体以非暴力抗争达到某个政治目标，就突然转变成了一种政治手段。甘地把历史上自发的宗教非暴力抗争，不仅发展成大规模发动民众的现代政治手段，也发展出相应的一套理论，最后也确实成为达到印度独立目标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在历史上传为“佳话”。不仅如此，此后通过非暴力方式达到正义目标的历史事件，也都记在甘地那里，非暴力就变成了一个不必探究、绝对正确的神圣符号。可是，事实上，当一个基于个人信仰的个人行为，转化为有人发动有组织的群体运动时，一种质变就在发生，它变得错综复杂、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

甘地的非暴力言论很多，像 Ganhdi on Non-violence（《甘地论非暴力》）这样的书也不少。这些言论大多是类宗教的信条。例如：“非暴力抵抗精神的获得，是一种在自我否定和欣赏我们自身内部潜力的长期训练，它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观……它是最伟大的力量，因为它是灵魂的最高表现。”“我的一贯经验使我确信，除了真理以外，没有别的神。”“非暴力的两个基本点是：一、非暴力是最高法或宇宙法。二、除了真理没有任何别的法。”而“非暴力”就是他追求的占据神位的“真理”。甘地把政治性非暴力的理论，建立在类殉教的信念和热情上。这也是甘地经常宣布绝食的原因，从小母亲宗教性的禁食始终留在他心里。

甘地的非暴力理论要求一个人在遭遇暴力的时候，把热情升温转化到几近狂热献身的状态，却不转为暴力。就连甘地本人都很难做到，他曾经写道：“没有自我纯洁，要遵行非暴力的法则也必然是一种梦想……然而自我纯洁的路程是艰难而崎岖的。一个人要达到完全的纯洁，就必须绝对摆脱思想、辩论和行动中的感情；超越于爱、憎、迎、拒的逆流之上。我知道我自己还没有达到这三方面的纯洁，虽然我在这方面一直进行着不倦的努力。”所以，非暴力引入政治号召，它的潜在问题是明摆在那里的：这就像做一个很难控制的易爆化学实验一样。你怎么可能使得情绪被煽动、相互感染的庞大非理性群体都如同一个个人那样，“纯洁”到位，在强烈的刺激下保持恰如其分的分寸，而不是突然被激怒：“老子不干了”而转为暴力？它当然和人的整体素质有关、和社会环境有关、和对方的反应有关。甘地说：“经验教导了我，文明是非暴力反抗中最困难的部分，这里所说的文明并不是指在这种场合讲话要斯斯文文，而是指

对于敌人也有一种内在的善意的胸怀。这应该在非暴力反抗者的每一个行动中表现出来。”当时的印度，恰是一个没有西方理性传统的国家，而大众整体教育水平极低。就是今天还有一半印度人不会读或者不会写。甘地说的是近一百年前的印度。

“非暴力”如此深入人心，是大家基于字面理解，以为它绝对“没有”暴力。其实事情不可能那么简单。作为政治手段的非暴力、不服从运动，假如简化理解，不顾外部客观条件、不分青红皂白盲目推行，那么推出暴力、推出悲剧来是很正常的事情。虽然甘地一再指出：“我坚决认为，带领人民进行非暴力反抗运动的领导人，应当能够把人民保持在所希望于他们的非暴力界限以内。”这也是典型的“甘地”特点，言论语录大多是无懈可击的真理，可是，与当时的现实很可能是脱节的。在甘地领导的非暴力运动中，也一样引发暴力连连。

更何况，甘地的非暴力并不是“对方主动施暴，此方不暴力反抗”的所谓“消极非暴力”，而是要积极挑起对方的暴力。他认为：“在我看来，没有一种直接的积极的行动，非暴力就是无意义的。”“我想使弱者的非暴力变为勇者的非暴力，这可能是一个梦想，但我必须努力使之实现。”“不是通过把苦难强加给抵抗改革的人，而是通过自己承受苦难而达到改革的目的。因此，我们希望，在这个行动中，通过我们所受的深重苦难，可以影响政府。”“苦难”到什么程度呢？“把生命奉献给自己认为是正当的事情，是非暴力反抗的核心。”“一个非暴力反抗者决不可能逃避危险，不管他是在许多同伴中还是独自一人，只要他是战斗而死的，他就是充分履行了他的职责。”“勇敢在于赴死，而不在于杀戮。”“正像一个人在暴力的训练中要学习杀戮的艺术一样，一个人在非暴力的训练中也必须学习死亡的艺术。”这让我想起基督教的“殉教时期”，而那时，殉教也还不是教会组织的群众运动。

很典型的是那次著名的盐税抗争，事先规划，发动二千五百名志愿者以非暴力的方式、但是违法强行进入盐库取盐。半年多前，我在印度大街上看到的印度警察还是当时的传统装备，就是一人一根粗竹棍。我亲眼看见一个牛车上的印度人，不知犯了哪一条被交通警上去就是一棍，街上车水牛龙，没有人抗议。我目瞪口呆，路人熟视无睹。可见在 1930 年 5 月 21 日那天，盐库的几百个印度警卫会如何应对“抢犯”。面对数量十倍于自己、却一排排冷静上来的民众，警察竹棍腿脚齐下。这是甘地的非暴力追随者精心训练挑选的敢死队，他们一排排上去，挨打、头破血流不还手，但是坚持要违法闯入盐库，直到倒地不起。他们实践甘地的非暴力精神“勇敢赴死”，血腥结果是事先料到的。后面的医疗队早就准备好包扎绷带，等候在那里，也事先通知了外国记者。这是把“苦难深重”给政府看，也是给世界看，转而又是对英国政府的压力。这一非暴力行动的结果，警卫打伤三百二十人，打死两人。

更多的情况是在非暴力运动中情绪激化或矛盾激化，造成双方都有失控，之后形成恶性循环。例如，1921 年的非暴力运动中，在 Chauri Chaura，游行民众与当地印度警察发生冲突，混乱中警察开枪，大多历史书称并未有民众被击中死亡，在一本书中指这是朝天开枪。我看到

也有一本书说是有人被击中死亡。总之激怒的民众把二十名警察和一名更夫锁入警察局，放火后全部烧死。最后甘地被迫中止这次的“非暴力”运动。

当然，在暴力发生在警察一方时，世界舆论的反应是强烈谴责暴力。可是回顾历史，是否也可以引出一个问题：这样的“非暴力”挑起可以预见必定要发生的“暴力”（不可预见的不算），是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式？盐税不合理，在政府税收中的比例却很低。是否可能通过另外的方式，例如“议会道路”、修正立法来解决。印度的自治推进幅度相当大，1935 年英国人制定的《印度政府法》，使得参加印度普选的选民已经达到三千五百万，其中包括六百万妇女和三百万“不可接触者”，国大党通过选举获得的议会议席高达 70％。

这另一条道路，从制度本身切入，逐渐改善民生，进行政治改革、社会改善，很早就由于殖民带来的西风东渐而在印度深入开展。印度一直有自己的政治精英参政，在英国统治的区域争取扩大自治权，本土精英们很早就从立法切入，渐进改革。在甘地只有三岁的 1872 年，梵社领头，就促使政府颁布近代化的《婚姻法》，禁止童婚、禁止一夫多妻、容许寡妇再婚以及种姓之间可以合法通婚。顺便说，虽然甘地不赞成对种姓之外“不可接触者”的歧视，却并不反对不同种姓不可通婚的制度。而直至今日我看到的印度，种姓制度仍然是非常普遍的事情。这不仅说明了印度的社会文化黏稠度——从立法到推行极为困难，更说明了这个社会当时要进入近现代社会，建立法治和民众的法治观念，是重要的事情。

所谓先发社会的强国对后发社会的弱国经商入侵、甚至建立殖民地，从现代角度去看，无疑是非正义的，从历史角度去看，虽“错”却也是一个历史必然。欧洲的东印度公司进去的时候，那里还是个古代社会，印度次大陆各类征服者你来我往，不是什么稀奇事情。同样，随着人类进步，民族意识觉醒和现代国家意识确立，殖民地逐渐要求民族独立，强国或被赶出去、或者和平退出、或从殖民而转为联邦关系，也同样是历史的必然。可是，民族觉醒和殖民后退之间，必然有一个时间差，二者是不同步的。前者以什么方式推进，在暴力甚至战争，以及甘地的非暴力运动之外，也还存在一些其他道路。

三、“非暴力”——非常危险的武器

印度另一个政治领袖真纳，就赞成另一条思路。真纳的气质风格和甘地完全相反。他受到极好的教育，思维敏捷，是一个极成功的律师，也是一个宪政主义者和立法人。在历史变化中的英国殖民政府，面对百年复杂局面，法治状态也有过多次反复。真纳也曾在法治倒退的低谷时刻，愤而退出立法议会表示抗议。可是他的基本态度是个法律人，他始终反对甘地以群众运动对抗不合理法律的做法，他公开批评甘地的群众运动到哪里，哪里就开始混乱。他不赞成甘地经常以发动成千上万的民众主动违法入狱的做法。他反对甘地的非暴力抵制，这些抵制包括拒绝纳税、拒绝服兵役、印度公务员全部退出公职、印度法律工作者退出工作、抵制法庭、学生全部离开公立学校、焚烧洋货和抵制英国纺织品等等。在甘地的号召下，青年学生成为非暴

力运动的主力，纷纷退学，“杀向社会”。在这次运动中，有三千名研究生、六千多名大学生和四万多名中学生退学。不但暴力冲突和死亡不断，民众连续挑战法律、自动入狱，“以前被社会认为是不光彩的入狱，现在被看作是爱国主义的最高奖赏”。

作为国大党创始人，真纳认为甘地来了之后，改变了国大党成立的初衷。在独立前，逐步扩大自治、大幅增加印度人政府公务员、建全法治、发展现代教育，曾经是印度知识精英长期在努力的目标，而现在在非暴力不合作的口号下，在制度建设和法治建设上倒行逆施，最终伤害的可能是印度的长远利益和民众利益。例如，后来的印度女总理、当时还是小女孩的英·甘地就因此离开学校教育，由家里聘请家庭教师读书，可是，并非每一个印度孩子能够这样做到。

如甘地对泰戈尔所说的，他“日以继夜，绞尽脑汁”，只是要找一个再次发起非暴力运动的突破口。反盐税就是他找到的突破口，只是逼走英国人的一个手段，而不是就盐税论盐税。采用长期、持续不断进行的非暴力群众运动，是个紧逼盯人的策略，因为不论怎样对方都是输家。它的目标是快速的根本变革。在印度当时的情况下，是以支付正在行进中的法治和制度建设为代价的。印度民众本来就薄弱的法治观念也被毁坏殆尽。真纳在给甘地的信中说：“你的方式已经在迄今为止你所接近的几乎每个组织中，以及在国家的公共生活中，引起分裂和不和，全国民众都在铤而走险，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彻底的无组织和无秩序，其后果如何，我焦虑地注视着。”

在甘地、真纳不同态度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古代社会如何应对近代化、现代化、全球化的问题。英治印度从古代社会进入近现代的同时，英国本身也经历了工业革命，先发工业国家向滞后的农业国大量收购原料，反过来倾销成品，也是无法避免的历史现实。对于生产力处于古代水平、自给自足的印度，必然带来巨大冲击。例如，在印度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土布和洋布的转化。英国突然发展了纺织工业，就收购大量棉花、反销廉价的机织洋布，使得印度成千上万的土布织工突然失业限于绝境。究竟是积极应对“转型”，还是坚持古典生活、反抗被纳入近代化轨道，是一个决定命运的选择。这也是甘地和真纳他们的分歧所在。问题不是人最终是否应该回归自然的哲理讨论，问题是：在印度当时的时间、条件、地点之下，究竟什么是历史的必然。甘地自己从此一身土布“拖地”，要求全国民众回归土布手摇纺车时代，烧尽价廉物美的洋布，要求国大党人必须以每日亲自纺纱若干作为党费交纳。最后实在无法推行，不了了之。而真纳对这种勉强拖住历史车轮的观念和做法，不屑一顾。

甘地在当时就风靡全球，包括风靡英国。它的历史背景是：包括英国在内，强国对殖民历史本身普遍的反省和道德谴责。甘地大量反暴力哲人格言，展现的对民众的号召力，一身“拖地”纺纱和东方式神秘，不断入狱绝食的政治道德形象，使他成为世界偶像。很少有人去想，在将类宗教追求，转化为与法治逆向的实现政治诉求的手段，在一个两亿多低教育人口的大国付诸实践，必定隐患连连。而甘地的非暴力不仅在实践中出现种种问题，在理论上也走向极

端，逻辑混乱，令人困扰。1936 年 8 月，甘地曾经接见中国国民党元老戴季陶，表示中国在进行抗日战争，便说明是没有非暴力主张。不久甘地接见世界基督教领袖，再次提到："不管怎么说，中国不是在实行非暴力。它能英勇对日抗战，说明中国从来没有非暴力意愿。说它只是自卫，从非暴力原则来说，这不是理由。""从非暴力主义者的立场来看，我必须说，以一个拥有四亿人口的中国，来对付一个开化了的日本，还是不得不以日本人的同样手段来抵抗日本侵略，我以为这是不适当的。假如中国人有我这样的非暴力信念，就不需要和日本人一样的最新毁灭手段。中国人可以告诉日本人，'带着你们的毁灭手段来吧，我们以两亿人给你，可是剩下的两亿人我们是不会屈服的'。假如中国人真的这样做了，日本人就会变成中国人的奴隶。"

作为个人来说，任何个人立场和平主义信念，都是必须得到尊重的。二战期间，英美都有甄别"基于宗教信仰的和平主义者"的机构，得到确认的公民可以免服兵役，以保护宗教自由。甘地不一样，他的非暴力不仅是个人信念，是要广泛发动的群众运动。他有关战争的理论和信念，要扩大向全民宣扬，要发动整个印度民众抵制协助盟军参战。英国的印度总督接见了甘地，表示尊重他的个人信念，却希望他不要在反法西斯战争的紧要关头煽动民众反战，也不要动摇作为盟军一部分的印度军队的军心。在战时，这样的煽动是违法的。甘地不顾二次大战中世界危急局势，以及战时状况的特殊，反而认为，是否容许公开宣扬，是在捍卫"言论自由"。而"言论自由以及相关行为，是民族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而宣言以非暴力替代战争，正是拯救西欧免遭屠杀的福音"。

总督两度与甘地会谈，总督认为，甘地作为个人并非没有言论自由："你是彻底反对履行作战义务，并且已经公开表达过了。"总督说，"但是我不能让你向别人，向战士或军工厂工人，进行反战宣传，削弱民心士气。"总督告诉甘地，在二战危急关头"说是反战而不危及印度利益，是不可能的。这个利益也包括了你们要求的言论自由"。总督的意思很简单，假如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获胜，印度的利益和自由都将不复存在。

而甘地仍然坚持己见，发动了十四个月的非暴力反战宣传运动，有两万五千人因此陆续被捕，也很快尽数释放。不久，德军攻入苏联，然后珍珠港袭击事件爆发，日本投入远东战争。争取反战之"言论自由"的非暴力运动在印度也越来越不得人心，难以为继，最后草草收场。

国大党一些领导人和甘地想法不同，他们一直希望借二次大战的机会，以战争配合来作有关快速独立的政治交易。多年来，印度的自治权一直在不断扩大和加强，此时英国政府承诺印度再次立宪，印度作为自治领，建立自己完全的民选政府。可是鉴于战争局势，在此之前，仍由原来政府负责国防事务，使印度成为整个反法西斯战局的一员。实际上，此刻的印度政府已经相当"印度化"了。而甘地要求的是"立即完全"的独立，由印度立即接管国防和军队。那是 1942 年，不仅中国，整个东南亚危在旦夕，这样的条件是英国政府不可能接受的。在甘地起草的国大党决议中，说立即独立方案的挫败，"已经在印度迅速引起广泛的仇英情绪，并且满意日本的军事胜利"。而假如满足国大党要求英国立即撤出，"本党可以将仇英情绪转为友好"。

指出假如不满足这个要求，“混乱局势可能蔓延”，这显然是一个威胁的说法，也对自己掌控民众情绪的能力十分自信。

就在二战局势最紧张的关头，甘地“积二十二年斗争经验，动员所有的力量”，发动领导了最后一次大规模的非暴力运动。印度政府以总督名义发表了一个国务会议的决议：“国大党正在从事某种非法活动的准备，甚至已发生暴力事件，破坏通讯和公共事业，煽动罢工，妨碍公务，阻碍政务，政府曾对此容忍，希望自行修正而无效果。对此挑衅，政府被迫起而应对。”此时若“采纳国大党要求，印度会立即变成无政府状态，使印度为人类自由之共同目标所作的努力，全部失败”。随后，甘地和他的秘书被逮捕软禁，家属可随行照顾生活。七天后甘地秘书心脏病突发而死。他的死亡引发民众猜忌，立即爆发全国流血暴动，攻打警局，暴乱中各地也发生警察开枪，全国死亡超过九百人。

二战结束，英国人开始履行撤出的承诺。甘地带领的一次次“非暴力运动”，因其轰轰烈烈，成为独立进程中最抢眼的标志。其实，这是一个复杂推动的历史结果。有双方无数政治家的努力，也有双方的历史推进。英国从东印度公司开始，到后来女王下诏，直至离开，有两三百年的过程，英国本身也在经历惊人变化，包括英国对各殖民地的看法和做法，都有本质的改变。香港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甘地说过，“假定有一种人，决心不屈服于暴君的意志，暴君就会感觉自己的恐怖手段无效了。如果有足够的食物去填塞暴君的嘴，终有一天他会感觉不消化。假如世界上所以的老鼠都开会，决定它们都不再怕猫，大家跑进猫嘴，那时老鼠就都能活命了。”这是甘地一个极端的说法。至少很多人相信，印度独立是甘地的非暴力敢死队挑战暴君胜利的单方面结果。实际上，胜利的也是英国的政治和制度进步。三百年来，英国从一个老牌殖民者，变为二战中民主进步力量的代表之一。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政府，在漫长的时期里，面对历史现实，它不可能在印度民族独立意识觉醒的时刻，就立即放弃。英国人在三亿人口的印度次大陆，本身人数非常少，在民众起来暴动的过程中，多次有过政府失控的流血事件，尤其是在早期。可是，这并不说明，英国政府是和希特勒政府一样的暴君。尤其是后期的印度政府，已经是大半由印人自治的政府了。

英国人撤出印度的计划，其实很早就基本定下来。只是具体怎么做，是作为英联邦中一个自治领还是彻底独立，如何定位一直是自治领的五百多个小邦国，都需要双方政治家反复协商。在离开之前，英国人尽其所能为各方协调，希望得出一个满意结果。长期以来，印度群众运动导致民众类宗教的政治热情却高烧不退，隐含着极大的危险，一个标志就是宗教冲突绵延不断。英国人曾经多次警告，他们过早撤离，可能会出现骚乱和动荡的局面。可是印度政治家们摩拳擦掌，恨不能马上彻底接下这个国家。在外部压力事实已经撤出的时候，内部宗教冲突激化，印度已经像个火药桶。

甘地引发非暴力运动的具体诉求，只是被看作一个“由头”，“哈里发运动”也是如此。自古以来世界伊斯兰帝国实行政教合一的哈里发制度，最终在 1924 年由土耳其的凯末尔废除。在此之前，为保存哈里发制度，印度的伊斯兰社区，要求英国和土耳其签订合约时保障传统的哈里发地位。甘地动员印度教民众支持和自己宗教完全没有关系的“哈里发运动”。相反，作为穆斯林的真纳，却和“哈里发委员会”保持距离，也反对甘地的做法。甘地的非暴力反英运动纳入宗教诉求之后，后果可想而知。最后引发的暴力不可收拾。甘地叫停后，印度教徒很容易停下来，哈里发对他们来说，本来就是莫名其妙毫不相干的事情。而情绪被煽到最高潮的伊斯兰群体，顿时觉得自己被印度教徒出卖。此后几年，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发生几十次大规模的暴力冲突，大量死伤，这些冲突又催生了双方的宗教极端组织。伊斯兰教徒占印度人口的四分之一，很长时间内，穆斯林联盟的诉求是他们作为一个独立政党，和国大党平等，而国大党更多时间表现出来的是一党独大的傲慢：要求对方解散，成员加入本党，然后我分一定比例席位给你们。

在英国人离开之前的宗教和政治冲突，是印度已经高度政治自治的结果。而甘地和国大党都曾表现出对少数社群的忽略与不尊重。各省立法议会开会，首先演奏违反伊斯兰教的“民族歌曲”，国大党管辖的各省，学校课本内容都是对印度教的宣言。穆斯林的呼唤祈祷被禁止，清真寺的礼拜被袭击。甚至发生印度教徒作伪证，诬陷整个穆斯林村庄所有村民都参与谋杀。在作为少数群体的穆斯林没有安全感的时候，国大党又不愿意和他们的代表合理分享政治权力。

穆斯林政治精英在长时间里，一直坚持要维持一个完整的印度。可是终于失望，萌生去意，要求成立自己的巴基斯坦国。政治谈判不成，从穆斯林联盟号召“直接行动”的抗议开始，直至后来分治期间的暴民互相残杀。印度沦为自相残杀的杀戮场。在甘地领导印度独立运动的四十多年里，双方失控，导致警民共将近八千人死亡，在英国人撤离的一年之内，印人自相残杀约达一百万人（在写《我也有一个梦想》时，我曾简单提到这一段历史。我当时采用了我见到的最小数字，死亡四十万人。后来查阅不同资料，大多认为没有准确数字，历史学家们估计在死亡在一百万人和两百万人之间）。最后，甘地以他的“圣雄”声望，绝食平息骚乱，创造了最后一个奇迹。

我想，一年如此杀下来，也该罢手了。而甘地本人最后被印度教极端分子刺杀，如求仁得仁，给一个非凡人物一生追求的事业，画下一个圆满的句点。

此后，各国各地成功的非暴力抵抗，都加在甘地的功劳簿上，也就很少有人再问：在一个非暴力的故乡，在非暴力的理论和实践盛行四十多年后，英人撤离了，为什么会充满如此的暴戾血腥之气。

非暴力是否成功，不是单方条件能够决定的。挑战一个有合理价值观的政府会产生作用，对日本军国政府、希特勒的纳粹政府是无效的，更不要说以非暴力反侵略了。其次，作为一个政治手段，非暴力抗议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号召者并不能因为“非暴力”三个字就占据一个永远不错的道德高位和自诩“政治正确”，不能因此就可以不服任何责任。在预见对方可能使用暴力，可能导致大量民众流血牺牲的时候，领导者是应该有所顾忌的。非暴力抗议和民众的素质也有关，今天高度文明、高度民主和法治健全的国家，民众对政府某个做法不满意，决定大家有时间限制、有条件限制地抗议表达，这是一种非暴力抗议方式；而在一个社会条件不成熟，民众自控能力差，法治不健全的社会，要以大规模、无休无止的、具有挑战性、不达目的誓不收兵的非暴力运动，又是另外一回事。后者很可能引发暴力流血的后果来。这和它的对象有关，和要达到的目标、方式、时机等等都有关。总之，非暴力概念被引入政治领域后，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武器，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甘地的非暴力绝非和平概念，那是时时提到死亡和献身、介于和平与暴力之间的一种政治手段。

发生在甘地和印度的非暴力历史，可以说也是一个无可避免的历史存在，可是，事后我们假如沉醉于张扬自己的道德感，一味地神化和美化这段历史和“非暴力”的概念，可能是一种很轻率的态度。后代政治家运用非暴力手段时，其实必须非常负责任地、谨慎地对待。

（林达是一对生活在美国的华人作家夫妇合用的笔名，两人都是 1952 年出生于上海，90 年代初移居美国。我们在媒体上看到的文章和以林达为名出版的书多是太太李晓林的作品。原文链接：
http://www.dfdaily.com/html/150/2008/8/8/423314.shtml、
http://www.dfdaily.com/html/150/2008/8/15/423362.shtml、
http://www.dfdaily.com/html/150/2008/8/23/423365.shtml）

7-5 阿兰达蒂·洛伊：印度的死亡在乡村[1]



“切勿以为我们有一个超负荷运转的政府，一个努力解决其面临的如山问题的政府。这样想是危险的。事实是，这个政府正在制造问题。它是一架其大无比的贫困制造机，最擅长挑动穷人去对抗更穷的人，扔点面包屑到那些可怜人脚下，让他们在争抢中消耗精力，主子的住所则安然处于宁静（和广告）之中。”

“要遭罪，也该是为国家利益遭罪。”

——1948 年，面对因建设希拉库德大坝（Hirakud Dam）而即将背井离乡的村民，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总理如是说。

我站在一座小山丘上，笑出了声。

我是从贾尔森迪黑（Jalsindhi）坐船横渡讷尔默达（Narmada）河的。上得岸来，我登上岬角。放眼望去， 西卡（Sikka）、桑让（Surung）、尼姆格万（Neemgavan）、多姆克迪（Domkhedi）部落一座座小村庄散落在一片低矮、荒芜的小山丘中。我能看到他们通风良好、说不上坚固的家，看到屋后的田地和森林。我能看到小孩子赶着小山羊跑来跑去，好像装了引擎的一颗颗花生米。我很清楚，眼前所见是一个比印度教还要古老的文明，而这一文明却预定—并且已由印度最高法院正式批准—今年雨季就要被淹没，届时，萨尔达尔萨罗瓦尔（Sardar Sarovar）水库的水位将会上升，把一切永远埋在水下。

我为何发笑？

因为我突然想起，在撤销进一步建造萨尔达尔萨罗瓦尔大坝的禁令之前，德里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曾不无柔情地询问，安置地区的部落小孩们有没有供其玩耍的儿童乐园啊？政府方面的律师赶紧保证，儿童乐园是有的，不仅有，而且每一个里面都装上了跷跷板、滑梯、秋千。仰望无边无际的天空，俯视奔流而去的河水，有那么一刹那，这一切的一切之荒谬，让我怒极而乐。我笑了，虽然我并非有意要嘲笑什么人。

[1] 原文 The Greater Common Good 首次发表于 1999 年的印度 Frontline 杂志第 16 卷第 11 期，并于同年由孟买的 India Book Distributor 公司发行单行本。中文版由作者授权，黄秀铭翻译。

我首先要申明，我并不是一个硬要跟城市过不去的人。我过过乡下日子。对于乡村的与世隔绝和不平等，其蛮荒可能达到的程度，我有过亲身体会。我不是一个反对发展的偏执狂，也并不想劝说人们把传统和习俗保存到永远。然而我好奇。把我带到讷尔默达河谷的，正是这好奇心。本能告诉我，这里发生过天大的事。这里曾经战线分明，作战双方陈兵布阵。这里，希望、愤怒、真真假假的信息、政治手腕、宏大的工程规划、有名无实的社会主义、激进的行动派、官僚机构的花招、不明真相的感情用事，纠结成一个烂泥淖，里面还掺杂着无所不在、总是令人生疑的国际援助，以及与之如影随形的种种机谋。

本能让我把乔伊斯和纳博科夫的书放到一边，暂缓阅读唐.德里罗（Don DeLillo）[2]的巨著，而代之以有关排水和灌溉的报告，有关什么是大坝、大坝能起什么作用的书籍、期刊、纪录片。

没等我试探性地提几个问题，就发现，几乎没人知道讷尔默达河谷目前究竟是什么情况。知道的人知道一大堆，大多数人则一无所知。尽管如此，差不多每个人都抱有热诚的主张。没有人采取中立立场。我很快意识到，自己一不小心，已经步入雷区。

过去十年来，在印度，反对修建萨尔达尔萨罗瓦尔大坝的斗争已远远不再是一河之争。这既是这一斗争的力量所在，却也带来了不利影响。几年前，它演变成一场激发大众想象力的辩论。筹码因此而加大，斗争的性质也因此而改变。起先，这只是事关一条河谷命运的斗争；到后来，整个政治体系都被置于考量之下。现在要弄清的，是我国民主制度的本质。土地为谁所有？河流为谁所有？森林、鱼，为谁所有？这些都是天大的问题。对这些问题，政府给予了天大的认真对待。政府辖下的每一个机构—军队、警察、官僚机器、法院，对这些问题都给出了同一个回答。不仅给出，而且给得毫不含糊，给得激烈、残暴。

对于河谷的居民来说，筹码加大到如此程度，意味着他们最有力的武器——针对特定河谷的特定问题的特定事实，在针对那些重大问题的争论中，失去了杀伤力。争论的基本前提被人为吹胀，直到“啪”的一声破成碎片，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飘散得无影无踪。偶尔，这个谜题中某个孤立的碎片会从我们身边飘过——一份情绪激昂，有关政府如何无情对待坝区移民的报告；人们对拯救讷尔默达运动组织（Narmada Bachao Andolan）“一小撮活跃分子”绑架整个国家之行为的指责；一位法律记者就拯救讷尔默达运动组织向最高法院提交请愿的进展情况、发回的报道，等等。

[2] 译注：美国当代作家，被现代评论界广泛认为是文学后现代主义的中心角色。代表作《白噪音》于1985 年获得国家图书奖。

迄今，尽管就此问题已有相当数量的文章发表，但大部分都是针对一个有着“特殊兴趣”的读者群。新闻报道倾向于关注该工程一些孤立的方面。政府文件被列为“机密”。不妨说，公众对此事的看法相当粗浅，并且可以大略分为两类：

一种看法是，这是一场战争，交战一方鼓吹发展，代表所谓的现代、理性和进步力量，而另一方出于某种新卢德派（neo-Luddite）[3] 的动机，非理性、情绪化地反对发展，而向往工业革命前田园牧歌般的生活。

另一种看法是，这是尼赫鲁与甘地之间的对立。这样一来，这整个可悲的事件就不再是由欺骗、谎言、虚假承诺和日益成功的宣传（宣传可不就是为了成功嘛）构成的泥淖，而具有了冠冕堂皇却名不副实的合法性。双方都好像以国家利益为重，分歧仅仅在于以何种方式实现这一利益罢了。

两种解读对这场争端给出的解释都缺乏说服力。两种解读煽起的情绪都掩蔽了这一具体事件中的具体事实。两种解读都显示我们是如何迫切需要新的英雄，一批新型的英雄，并显示我们过去的英雄如何已经被大众过度使用（让印度板球队的投球手超负荷投球就是个例子）[4]。

尼赫鲁与甘地之争说，把这个当代问题的新酒装到了旧瓶子中。尼赫鲁和甘地都是宽厚仁慈的人。他们的发展观，建立在对内在道德观的假定之上。尼赫鲁主张苏联式中央集权国家的父性、庇护式的道德观。甘地主张浪漫化乡村共和国的养育式母性道德观。这两种模式本来都应该行得通，前提是作为人，我们得比现在好很多，大家都乐意穿印度土布，能够抑制种种基本冲动——性、购物、躲避责任、恃强凌弱，等等。50 年过去了，可以靠谱地说，我们并未达到这种境界，连挨边都谈不上。要为我们自己的本性投保，保险计划得大加修改才成。

很有可能，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已经用完了本世纪的英雄配额，可是我们一边等待头顶光环的新英雄出现，一边还得把损失控制在一定范围才好。我们得支持小英雄们（这样的英雄我们多的是）。我们得用特定的方式打每一场特定的战争。谁知道呢？也许这就是 21 世纪寄望于我们的。一切跟“大”沾边的，统统化小：大炸弹、大坝、大意识形态、大矛盾、大国、大战、大英雄、大错误。也许 21 世纪将是一个凡人小事的世纪。也许就在此刻，就在这一分钟，天上正有一个小小的女神准备助我们一臂之力。会吗？可能吗？这样的前景真让我垂涎欲滴啊。

讷尔默达河谷如此吸引我，是因为我感到讷尔默达河之战已进入了一个更新、更让人伤心的阶段。我去，是因为写东西的人被故事吸引，就像秃鹫被鸟兽尸体吸引一样。我的动机不是同情，而纯为贪婪。我还真蒙对了，在那里真找到了故事。

---

[3] 译注：卢德派，英国 1811-1816 年以捣毁纺织机器为手段抗议资本家降低工资和解雇工人的团体的成员，新“卢德派”泛指强烈反对提高机械化和自动化的人。

[4] 译注：印度是世界上板球运动开展得最好的国家之一。

而且，是怎样的一个故事啊。

“人们说萨尔达尔萨罗瓦尔大坝是一项昂贵的工程。但它能给数百万人带来饮用水。这是我们的生命线。你能给生命线定价吗？我们呼吸的空气有价吗？我们要活下去。我们要喝水。我们要给古吉拉特邦带来荣耀。”

——古吉拉特邦（Gujarat）最高行政长官奇曼布亥.佩蒂尔（Chimanbhai Patel）的夫人乌尔米拉本.佩蒂尔（Urmilaben Patel），1993 年在德里一次公共集会上的讲话。

“我们要求你们在大坝建成后搬离住家。如果搬，那就好。否则，我们会放水，把你们全淹死。”

——莫拉尔吉.德赛（Morarji Desai）[5]，1961 年在彭坝（Pong Dam）既定淹没区一次公共集会上的讲话。

“为什么不把我们毒死算了？那样，我们就不用住在这个鬼地方，政府也好独自跟它的宝贝大坝一起过下去了。”

——拉姆.柏（Ram Bai），在讷尔默达河建巴吉坝（Bargi Dam）时，她的村庄被淹。如今，她住在贾巴尔普尔（Jabalpur）一处贫民窟中。

印度独立以来 50 年里，自从尼赫鲁发表著名的“大坝就是现代印度的神庙”的演说后（在他有生之年，尼赫鲁终于对这次演说感到后悔），他的追随者便投身于建坝事业中，其狂热程度只能用“走火入魔”来形容。建坝逐渐与建国相提并论。单看这些人有多么狂热，就足以让人心生疑窦。他们不仅建起新的坝、新的灌溉系统，而且把几千年来由村社管理的小型传统水利系统抓到手中，然后任其衰颓。为了补偿损失，政府又建起更多坝，大、小、高、矮，应有尽有。政府这般努力的结果，是印度可以夸耀自己跻身世界三大大水坝建设国。根据印度中央水利委员会的数据，我国现有 3600 座可称为大型的水坝，其中 3300 座是独立之后建造的。此外还有 1000 多座正在建设中。与此同时，我国五分之一的人口，也就是两亿人，没有安全的饮用水；还有三分之二，也就是六亿人，缺乏基本的卫生设施。

大型水坝可以善始，却鲜有善终者。一度，每个人都爱它们，每个人都拥有它们——共产主义者、资本主义者、基督徒、穆斯林、印度教徒、佛教徒，一个都不少。一度，它们让人诗兴大发。但好景不长。如今，抵制大坝之风席卷全球。在第一世界，大型水坝或被停用，或被炸毁。大型水坝之弊大于利，已成人所共知的事实，而不再是猜测。大型水坝过时了，再也不

[5] 译注：第一位非国大党人印度总理，人大党领袖，任期为 1977 年 3 月 24 日——1979 年 7 月 28 日。

酷了。它们不合民主原则。它们是政府集权的手段（决定谁能得到水、得多少，谁能种什么、种在哪儿）。它们是夺去农民智慧的手段，屡试不爽。它们是把水、土地、灌溉系统从穷人手中夺走赠送给富人的行径，厚颜无耻。水库迫使大批民众流离失所，无家可归，陷入赤贫。从生态学角度讲，大坝也没什么可炫耀的：土地荒芜，洪涝频仍，土壤盐化，疾病流行。越来越多的证据还表明大坝和地震密切相关。

大坝曾被誉为现代文明的丰碑、人定胜天的标志，实则盛名难副。丰碑照说不该受时光侵蚀，而大坝的生命却太有限。大自然在水库里塞满淤泥，大坝的生命便告结束。如今地球人都知道，大坝所起的作用与公关机构所说的正相反。“局部遭罪，全国受益”的神话已被戳穿。

正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第一世界国家的建坝业陷入困境，难以为继。于是，这些国家打着发展援助的旗号，将这一行业和其他垃圾（如老式武器、超期航母、违禁杀虫剂之类）一起，出口到第三世界国家。

一方面，历届印度政府，无一例外都自恃真理在手，对第一世界诘难有加；另一方面，却花大把金钱购买第一世界国家包装精美的垃圾。援助只不过是又一桩贪腐生意而已，和殖民主义没什么两样。援助已经毁掉大半个非洲。孟加拉国在援助的照拂下，至今站立不稳。这一切我们都很清楚，肮脏细节不提也罢。而在印度，我国领导人却奴颜婢膝，对援助笑脸相迎（同时又企图靠造原子弹来壮自家底气）。

过去 50 年里，单单在灌溉上，印度就花费了 8000 亿卢比。然而，跟 1947 年相比，易发干旱的地区更多了，易发洪涝的地区也更多了。尽管已有令人担忧的证据显示灌溉系统处于危机，大坝引发了洪涝灾害，人们对“绿色革命”迅速感到幻灭（产量减少，土地退化）[6]，政府却从未组织对印度 3600 座大坝中任何一座进行建后评估，以判断大坝是否实现了当初的既定目标，大得吓人的花费是否值得，或甚至，实际花费究竟几何？

印度年产粮食或食用油有几百万吨，与 1947 年相比增产多少—对于此类问题，政府能提供精确的数字。它能告诉你每年开采了多少铝矾土，国道的总面积加起来是多少。你可以获取每一分钟的证券交易信息，了解国际市场上卢比的外汇牌价。我们有办法知道某个星期五印度在沙迦输了几场板球赛。印度任何一年有多少大学生毕业，有多少人接受了输精管切除手术，也不难得知。可是，有多少人因建坝而流离失所，或在“国家进步”的名义下以其他方式做出牺牲，印度政府却拿不出任何数据。这难道不令人震惊吗？如果不知道“进步”的代价是多大，不知道谁在为“进步”埋单，那又怎么衡量“进步”？如果不把生产的真正成本考虑在内，“市场”又如何为各种商品—食物、衣物、电、自来水等等—定价？

[6] 译注：“绿色革命”，发展中国家通过使用化肥、杀虫剂和高产作物品种而一度实现的农作物产量巨大增长。

根据印度公共行政管理学院对 54 座大坝进行的详尽研究，平均每一座的建设会导致 44182 人背井离乡。与总数 3300 座相比，54 座的取样显然不够大。但既然这是我们手头仅有的数据，那就据之做一个粗略的计算吧。权当初步草算好了。为谨慎起见，让我们先把人数减半。或者，咱倍加谨慎，每座坝平均只算 10000 人。这一数字实在小得不像话，我知道，不过就这样吧……掏出计算器开算，3300×10000＝3300 万人。这就是我们算出来的结果。3300 万啊。这只是过去 50 年里单单因为大型水坝而离开家园的人。因为成千上万其他开发工程而被迁移的人，又有多少？在一次不对公众开放的演讲中，印度规划委员会（the Planning Commission）主席 N.C. 萨克瑟纳（N.C Saxena）说，他认为受影响的民众人数为 5000 万上下（其中 4000 万受建坝影响）。我们不敢这么说，因为这并非官方说法。这并非官方说法，因为我们不敢这么说。你只能小声嘀咕，怕被扣上夸大其词的帽子。你只能悄声自言自语，因为这数字实在难以置信。不可能，我一直告诉自己。我一定把那些个零弄错了。不可能是真的。我几乎没有勇气大声说出这个数字，怕别人当我是 60 年代的嬉皮士在冒酸水（“都怪体制，老兄！”），或当我是患迫害狂的精神分裂病人。但要怪的就是体制，老兄。能怪别的吗？

5000 万人。

来吧，政府。争辩吧，讨价还价吧，把数字压低点吧。说点什么啊。

我感觉就像不知不觉中突然撞到了一座万人坑边上。

5000 万，比整个古吉拉特邦的人口还多。几乎是澳大利亚人口的三倍。是印巴分治后逃印难民人数的三倍还多。是巴勒斯坦难民人数的十倍。当年逃离科索沃的难民是 100 万，西方世界至今还为这些人的未来而寝食不安。

5000 万迁离民众中，很大比例是部落民（就萨尔达尔萨罗瓦尔大坝而言，57.6％是部落民）。要是把达利特人（Dalits）[7]也算上，这一比例就更是高得匪夷所思了。据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专员（Commissioner for Scheduled Castes and Tribes）[8]称，部落民加上达利特人，占移民比例大约 60％。想想部落民仅占印度总人口的 8％，达利特人仅占 15％，整个故事对

[7] 译注：在印度教种姓制度下，达利特被认为是肮脏的。上等种姓称他们为“不可接触者”，即贱民，而他们自称为“受压迫的人”，即达利特。

[8] 译注：在印度独立之前，对处于社会最底层群体的一般性称呼带有明显的歧视色彩，即“不可接触者”（Untouchable）或“贱民”，还有另外一群处于落后状态的群体被称为“原始部落”、“野蛮部落（Wild Tribe）”、“山民（Hill Tribe）”等。在首部印度共和国宪法中，颁布“不可接触制（untouchability）”为非法并废除了上述称谓。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被确定为对印度一批群体正式的、带有法律效力的称谓。这种法律意义上的称谓一直沿用至今。从此，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便有了一个不带歧视色彩的中性解释：由印度总统批准、政府公告确认的、用官方文表列出的特指群体。

你来说，恐怕会有更深一层含义了吧？受害者的种族"另类"身份，使得国家建设者们身上的压力大为减轻。这就像一个报销账目，总归有人埋单—来自另一个国家、另一个世界的人。印度最穷困人群在资助印度最富有人群的生活方式。

耳边好像有人在夸夸其谈，说什么"世界最大的民主政体"？

这几千万人怎么样了？他们如今在哪里？他们如何谋生？没人确切知道。上月曾有报纸报道说，龙树萨格尔大坝（Nagarjunasagar Dam）迁移的部落民中，有人向国外收养机构出卖亲生婴儿。政府插手干预，把那些婴儿送到了两家公立医院，后来其中六个因缺乏照料而死去。说到安顿，政府很清楚哪些事情是当务之急，哪些不必太过操心。印度根本没有全国性安顿政策。根据 1894 年（经 1984 年修订）的土地获取法案，除了现金补偿，政府不承担向移民提供任何其他帮助的法律责任。发挥一下你的想象力吧。一份现金补偿，由一位印度政府官员支付给一位目不识丁的男性部落民（女性什么也得不到），而且是在一个连邮差送封信都会索要小费的地方！大部分部落民并无正式的土地所有证，什么补偿也别想拿到。再说了，对大部分部落民，或者大部分小农户，钱能派多大用场？一位最高法院法官，拿一袋化肥能派什么用场？

这几千万移民已不复存在。书写历史时，不会有他们的一席之地。连以统计数据的形式出现都不会。他们中一些人随后又被重新安置过三四次—一座水坝，一处火炮试验场，另一座水坝，一座铀矿，一个火电厂，都可以成为他们再度迁徙的原因。迁徙之旅一旦开始，就再也停不下来。绝大部分人最终被大城市边缘的贫民窟所吞噬，汇入大城市的廉价建筑劳动力大军（去建设使更多人流离失所的更多工程）。诚然，他们未被彻底消灭，未被送进毒气室，但我可以保证，他们的食宿条件比第三帝国任何一所集中营都要糟。他们不是俘虏，但对他们来说，"自由"二字只得重新定义。

噩梦还远未到头。他们的住处已经简陋肮脏得跟地狱没有两样，可即便如此，只要大选不是近在眉睫，而城里的有钱人觉得周围的卫生条件差了点，政府的推土机便会隆隆出动，投入清理工作，把移民赶出家门。在德里这样的城市，他们还得冒因为在公共场合大小便而被警察射杀的风险——一年多前，就有三位贫民窟居民遭此厄运。

在 18 世纪 70 年代的法属加拿大战争中，阿美士德勋爵（Lord Amherst）向当地人赠送感染了天花病毒的毯子，以此灭绝了大部分加拿大土著印第安人。两个世纪之后，在我们本真印度，人们找到了不那么露骨却能达到同样目的的方法。

印度这几千万移民不是别的，而是战争难民，虽说没人承认这场战争。而我们，就像昔日白色美国、法属加拿大、希特勒德国等国的公民一样，把头扭到一边，从而默认了这场战争。为什么？因为我们被告知，这是为了更为重大的公共利益。是为了进步，是为了国家利益（而

国家利益当然是至高无上的）。于是，我们高高兴兴、不加质疑、几乎感激涕零地相信了人家告诉我们的一切。我们相信，为我们自己的好，最好是相信这一切。

允许我动摇你的信仰吧。把你的手放在我手里，让我领你穿过迷宫。你应该这么做，因为你一定得先把情况搞清楚。如果你找到足够理由来批驳我，尽管站到对立面去好啦。但请不要视而不见，不要把头扭过去。

这不是个很容易讲的故事，里面有很多数字和解释。数字过去只会让我变得目光呆滞。但不再如此了。自从我随这些数字所指的方向迈出脚步，便不再如此了。

相信我，这里面有故事。

印度进步了，这是事实。1947 年殖民主义正式终结时，印度短缺食物，这也是事实。1950 年，我国生产 5100 万吨粮食。今天，我国生产近 2 亿吨。

1995 年，粮食多得连国家粮仓都装不下，有 3000 万吨没卖出去，这是事实。与此同时，印度 40%的人口—超过 3.5 亿—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也是事实。这一数字比 1947 年印度全国的人口还多。

印度人穷得连自己国家生产的粮食都买不起。印度人被迫种植的一些粮食品种，他们自己都吃不起。看看在以饿死人著称、位于奥里萨邦（Orissa）西部的卡拉汉迪县（Kalahandi District）发生了什么吧。1996 年大旱，该县有人饿死（据政府称有 16 人，而媒体统计为 100 多人）。而就在这年，卡拉汉迪县的大米产量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大米从卡拉汉迪县运到了中部地区。

印度确实进步了，但它的大部分人民却没有。我们领导人说，印度必须拥有核弹，以保护我们免遭中国和巴基斯坦威胁。可谁来保护我们免遭自己人威胁呢?

这是个什么国家？谁拥有它？谁管理它？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透露几桩国家机密的时候了。对这个效率低下、尾大不掉、腐败堕落，却又万般和蔼、本质民主的印度政府，是戳穿神话的时候了。无心之过不能说明为什么 5000 万民众消失得无影无踪。因果报应也说不通。不要再自欺欺人了。一切都在有条有理进行之中，精准、残酷，百分之百由人手操控。

印度政府并不是一个失败的政府。就其既定目标而言，这是个成绩斐然的政府。它无情、高效地占用印度的公共资源——土地、水、森林、鱼、肉、蛋、空气——然后再分配给少数特权阶层（作为回报，无疑又从特权阶层获得某些特权）。在保护肯出钱的精英骨干方面，它简

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为把碍手碍脚的人碾为齑粉，它无所不用其极。但它最了不起的成就，还是在如何既能实现这一切，又能以良好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如何保守秘密，把事关十亿人生计的信息藏在政府档案里，只对一小撮大权在握者开放，如部长、官员、政府工程师、国防战略家之流。当然，他们之所以能轻而易举做到这一切，原因还在我们自己，我们这些政府受益人。我们着意避免刨根问底。我们压根儿不想知道那些令人作呕的细节。

多亏了我们，选举来来去去，但牌却从未洗过。相反，旧秩序被神圣化，原有的裂痕日见深阔。我们，国家的主人，不愿稍停片刻，从不堪重负的办公桌上抬起头来看一看。我们似乎不知道，供我们享用的资源是有限的，而且正在迅速耗尽。银行里是有钱，但很快就会没东西可买了。厨房里，食物眼看就要吃光，而仆人们还没用餐呢。实际上，仆人老早就不再吃饭了。

在那些自以为是的公众演说中，演讲者十有八九会告诉我们，印度的生命在乡村。这是胡说八道。这是政府塞得鼓鼓囊囊的衣橱中又一块遮羞布。印度的生命不在乡村。印度的死亡在乡村。印度在乡下遭到虐待。印度的生命在城市。印度的乡村之所以活着，纯粹是为了服务于印度的城市。印度的乡民是印度市民的家臣，为此必须处于控制之下，必须活着—只要勉强活着就行。

切勿以为我们有一个超负荷运转的政府，一个努力解决其面临的如山问题的政府。这样想是危险的。事实是，这个政府正在制造问题。它是一架其大无比的贫困制造机，最擅长挑动穷人去对抗更穷的人，扔点面包屑到那些可怜人脚下，让他们在争抢中消耗精力，主子的住所则安然处于宁静（和广告）之中。

如果人们不认清这一过程的真相，不群起而攻之，选举——无论竞争多么激烈——都仍将是一场接一场的模拟战，其作用只能是进一步深化无法言说的不平等。民主（印度版本的民主）仍将是一副慈眉善目的面具，瘟疫在其掩盖之下了无节制地泛滥，其规模之大，将使得过去的战争和以往的不幸显得像实验室中有序进行的试验。5000 万人已被送进贴着“发展”招牌的研磨机，从另一头出来就变成了空调机、爆米花、人造丝套装—享受政府补贴的空调机、爆米花、人造丝套装。如果我们非要这些好东西不可，至少让我们自掏腰包来买吧？

印度国旗破了个洞，该修补了。

说来伤心，但我还是得说：只要抱着信仰不放，我们就没有希望。要有希望，就得打碎信仰。我们要用特定的方式来打特定的战争，而且要打赢。

所以，听听讷尔默达河谷的故事吧。好好领会它。而且，如果你愿意，加入战斗行列吧。谁知道呢，也许奇迹会发生？

讷尔默达河在中央邦（Madhya Pradesh）沙赫多尔县（Shahdol）阿默尔根德洛（Amarkantak）高原上汹涌奔流，然后蜿蜒前行，穿过 1300 公里美丽的阔叶林，穿过也许是全印度最肥沃的耕地。河谷里居住了 2500 万人口，通过一种古老、错综复杂的依存关系（当然，毫无疑问，也包括剥削关系）与生态系统相连，与彼此相连。尽管讷尔默达河被定为“水资源开发”目标已有 50 多年，却一直逃脱了被抓住、被肢解的命运，直到前不久形势才急转直下。究其原因，是因为它穿越了三个邦：中央邦、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古吉拉特邦。（河流的 90%流经中央邦，只在马哈拉施特拉邦北部边界沾了一下边，然后，在古吉拉特邦境内行进 180 公里后，于巴鲁奇（Bharuch）汇入阿拉伯海。）

早在 1946 年，就已酝酿在古吉拉特邦的戈拉（Gora）河段建坝。1961 年，尼赫鲁为拟议高程 49.8 米的大坝奠基，这便是萨尔达尔萨罗瓦尔坝的迷你雏形。就在同一年，对全印度进行的勘探产生了该河谷的现代化新地形图。古吉拉特邦大坝的规划者们对新地图研究了一番，认为建一座宏大得多的坝，获利会丰厚许多。但这就意味着先得和毗邻两邦敲定一个协议。

三个邦争执不下，费尽唇舌也无法在水的分配额度上达成共识。最后，1969 年，中央政府成立了讷尔默达河水争端仲裁委员会。耗时十年后，委员会宣布了裁决。生计将因建坝而遭受毁灭性打击的民众既未得到任何通知，也没人咨询他们的意见，更无人听取他们的要求。

要对河水额度进行分配，委员会第一步要做的最起码的事情是弄清河里有多少水。通常，要准确评估水量，必须有过去至少 40 年的实际河水流量记录。可是这一记录并不存在。于是，委员会决定根据降雨量数据来推断，最后得出的数字是 2722 万英亩英尺。该数字是整个讷尔默达河谷工程的统计学基石。人们至今还在使用这个老旧的数字。它或多或少决定着工程的整体设计方案—坝的高度、位置、数量。顺理成章，它也决定着工程需要多大成本、多大地区要被淹没、多少人要迁移、能产生哪些效益。1992 年，经实际观测的讷尔默达河过去 44 年（1948 - 1992）的真实流量数据出炉，显示水量只有 2269 万英亩英尺，比原先估算的数字少了 18％！中央水利委员会承认，讷尔默达河的水量确实比原先设想的要少。印度政府却声称：需要指出，确定可用水流量为 2800 万英亩英尺之（仲裁委员会裁决）条款二，不得修订。（！）

换句话说，讷尔默达河需按人类法令的规定，产出印度政府命令它产出的水量。

讷尔默达河谷工程的支持者夸耀说，该项目是人类历史上最宏伟的河谷工程。他们计划修建 3200 座坝，把讷尔默达河及其 41 条支流重新构建成一系列梯级水库—一个硕大无比，水量可以调节的水梯。这 3200 座坝中，大型大坝有 30 座，中型 135 座，其余为小型。主坝中有两座为多功能巨型坝，一座是古吉拉特邦的萨尔达尔萨罗瓦尔坝，另一座是中央邦的讷尔默达萨格尔坝（Narmada Sagar）。两坝汇集的水量相加，超过印度次大陆上任何一座水库。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讷尔默达河谷开发工程都很大。它会改变整个讷尔默达河谷的生态环境，而讷尔默达是印度最大的河流之一。是好是坏，它都会影响河谷中居住的 2500 万人的生活。然而，还没等环境部批准该工程，世界银行就主动提出贷款给工程的关键项目——萨尔达尔萨罗瓦尔大坝（其水库将迫使中央邦和马哈拉施特拉邦的民众迁离，受益的却是古吉拉特邦）。成本还没算出来，一项研究都未开展，尚无任何人知道人类要为大坝付出何种代价、大坝会给环境带来多大影响，世界银行就把支票簿准备好了。

为萨尔达尔萨罗瓦尔大坝建设提供的 4.5 亿美元贷款获得批准，并于 1985 年到位。而环境部对该项目的批复 1987 年才下来！够狂热吧？简直快赶上巡回福音传教了。谁能如此劳神费心？

他们为何如此热切？

1947 年到 1994 年，世界银行共收到来自全球的 6000 份贷款申请。一份都没有驳回。一份都没有。“资金流动”和“达到贷款目标”之类术语是什么意思，现在该明白了吧？

今天，印度所处的境地是，连本带息付给世界银行的钱，超过从世界银行拿到的钱。我们被迫借新债还老债。根据世界银行的年度报告，1998 年一年，加减乘除之后，印度还给世界银行的钱比接受的金额多 4.78 亿美元。过去五年（1993－1998 年）里，印度还给世界银行的钱比接受的金额多 14.75 亿美元。我们与美国的关系就像一个没有任何土地而且负债累累的民工与地方商人的关系——一种温情脉脉的关系：穷人喜欢商人，因为穷人有需要时，总能找到商人。难怪我们把世界称为地球村。无地民工和印度政府的唯一区别在于，一个需要钱活命，另一个则把钱装进政府官员和代理商的私人保险柜，把国家置于永难翻身的经济重压下。

国际水坝工业每年的产值为 200 亿美元。如果追随大坝在全世界的落脚点，无论去到哪儿——中国、日本、马来西亚、泰国、巴西、危地马拉——你都会听到同样的故事，遇到同一批演员：“铁三角”（这是水坝业的行话，形容政客、政府官员和建坝公司的依存联系），自称“国际环境顾问”的骗子们（通常直接受雇于建坝公司，要不就是建坝公司的下属机构），多半还会有友好热情、近在家门的世界银行。慢慢你便对千篇一律的虚夸、老一套的高调“人民大坝”口号耳熟能详，而老百姓一旦稍露不满端倪，迅速而残暴的镇压便会接踵而来。（近来，尤其是经历了讷尔默达河谷风波后，当决定在哪些国家资助涉及大规模迁移的项目时，世界银行比以前谨慎些了。目前中国是该银行最为受宠的客户。）

这是个技艺高超的马戏团，杂耍演员都是熟人熟脸。偶尔，他们会互换角色——政府官员加入世界银行，而世行高级职员则摇身一变为项目顾问。演出结束后，所谓“开发援助”中极高比例的资金会打着设备成本、咨询费或世行机构员工工资的幌子回流到出资国。很多情况下，

“援助”堂而皇之地被“绑定”（比如日本向萨尔达尔萨罗瓦尔大坝提供的贷款，就与一份购买住友商事株式会社涡轮机的合同绑定）。有时，这种联系更加龌龊。1993 年，尽管英国海外发展管理局一份报告称，柏高大坝（Pergau Dam）对马来西亚而言是个亏本买卖，英国还是向马来西亚提供了 2.34 亿英镑贴息贷款，供修建大坝之用。后来人们才知道，英国提供该笔贷款，是为了“鼓励”马来西亚签署一份价值 130 亿英镑的英国军火购买合同。

1994 年，英国顾问在海外合同上赚了 25 亿美元。海外合同的大头是项目管理，其次是编撰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在“开发”行当，相关游戏规则十分简单。如果你应某国政府之邀为一个大坝工程写一份环境影响评估报告，而你指出了一个问题（比如，你对一条河流的可用水量略有微辞，或者，你胆大包天，居然暗示民众要付的代价可能太大了点），那你就玩完了。你就成了个下岗顾问。这下好啦——路虎越野车，没了。托斯卡纳（Tuscany）度假，没了。儿女的私立寄宿学校，没了。贫中自有黄金屋。外带各种津贴。

按照大坝建设中的一贯做法，在建造坝高 138.68 米的萨尔达尔萨罗瓦尔大坝过程中，一场精心编导的政府童话剧上演了，剧情是进行调研以估算工程实际成本，并评估大坝对人和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世界银行激情参演，时不时蹙起眉头要求（态度却远非强硬）就某些事项了解更多信息，比如所谓 PAP 们（PAP 为 Project Affected Persons 的首字母缩略语，意即“受工程影响人士”）的安置啦，安顿啦，等等。（这些缩略语可有用了，血肉之躯不知怎么就变成了冷冰冰的统计数据。PAP 们很快就不再是活人了。）

只鳞片爪，随便什么信息就能让世界银行满意，工程于是顺顺当当进行下去。各有关机构之间未曾明言，亦未诉诸白纸黑字，但人人心照不宣的是：无论经济方面、环境方面、人类方面的代价有多大，工程都会照建不误。工程建设进行中，他们自会找理由为工程正名。他们很清楚，到头来，无论上法庭还是面对某个委员会的质询，任何论据的说服力，都比不上既成事实。（尊敬的阁下，工程每延期一天，印度就会损失 2000 万卢比。）政府声称萨尔达尔萨罗瓦尔大坝是“印度经过最详尽研究的工程”，可是游戏大致是这么玩的：

当讷尔默达河水仲裁委员会首次宣布裁决，紧接着古吉拉特邦政府公布使用其额度下的水资源的计划时，完全没有提到古吉拉特邦干旱地区卡奇（Kutch）和绍拉斯徹（Saurashtra）两地村民的饮用水问题。后来工程陷入政治困境，政府却突然发现了干渴的强大情感力量。刹那间，为卡奇和绍拉斯徹村民干涩的喉咙解渴成了萨尔达尔萨罗瓦尔工程的全部意义所在。其实，与讷尔默达河相比，萨巴尔马蒂河（Sabarmati）和马希河（Mahi）离这两个村庄要近好多公里，但这两条河上筑起了坝，河水被导向艾哈迈达巴德县（Ahmedabad）、马赫萨那县（Mehsana）、凯达县（Kheda），卡奇和绍拉斯徹却滴水未见。萨尔达尔萨罗瓦尔运河将为多少人提供饮用水，其官方数目起伏不定，开始是 2800 万（1983 年），后来调到 3250 万（1989 年——聪明，那 50 万的零头！），再调到 4000 万（1992 年），最后回落到 2500 万（1993 年）。

1979 年，获得饮用水的村庄数量为零，1980 年代早期是 4719 个，1990 年是 7234 个，1991 年是 8215 个。当受到质疑时，政府承认 1991 年的数据里包括了 236 个无人居住的村庄！

这项工程的每个方面都受到这种近于满不在乎的对待，好像家里人打牌下棋般漫不经心。哪怕实际上牵涉到的是千千万万人的生活和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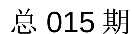
1979 年，因萨尔达尔萨罗瓦尔水库建设而拟搬迁的家庭数量估计为 6000 户多一点。到 1987 年，这一数字上升到 12000 户。1991 年飙升为 27000 户。1992 年，政府宣布 40000 户家庭会受到影响。今天，这个数字徘徊在 40000 到 41500 之间（当然，即便这个数字也够荒唐，因为水库不是唯一导致民众迁移的原因。根据拯救讷尔默达运动组织的统计，实际数字应为 85000 户，即大约 50 万人）。

官方公布的工程预估成本也从 600 亿卢比跳升至 2000 亿卢比。而拯救讷尔默达运动组织说，耗资将为 4000 亿卢比（过去 50 年全印度灌溉预算的一半）。

政府宣称萨尔达尔萨罗瓦尔工程能发电 1450 兆瓦。问题是，萨尔达尔萨罗瓦尔这样的多功能水坝（灌溉、发电、防洪），其各个功能是互相冲突的。灌溉会用掉发电所需的水。防洪要求在雨季时空出库容，以应对可能突然加大的水量。如果水量没有突然加大，坝就会一直空着。空坝又怎能用于灌溉呢？要灌溉，就应该储存雨季的水。这就像那个把狐狸、小鸡和一袋谷子渡到河对岸的难题一样。研究表明，这些彼此冲突的功能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当萨尔达尔萨罗瓦尔大坝建成、各项功能都发挥作用后，能产生的电力只有规划者所称的 3%—50 兆瓦。

在一场旷日持久的争斗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打算。众说纷纭中，你怎样才能辨别是非呢？你又怎样决定谁给出的估算更为可靠呢？一个可行的方法，就是看看印度那些大坝过往的表现。

贾巴尔普尔(Jabalpur)附近的巴吉（Bargi）坝是讷尔默达河上最早完工的坝（1990 年）。它的花费是预算的十倍，淹没的土地为工程师估计数字的三倍。原先估计要迁移 101 个村庄约 70000 人，到水库充水时（事前未警告任何人），162 个村庄被淹没。连政府建造的安置点也有被淹的。在世代居住了几百年的土地上，人们像老鼠般被驱赶出来。他们尽其所能抢出一点点家产，然后眼睁睁看着房子被冲走。114000 人迁离家园。没有任何安顿政策。有些人得到少得可怜的现金补偿。很多人一分钱也拿不到。少数人搬到了政府安顿点。政府公关材料说，位于戈勒克布尔(Gorakhpur)的安顿点是个“理想的村庄”。1990 至 1992 年间，那里饿死了五个人。没饿死的，有些回到老家非法居住在水库边的森林里，剩下的搬进了贾巴尔普尔的贫民



窟。巴吉坝灌溉的土地，面积跟当初淹没的土地一样大，仅仅是设计者当初所称灌溉面积的5％。就连这 5%，如今也水涝了。

同样的故事在反复上演。安得拉邦（Andhra Pradesh)灌溉工程二期宣称将迁移 63000 人。完工时，实际迁移了 150000。古吉拉特邦中级灌溉工程二期导致 140000 人迁移，而非 63600。卡纳塔克邦(Karnataka)克利须那河(Krishna)上游灌溉工程经修订的迁移人数为 240000，而当局最初宣称只会迁移 20000 人。

以上都是世界银行的数据，而不是拯救讷尔默达运动组织的。想象一下这对我们保守估计的 3300 万总移民人数有什么影响。

萨尔达尔萨罗瓦尔坝的建设从 1961 年起就时断时续地进行了，1988 年，工程全面上马。当时，不论是政府还是世界银行，没有任何人注意到，有位叫梅得哈.帕特克尔（Medha Patkar）的妇女奔走在预定要淹没的各个村子，四处询问人们是否知道政府打算如何处置大家。当年她去河谷时，压根儿没想到要反对建造大坝。她主要关心的是，被迁移的村民是否得到合理合情的安置。渐渐地她明白了，政府对这些人根本就没安什么好心。到 1986 年，消息传开，每个邦都成立了一个群众组织，质疑政府官员散播的有关安置和安顿的承诺。又过了几年，人们才真正认识到，拟议建造的系列水坝会为坝区移民和本以为会受益的民众带来什么样的可怕后果。讷尔默达河谷开发计划成为“印度最严重的规划性环境灾难”。来自各邦的群众组织汇集成一个整体，不同凡响的拯救讷尔默达运动组织诞生了。

1988 年，拯救讷尔默达运动组织正式要求讷尔默达河谷开发项目的所有工程全面停工。人们声言，如果非淹死不可，那他们宁愿被淹死，也不愿搬离自己的家园。两年之内，斗争迅速发展，并得到了其他抵抗运动的支持。1989 年 9 月，约 50000 人从印度各地汇集到河谷区的赫尔苏德（Harsud），誓与毁灭性开发斗争到底。选定坝址及毗邻地区当时已处于《印度官方机密法案》管辖之下，并根据该法案第 144 款严禁五人以上集会的规定，被封锁起来。整个地区成了一座警营。一年后，1990 年 9 月 28 日，成千上万的村民或徒步或坐船，不顾重重路障，来到中央邦一个叫班得瓦尼（Badwani）的小镇，重申大家宁死不搬的誓言。反对这项工程的消息传到了其他国家。“地球之友”日本分会在日本发起运动，成功地使日本政府撤出资助萨尔达尔萨罗瓦尔工程的 270 亿日元贷款（涡轮机的合同则依然有效）。日资一撤，支持讷尔默达河谷斗争的各个环保组织向世界银行施加的国际压力陡然增大。

这自然导致河谷地区镇压的升级。政府的政策，据一位能言善辩的部长说，是“要用穿卡其色军服的士兵填满河谷。”

1990 年圣诞日，约 6000 男女民众携带干粮和寝具，伴随一个誓为保卫河流而献身的七人敢死队，步行了 100 公里。在古吉拉特邦边境的费尔库瓦（Ferkuwa），他们被几营武装警察

和来自巴罗达（Baroda）城的居民拦下，这些居民中很多是受雇而来，也有一些大概真心相信萨尔达尔萨罗瓦尔是“古吉拉特邦的生命线”。这是一场很微妙的对抗。中产阶级城市印度人与主要为部落民的乡村大军较量。游行民众要求允许他们跨过封锁线，步行到坝址。警察拒不放行。为了强调非暴力原则，村民们把自己的双手绑了起来。一个接一个，他们迎着整营整营的警察而上。他们被殴打、逮捕、拖进等候在一旁的卡车，开出数公里后扔到荒郊野外。他们一步步走回来，同样的一幕再从头来过。

对抗持续了几乎两周。最后，1991 年 1 月 7 日，敢死队的七名成员宣布开始无限期绝食。紧张局势一触即发。印度本国和国外的媒体、电视摄制组、纪录片制作人蜂拥而来。报纸上几乎每天都有相关报道。环保活跃分子在华盛顿加大了压力。最终，被媒体负面报道弄得灰头土脸的世界银行宣布，将对萨尔达尔萨罗瓦尔工程展开独立评估——这在世界银行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消息传到讷尔默达河谷，人们的反应是既不信任又不确定。民众没有理由相信世界银行。但无论如何，这总算是一种胜利。村民们对 22 天未进食、身体状况急剧恶化的战友们早已十分痛惜，恳求他们停止绝食。1 月 28 日，费尔库瓦绝食终止，勇敢而衣衫褴褛的民众大军高喊着“我的村庄我做主！”回到了家乡。

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不会有这样一支军队。在别的国家，一有反抗的迹象，立刻被打压下去。而在我们印度，抗议活动生生不息。当然，政府也想由此博得几声赞赏。它希望我们感谢它没有彻底镇压抗议运动，感谢它允许抗议运动存在。毕竟，如果说这一切不是一个健康、运转良好的民主政体的标志，那又是什么呢?在这种政体下，当国民意见分歧时，政府不就得出面干预一下吗？

我承认这可以是看问题的一个角度。（这是否在提醒我该夹起尾巴，道声“多谢多谢，多谢政府开恩允许我写出我写的东西”？）

我们不需要因政府允许我们抗议而感恩戴德。我们要感谢的是自己。是我们自己坚持拥有这些权利。是我们自己拒绝放弃这些权利。作为一个民族，如果有什么真正值得我们骄傲的，那就是这一点。

尽管有那个政府，讷尔默达河谷的斗争还是生存下去了。

印度政府在迂回作战。除了表面的仁慈，政府另一件有力武器是等待。闪避对手的出拳。拖垮对手。政府永远不会疲倦，永远不会衰老，永远不需要休息。政府在跑一场没有终点的接力赛。

但是，战斗的人民会疲惫，会生老病死。连年轻人都在未老先衰。自仲裁委员会批准水坝建设以来 20 年，这条河谷里的褴褛大军一直生活在被逐出的恐惧中。20 年来，这里大部分地区丝毫没有“发展”的迹象——没有公路，没有学校，没有水井，没有医疗设施。20 年来，这一地区背负“预定淹没”的耻辱，被周围社会所孤立（没有人提亲，没有土地成交）。他们有点像日本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幸存者及其后裔。“现代发展成果”终于到来时，带来的只有恐惧。公路带来勘探员，勘探员带来卡车，卡车带来警察，警察带来子弹、殴打、强奸、拘捕，还曾经带来过一次谋杀。民众获得现代发展的唯一真正“成果”—提高嗓门的权利，让别人听到自己声音的权利，都是无心插柳的结果。但现在，他们已经战斗了 20 年。他们还能坚持多久？

讷尔默达河谷的斗争会使人生厌。它不再像过去那样时髦。国际新闻摄制组和激进的记者们（如同世界银行一样）转战更有噱头的地方。纪录片演过了，该看的人都看了。每个人的同情都消耗殆尽。但大坝还在建造。一天比一天高……

现在，褴褛大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增援。如果我们任其死亡，如果我们让这场斗争溃败，如果我们允许当地民众被惩处，我们便会失去自己最宝贵的东西：精神，或已经所剩无几的精神。

他们，不愿为琐碎时事操心的睿智哲学家们，会告诉你：“印度会照样生存”。好像“印度”比印度人民更有价值。

当年的纳粹们大概用类似的话安慰过自己。

保卫讷尔默达河谷之战不是什么异国风情的部落战争，也不是边陲的乡村战争，甚至不是纯粹印度的战争。这是为我们这个世界的河流、山峦、森林而进行的战争。各类勇士，无论来自世界何处，只要愿意加入我们的队伍，都会受到礼遇，受到欢迎。各种各样的斗士都需要。医生、律师、教师、法官、记者、学生、运动员、画家、演员、歌手、恋人……边境是开放的，各位！进来吧。

好了，言归正传。

1991 年 6 月，世界银行任命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前行政官布拉德.摩尔斯（Bradford Morse）为独立评估委员会主席。摩尔斯得到的指示，是对萨尔达尔萨罗瓦尔项目进行彻底评估。他有权随时调阅世界银行与该项目相关的所有秘密文件。

1991 年 9 月，布拉德.摩尔斯及其小组抵达印度。拯救讷尔默达运动组织认定这又是一个骗局，一开始拒绝与小组的人会面。古吉拉特邦政府则把他们当成暗中的盟友，给予其红地毯迎接（还送上会心一笑）。

一年后的 1992 年 6 月，具有历史意义的《独立评估》（亦以《摩尔斯报告》知名于世）发表。

该报告像剥洋葱一样，一层层仔细剥去了讷尔默达河谷项目的外皮。事无巨细，都在调查之列。评估委员会成员会见部长们和政府官员们，会见在该地区活动的非政府组织，从一个村庄走到另一个，从一个安置点走到另一个。他们拜访好的安置点，差的安置点，临时安置点，永久安置点。他们跟数百人交谈。他们在淹没区和受益区留下数不清的足迹。他们去了库奇和古吉拉特邦其它干旱地区。他们委托完成了多项独立研究。他们考察了项目的每一个方面：水文学和水管理、上游环境、沉积作用、集水区治理、下游环境、对受益区可能发生的问题（水涝、盐化、排水、健康、对野生动植物的影响等等）的估计。

《摩尔斯报告》以温和而有节制的语气（我赞赏这一点，但自己做不到）披露了令人震惊的内容。对于印度政府与世界银行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份极其公平、不偏不倚，然而又具有毁灭性的起诉书。报告一箭穿心（虽然表面上没这么做，甚至不打算这么做），直捣印度政府与世界银行同居、相恋的温柔乡（那应该是在两方所言与所行之间某个所在）。

这份 357 页的独立评估所给出的核心建议毫不含糊，而且完全出乎人们意料：

“我们认为，就现有方案而言，萨尔达尔萨罗瓦尔项目是有缺陷的，对受项目影响而将搬迁的所有民众的安置和安顿，在印度当前环境下是不可能实现的，项目对环境的影响也没有得到适当考虑和充分研究。此外，我们相信，对于事情发展到现在的局面，世界银行应与借款人分担责任，……显然，技术上和经济上的急迫需要，使得项目规划排除了对人文与环境的考虑，……印度政府和相关各邦……已经花费了大量资金。没人愿意看到这些钱白白浪费，但我们还是要发出警告：不充分了解人文和环境方面的代价就把项目进行下去，可能会造成更大浪费。我们确信，项目缺陷既然如我们所见那般明显，如果我们还拼凑出一堆为实施项目而需考虑的建议，那将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因此，我们认为，对世界银行而言最明智的做法是退后一步，与该项目拉开距离，然后再重新对其加以考量。应当承认，世界银行的增长策略是失败的。”

四个尽心尽责、学养深厚、真正独立的人——在“信仰”二字已被别的好几百个受雇从事类似工作的贪赃枉法者腐蚀殆尽的今天，这四位为恢复信仰而做的工作，可歌可叹。

然而，世界银行并未打算罢手。它继续为项目提供资金。《独立评估》发表后两个月，世行派出帕米拉.科克斯（Pamela Cox）委员会，其作为正是《摩尔斯报告》告诫世行应提防的作为。该委员会提出一套修修补补的措施，以图挽救项目。1992 年 10 月，在委员会建议下，世界银行要求印度政府在六个月的限期内满足一些最低限度的起码条件。就连这么一点点政府都做不到。终于，1993 年 3 月 30 日，世界银行宣布撤出萨尔达尔萨罗瓦尔项目。（实际上，

从技术上说，1993 年 3 月 29 日，也就是世行为印度政府规定的最后期限到期前一天，印度政府正式要求世行撤出该计划。）细节。细节决定成败。

此前没人能让世界银行退出某个项目。更不用说由世界最贫穷国家之一中最贫穷民众组成的一支杂牌军。世界银行时任总裁刘易斯.普雷斯顿（Lews Preston）访印期间未能设法纳入其繁忙日程的一群人。对讷尔默达河谷民众而言，炒世界银行鱿鱼，于当时乃至现在都是辉煌的精神胜利。

然而，喜悦心情没持续多久。古吉拉特邦政府宣布，它将自行筹集二亿美元的短缺资金，把项目搞下去。在独立评估进行期间，以及评估报告发表之后，河谷中民众与当局之间的对峙没有停歇过——羞辱、逮捕、警棍，都用上了。不定期绝食时有发生，又因一时的承诺而终止，或因永久的背叛而终止。已经同意离开河谷、接受安置的人们，开始从安置点返回老家。在马尼贝利（Manibeli，马哈拉施特拉邦的一个村庄，也是抵抗运动的神经中枢之一），数百位村民参加了“雨季非暴力抵抗及不合作”活动。1993 年，马尼贝利一些家庭在水位不断上涨时呆在家里不走，他们怀抱儿女，抓住木桩，拒绝离开。最后，警察掰开他们的手，强行把他们拖走。拯救讷尔默达运动组织宣称，如果政府不同意重审萨尔达尔萨罗瓦尔项目，1993 年 8 月 6 日，一批活跃分子将在水库涨水时把自己淹死。8 月 5 日，联邦政府组成另一个名为“五人组”的委员会来重新评估萨尔达尔萨罗瓦尔项目。

古吉拉特邦政府拒绝该小组进入古吉拉特邦。次年，五人组报告（一份闭门造车的产品）出炉。虽未明言，但该报告实际上赞同《独立评估》所提问题的严重性。但于事无补。什么都没改变。这只不过是政府又一个屡试不爽的策略：用委员会杀死你。

1994 年 2 月，古吉拉特邦政府下令永久关闭大坝闸门。

1994 年 5 月，拯救讷尔默达运动组织向最高法院提交了请愿书，质疑萨尔达尔萨罗瓦尔大坝工程的整个依据，并要求在建工程停工。

那年雨季，萨尔达尔萨罗瓦尔水库水位上涨，漫过大坝另一边，消力池中 65000 立方米混凝土和 35000 立方米岩石被卷起冲走，留下一个直径 65 米的大坑。河床发电厂被淹没。此损失被保密了几个月，直到 1995 年 1 月才见诸报端。

1995 年初，鉴于对移民的安顿一直不到位，最高法院勒令大坝工程暂停，等候通知。当时大坝高程为海拔 80 米。

与此同时，中央邦另有两座大坝开工：讷尔默达萨格尔（若无此坝，萨尔达尔萨罗瓦尔坝的功效将减少 17% - 30%）和默黑什沃尔坝（Maheshwar Dam）。默黑什沃尔坝毗邻萨尔达

尔萨罗瓦尔坝，在后者上游。中央邦政府与一家私有公司 S. Kumars（印度的纺织业大王之一）签订了一份电力购买协议。

萨尔达尔萨罗瓦尔地区的紧张气氛暂时有所缓和，战斗移向上游尼曼德（Nimad）富饶平原上的默黑什沃尔。

案子等待最高法院最后裁决期间，能觉察出讷尔默达河谷中的镇压放松了一些。大坝建造工程停了下来，但安顿工作还在装模作样进行。划定将淹没的森林继续遭砍伐，木材一卡车一卡车被拉走，靠森林为生的老百姓被迫搬离。

尽管大坝远未达到最终的设计高程，却已对环境和沿岸居民造成严重影响。

在大坝周围和附近的村庄，疟疾病例增加了六倍。

萨尔达尔萨罗瓦尔坝上游几公里处，深及臀部、宽达 200 多米的一片片沉积淤泥，阻断了到河边的道路。妇女们取水要绕行好几公里，实实在在好几公里，才能找到下河处。奶牛和山羊陷在淤泥中死去。部落民用来渡河的小独木舟，由于下游屏障使得水流出现不规则的回旋，而无法安全使用。

再往上游走，淤泥沉积尚未造成太大问题，但另一个问题却出现了。传统上，无地的人们（主要是部落民和达利特人）在旱季河水退去时留下的肥沃浅滩上种植稻谷、水果和蔬菜。时不时地，管理巴吉大坝（在上游很远处，贾巴尔普尔附近）的工程师们不加警告就从水库放水，下游水位于是突然上涨。数百个家庭的庄稼数次被冲走，人们断了生计。

突然间，人们再也不能信任他们自己的河流了。这就像一位家人患上了精神病。但凡爱过河流的人都能告诉你，失去一条河有多么可怕，多么让人心疼。不过，要是一直照这个思路说下去，我会挨板子的。讨论更为重大的公共利益时可不能感情用事。我们得就事论事。原谅我分心了。

中央邦和马哈拉施特拉邦两个邦政府，对迁离家园的民众仍是不闻不问。古吉拉特邦政府出台了安顿政策（虽然仅仅是纸上谈兵），相形之下，另两个邦就显得像中世纪般黑暗了。古吉拉特邦的安顿政策自诩为全球最佳。根据该政策，从马哈拉施特拉邦和中央邦迁来的民众可以以地易地，而且“占地者”（通常是没有土地所有证的部落民）的权利得到承认。然而，该政策骗人的地方，在于对“受工程影响人士”的界定。

事实上，古吉拉特邦政府连预定淹没的本邦 19 个村的村民的安顿问题都未能搞定，更别提另两个邦的 226 个村庄了。这 19 个村的居民被分散到 175 个安顿点，村民之间的社会联系被割断，社区被瓦解。

实际上，关于安置的故事（除了少数几个“模范村”外）充满冷漠无情、空口许诺。一些人得到土地，另一些人没有。一些人得到的土地全是石块，无法耕种；一些人得到的土地严重水涝，无可补救；一些人被土地原先的主人赶走，因为地卖给了政府，却还没从政府方面拿到钱。

一些被安置在别的村庄周围的移民遭到心怀敌意的当地村民抢劫、殴打、驱赶。有时，邻接的土地被分配给来自两个不同坝区的移民。有一回，来自乌凯坝（Ukai Dam）、萨尔达尔萨罗瓦尔坝、卡贾恩坝（Karjan Dam）三个坝区的移民被安置在同一地区。除了相互之间为水、牧场、工作等资源而争斗外，他们还得对付当地的无地民工，这些民工原本为拥有土地的在外地主耕种，土地后来却被卖给了政府。

还有另一类移民——土地被政府征用来做安置点的老百姓。这些不幸的人竟然也有高低贵贱之分——从萨尔达尔萨罗瓦尔驱赶出来的人，比从其他地区驱赶出来的更有范儿，因为前者不时出现在新闻报道中，并且在法院立了案子。（在没有媒体报道、没有拯救讷尔默达运动组织参与、没有法庭诉讼的其它开发项目中，不存在任何安置记录。被迁离者仿佛人间蒸发了。）

在若干个安置点，人们被弃置到一排排瓦楞铁皮搭起的棚子里，夏天热得像火炉，冬天冰箱般寒冷。有些棚子搭在干涸的河床上，雨季一到就变成顺水而下的漂浮物。我到过一些这样的“安置点”。我看过在另一些安置点拍摄的影片：河水打着漩涌入铁皮屋中，孩子们颤抖着，像小鸟一样蹲在床沿上，睁大惊恐的眼睛看着坛坛罐罐被水流冲出门洞，漂向洪水淹没的田地，看着他们瘦弱的父亲游水追赶，竭力捞回能抓到的任何东西。

洪水退去，留下一片废墟，留下疟疾、腹泻、陷在泥沼中的病牛，留下从以前住房拆下来的古老柚木房梁，曾经仔细叠放在一起，像是迟迟未能实现的梦，此刻已经发泡、腐朽，无法再派上用场了。

有 40 户人家从马尼贝利搬到马哈拉施特拉邦的一个安置点。头一年，就有 38 个孩子死去。

今天报纸（1999 年 4 月 26 日《印度快报》）上有一则报道：古吉拉特邦一个安置点有九人死亡，在短短一周之内。那是每天有 1.2875 个“受工程影响人士”死亡，如果你想知道平均数的话。

被安置的人里面，有许多原先一辈子住在深山老林，与金钱和现代世界几乎不打任何交道。突然间，他们发现只剩两件事可做：要么饿死，要么步行几公里到最近的城镇，坐在集市上（不分男女），像待售商品一样把自己当劳工出卖。

过去，他们有森林，需要的每样东西在里面都能找到：食物、燃料、饲料、绳索、树胶、烟草、牙粉、草药、盖房子的材料；现在，他们要靠一天能挣到的 10 到 20 卢比养家糊口。过去，他们有河流；现在，有手压水泵。在昔日的村庄，他们没有钱，但是吃穿有保障。要是老天不下雨，可以去森林，河里可以捕鱼。牲畜是他们的定期储蓄。没有了这一切，他们离穷困潦倒便只有一步之遥。

我走访过巴罗达（Baroda）附近的一个安置点瓦达吉（Vadaj）。和我说话的男人摇着怀里生病的婴儿，孩子睡着了，眼皮上爬满苍蝇。家里其余的孩子们簇拥在我们周围，小心翼翼不让裸露的皮肤碰到棚子灼热的铁皮墙，这棚子就是他们叫作“家”的地方。男人忘了宝宝的病痛，心思飞得远远的。他向我列数以前在森林里能采到哪些水果。他数了 48 种。他告诉我，他觉得自己和孩子们今后再也吃不起水果了，不管哪种。除非靠偷。我问他宝宝得了什么病，他说宝宝简直是生不如死。我问宝宝的妈妈是怎么想的。她没有回答，只是呆呆地瞪大双眼。

对被安置者来说，每件事都必须从头再学起。事无巨细：拉屎撒尿（藏身的树丛没有了，该到哪儿去方便？）、买公交车票、学习新的语言、弄懂钱是怎么回事，都得从头学。最糟糕的是，得学会求人。学会听从命令。学会被主子管着。学会没人问你就别搭话。

除了这一切，他们还得学会编写书面陈述（一式三份），这样，一旦碰到什么问题，好去找冤屈调解委员会或萨尔达尔萨罗瓦尔讷尔默达公司（Sardar Sarovar Narmada Nigam）。前不久，有 3000 人为抗议他们的处境到德里上访，他们坐了一夜火车，住在酷热的大街上。总统不接见他们，因为他有只眼睛正在发炎。社会正义和权力联盟国务部长马尼卡.甘地（Maneka Gandhi）也不接见他们，但她让他们提交一份书面陈述（“亲爱的马尼卡，请不要造这座大坝，爱您的，百姓”）。陈述交到她手中时，她责怪这小小的代表团为什么没用英文撰写。

从自给自足、自由自在一下子变得一贫如洗，还被一个你一无所知的世界束缚—想想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你肯拿果阿（Goa）的一处海滨房换伯哈尔根杰（Paharganj）的一间茅舍吗？不肯？为了国家利益也不肯？

说实在的，要对如此不堪折腾的人群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安置，别说某个邦政府办不到，任何一个邦政府都办不到。这就像用修树枝的剪刀剪婴儿指甲。非剪掉一截指头不可。以地易地听起来像是合理的交换，但如何实施？如何将 200000 人（据官方主观的片面估计）—其中有 117000 人是部落民—连根拔起，再以人道方式安置到另一个地方?在一个人们为每一寸土地打架、法庭中几乎所有待审案子都与土地争端有关的国家，如何保持移民社区的完整？

等着接受完整移民社区的、美妙的、未被占用而且可耕的土地在哪里？

答案很简单：根本没有。哪怕只对这一座大坝造成的“官方”移民，也没有。

剩下 3299 座大坝又怎样？其余成千上万坐以待毙的“受工程影响人士”又怎样？要不，在他们家门上画上犹太六角星，把他们全干掉完事？

位于中央邦尼曼德平原上的雅鲁（Jalud）是默黑什沃尔大坝水库将要淹没的 60 个村庄中的头一个。雅鲁不是一个部落村，因此像每个普通印度村落一样，深受不光彩的种姓分隔制度所害，村民四分五裂。拥有土地的农户（具有“受工程影响人士”资格）中，大多数是拉杰普特人（Rajputs）[9]。他们耕种着印度最肥沃的土地，家里堆满一袋袋小麦、鹰嘴豆、大米。说起土地上长的东西，他们能夸个没完没了，要是整件事没那么悲惨的话，一定会听得你心烦。在大坝工地爆破的冲击波下，他们的房屋已开始出现裂缝。

在大坝工地附近有 12 个家庭，多为达利特人，本来就不大的土地也被征用了。他们告诉我，他们不肯搬，结果水管被灌进水泥，尚未收割的庄稼被推土机碾平，土地被警察强行占领。12 个家庭现在寸土皆无，全部靠打工为生。

雅鲁的老百姓要搬去的地方在内陆几公里处，不靠河流，毗邻一个居民大部分为达利特人和部落民的村庄，名叫萨姆拉吉（Samraj）。我看过为雅鲁的老百姓划出的这一大片土地。这是个满是石块的小丘，硬邦邦的，长着短粗的野草和灌木，上面覆盖了薄薄一层淤泥，那是用卡车运来的，倒在地上再均匀铺开，让小丘看起来像适合种植棉花的肥沃黑土。事情原来是这样：在 S. Kumars 公司（纺织巨头变身国家建设者）提议下，地方当局征到了这个小丘，它实际上是村民的公共牧场，属于萨姆拉吉的老百姓。除这个小丘外，当局还征用了十个达利特村庄的土地。没有任何补偿。

萨姆拉吉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过去是牲畜，现在没了放牧地，不得不卖掉山羊和水牛。唯一还能创造点收入的地方，就是（曾经是）村边一个小湖的湖岸了。夏季水位降低时，湖岸上会留下浅浅一圈肥沃的淤泥，村民们可以种植（曾经种植）水稻、甜瓜、黄瓜等。

S. Kumars 公司把这些淤泥挖走，拿去装饰石头满坡、雅鲁老百姓并不想要的牧场。湖岸变得陡峭，无法再耕种了。

已经赤贫的萨姆拉吉人被撂在一边等死，小丘却打扮停当，准备让德国的投资商、印度的法院和乐意到那边转一转的随便什么人拍照。

这就是印度的运作方式。这就是默黑什沃尔大坝的诞生纪。这不过是第一个村庄的故事。其余 59 个村庄又会怎样？让厄运紧追这座大坝不放吧。让推土机转而驶向纺织巨头吧。

[9] 译注：印度北方一些专操军职的人，自称是古印度武士种姓刹帝利。

没有任何理由能为上述行为开脱。

在这种情况下，哪怕设想就安顿问题进行辩论，也将是朝着置“正义原则”于不顾迈出的第一步。为了向 4000 万人输送（或假称输送）饮用水而重新安置 20 万民众—这一行动的规模大有问题。这是法西斯数学。它掐死隐藏的故事，用大棒把细节打得模糊一片，想方设法用虚妄的灿烂远景蒙蔽通情达理的民众。

1999 年 3 月底，我抵达讷尔默达河堤岸，那正是最高法院突然撤销建造萨尔达尔萨罗瓦尔大坝的禁令之后一个月。先前，我已经阅读了几乎所有能找到的资料（所有那些“机密”政府文件）。我熟悉当地地形，对何时何地何人发生了何事了然于心。故事在我眼前一幕幕展现，就像一部令人悲伤的电影，里面的演员们我都见到过。倘若不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只会坠入五里雾中。因为在讷尔默达河谷，故事套着故事，稍不留神你就会陷在他人的伤心故事中，不知道满腔怒火该向谁发。

我的旅程在凯瓦迪亚聚居区（Kevadia Colony）结束，那里正是故事的发源地。38 年前，古吉拉特邦政府决定在那里修建启动大坝工程所需的基础设施：招待所、办公区、工程技术人员宿舍、通向大坝工地的道路、建材仓库，等等。

凯瓦迪亚聚居区位于如今的萨尔达尔萨罗瓦尔水库和奇迹运河（Wonder Canal）的接合处。奇迹运河号称古吉拉特邦的“生命线”，肩负着滋润数百万民众干渴喉咙的使命。

没人知道这事，但凯瓦迪亚聚居区正是打开这个特殊世界的钥匙。去那里看看吧，秘密会在你眼前揭开。

1961 年冬天，一位政府官员来到一个叫蔻社（Kothie）的村子，他告诉村民们，要征用一些农田来修建直升飞机停机坪。几天后，一辆推土机开来，铲平了尚未收割的庄稼。官员让村民们在几份文件上签字，然后给了他们一些钱，大家以为是赔偿庄稼损失的。停机坪落成，一架直升机降落在上面，走出舱门的不是别人，正是总理尼赫鲁。他被警察团团护卫起来，大多数村民不得一睹尊容。尼赫鲁发表一番演讲后，摁下一个按钮，河对岸爆破声骤起。尘埃落定，尼赫鲁飞走了。这便是萨尔达尔萨罗瓦尔大坝投胎成形的肇始。

按下按钮的当儿，尼赫鲁可知道他放出了一个妖怪？

尼赫鲁前脚走，古吉拉特邦政府后脚就大规模进驻。政府从六个村庄的 950 户村民手中征用了 1600 英亩土地。这些村民是塔迪维（Tadvi）部落民，但因为邻近巴罗达市，所以对市场经济并非全然无知。他们接到通知，说是有现金赔偿，还可能得到在大坝工作的机会。噩梦由此开始。卡车和推土机隆隆而至。森林被放倒，未收割的庄稼被摧毁。吉普车、工程技术人

员、水泥、钢铁汇成一个其大无比的漩涡，把一切吞噬其中。默汉.柏.塔迪维（Mohan Bhai Tadvi）眼睁睁看着自己八英亩种着高梁、木豆和棉花的农田被铲平。一夜间，他变成了无地民工。三年后，他才分三次领到付给他的现金补偿——每英亩 250 卢比。

维萨.柏（Vesa Bhai）的父亲德尔苏克.柏（Dersukh Bhai）领到了 3500 卢比，作为对房屋和五英亩地的赔偿，地上的庄稼和树木也算在内。他还记得小时候，如何拽着父亲的手，一路走去县城拉吉皮普拉（Rajpipla）。他还记得被叫进税务官办公室时，如何胆战心惊。人家让他们交出补偿通知，在一张收据上签字。他们目不识丁，弄不清收据上写的是多少钱。

每个人都得去一趟拉吉皮普拉，但总是一个一个被叫去，去的日子也不同。人们无法互通情况，无法比较补偿金的数额。

渐渐地，尘土弥漫、推土机隆隆作响中，一个令人不安、散乱庞大的建筑群成形了。这就是凯瓦迪亚聚居区。一排接一排难看的水泥公寓楼、办公室、招待所、道路。全都是为大坝工程服务的基础设施，粗俗不堪。村民的房屋被拆卸，然后搬到聚居区的外围地带，直到如今还在那里，倒好像赖在自家土地上不肯走。如果有人敢制造麻烦，就会受到警察和建筑公司威胁恐吓。村民们告诉我，承包商总部设有一间“拘禁室”，就像警察局的拘留室，不听话的村民会被关进去，遭到殴打。

因建造凯瓦迪亚聚居区而被逐出家园的人，不算是安顿政策中所说的 “受工程影响人士”。

他们中有些人给官员当仆人，有些人在招待所当服务生，而招待所就盖在他们自己的宅基地上。还有比这更辛酸的吗？

尚保有一点土地的村民试图在地上种些东西。但是凯瓦迪亚市政府想出一个馊主意，弄了一群猪来吃大街上遗留的垃圾。猪们游荡到村民农田中，把庄稼全给糟蹋了。

1992 年，事隔 30 年后，当局提出给每户人家每公顷 12000 卢比的补偿，总金额不超过 36000 卢比，但条件是人们得离开家园，远走它方！然而，当初征用的土地中，40%至今还闲置着。政府拒绝还地。政府从现已居孀的德维本（Deviben）手里征去的 11 英亩地，后来转让给了斯瓦米纳拉扬信托基金（Swami Narayan Trust，一个很大的教派）。在其中一小块地上，信托基金盖了一所小小的学校。其余土地都用于耕种，而德维本只能透过带刺铁丝栅栏作壁上观。在从戈拉村（Gora）征得的 200 英亩土地上，村民们被撵走，盖起了一栋栋公寓楼。这些公寓空置了多年。最后，政府象征性地收取一笔费用，将公寓出租给了大坝承包商宰普拉卡什伙伴公司（Jai Prakash Associates），据村民们说，该公司又私下以每月 32000 卢比的租金将公寓转租了出去。（宰普拉卡什伙伴公司是全国最大的大坝承包商，名符其实的

“国家建设者”，拥有德里的斯迪哈尔施洲际大酒店（Siddharth Continental）和威森特洲际大酒店（Vasant Continental））

在大约 30 英亩的一块土地上，矗立着一座滑稽的混凝土建筑物。那是公共工程部制作的束乌尔潘尼施瓦尔（Shoolpaneshwar）神庙的“复制品”，而神庙真迹已淹没在水库中。为开掘莫须有的神庙而执意摧毁古老寺院的那股政治力量，已经把印度拖入了一场血腥的中世纪噩梦。在他们看来，淹没一条神圣的朝圣之路和千百年来人们顶礼膜拜的神庙没什么大不了的。

在他们看来，毁掉神圣的山岗和丛林，毁掉人们敬神的地方，毁掉部落民信奉的鬼神的古老家园，没什么大不了的。

在他们看来，淹没一个曾产出化石、细石器和岩画的河谷（据考古学家考证，该河谷是印度唯一从旧石器时代开始就一直有人类居住的河谷），没什么大不了的。

你还能说什么？

在凯瓦迪亚聚居区，最荒唐的笑话就是野生动物博物馆。束乌尔潘尼施瓦尔保护地讲解中心可以让你迅速、全面地了解政府是如何致力于保护自然环境的。

大坝达到全高程时，萨尔达尔萨罗瓦尔水库将淹没约 13000 公顷的一流林地。（被淹的命运既定，树林多年前就开始遭到疯狂砍伐。）淹没将对生物多样性和野生动植物栖息地造成的严重损失，令环境保护主义者和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忧心忡忡。

为了减轻损失，政府决定扩大河流以南跨越大坝的束乌尔潘尼施瓦尔野生动物保护区的范围。他们一拍脑瓜，想出一个绝妙的法子：让被淹没的森林中行将溺毙的动物们一路游到将为它们建造的“野生动物走廊”，在新的（！）大为改善的（！）束乌尔潘尼施瓦尔保护区安下家来。按照常理，只有人类活动受到限制、对使用森林资源的传统权利有所制约时，野生动物和生物多样性才能得以保护和维持。束乌尔潘尼施瓦尔保护区范围内的 101 个村庄、4000 部落民靠森林为生。他们将被“劝”离。他们不在“受工程影响人士”的定义范围内。

他们将去哪里？到这会儿，想必你已经知道答案了。

且不管部落民在真实世界中碰到什么麻烦，在束乌尔潘尼施瓦尔保护区讲解中心（里面有只老豹标本和一只发霉的长毛熊，局促地挤在一个角落上），他们却独享着整整一个房间。墙上挂着笨拙的木雕——那是政府批准的部落艺术，标签写得明白：“部落艺术”。 屋子中央是一座真实大小的茅草屋，房门敞开着。火炉上煨着罐子，狗趴在地上睡觉，一切是如此祥和。屋外，部落先生和部落女士在迎接你。一对体态臃肿的纸壳糊的夫妇，脸上堆着微笑。

堆着微笑。他们连一丝愤怒都不能流露，人家不准。这一点我怎么也难以释怀。

要不，是我搞错了？假如他们的微笑是发自内心，出于民族自豪感呢？为向古吉拉特邦数百万干渴民众送去饮用水而牺牲自己的生活，因之而满腔喜悦？

古吉拉特邦的民众期盼着奇迹运河送水给他们，已经等了 20 年了。连续多年，古吉拉特邦政府将灌溉预算的 85%投进了萨尔达尔萨罗瓦尔项目。每个小一点、快一点、地方性的、更切实可行的计划都被搁置一边，为这个项目让路。一轮轮的竞选围绕着“水票”进行，靠“水票”而赢得。每个人的希望都寄托在奇迹运河上。它能圆古吉拉特邦的梦吗？

从萨尔达尔萨罗瓦尔大坝起，讷尔默达河一路流经 180 公里富饶的低地，于布鲁奇汇入阿拉伯海。大致说来，奇迹运河所做的就是让这条河的一大半改道，向北扭转几乎 90 度。对一条河干这种事，够激烈吧。世界上为人所知的鲥鱼繁殖地寥寥无几，位于布鲁奇的讷尔默达河口就是其中一个。印度如果要选“最受人喜欢的鱼”，鲥鱼大概要算最热门鱼选。斯坦利坝（Stanley Dam）灭绝了印度南部高韦里河（Cauvery River）中的鲥鱼，而巴基斯坦的吴拉姆穆罕默德大坝（Ghulam Mohammed Dam）毁掉了鲥鱼在印度河中的产卵地。鲥鱼像鲑鱼一样，是一种溯河产卵的鱼—卵产在河里，幼鱼两三岁时迁徙到大海，然后又回到河里产卵。水流量的急剧减少和大坝后面堆聚的沉积物引起的河水质地变化，将大大改变河口的生态，使河水与海水的微妙平衡发生变化，其结果肯定会影响鲥鱼产卵。目前，讷尔默达河口出产 13000 吨鲥鱼和淡水虾（这种虾也在咸水中繁殖），10000 户渔民以此为生。

摩尔斯委员会惊骇地发现，对下游环境状况居然没人做过任何研究—河域生态、季节性变化、生物物种、河流资源的利用模式，都没有任何记载。建坝者压根儿就不知道大坝对下游的民众和环境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更别提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减轻影响了。

政府只说，政府会在水库里放养人工繁殖的鱼苗，以减少鲥鱼渔民的损失。（谁来控制水库？由谁将商业性捕鱼权授予有关系的付款客户？）到目前为止，唯一的小小问题是，科学家还没有研制出人工繁殖鲥鱼的方法。鲥鱼的养殖取决于得到野生成年鲥鱼的鱼卵，而它们十之八九早被大坝赶尽杀绝了。世界上五分之一的淡水鱼要么已经被大坝灭绝，要么因大坝而濒临灭绝。

好啦，出道小小的测验题吧——那 40000 渔民会去哪里？

答案请用电子邮件发送至“政府很在乎.com”。

冒着失去读者的风险（好几次有人警告我：“干吗写灌溉？谁他妈会感兴趣啊？”），让我来告诉你奇迹运河是什么，人们想要这条运河成就什么。如果你想从“铁三角”汗津津的手掌心里夺回自己的未来，你最好表示出一点点兴趣。

印度的大部分河流靠雨季得到河水。约 80-85%的流量来自多雨的月份——通常在 6-9 月。大坝，或者说灌溉大坝，作用是把雨季的水贮存在水库中，然后在一年中其他月份，通过运河合理地将这些水分配到干旱地区。运河浇灌的地区称作受益区。受益区过去习惯的是季节性浇灌，其整个生态的设计以一年一次的季雨为基础，现在处于常年不断的浇灌中，它会作何反应呢？常年不断的运河浇灌之于土壤，大致相当于促蛋白合成类固醇之于人体。类固醇可以把一位普通的运动员变成奥运奖牌得主，常年浇灌则可以使年产一茬庄稼的土壤变成一年多茬。在传统上只种植一些不需要多少水的庄稼（玉米、小米、大麦，还有各种豆类植物）的土地上，现在突然间要长出耗水量极高的商品作物—棉花、稻米、大豆，尤其是甘蔗（堪称吸水大王，与上世纪 50 年代耗油极高的带鳍形散热片的汽车好有一比）。这便完全改变了受益区的传统作物模式。人们不再种植自己吃得起的庄稼，转而种植只卖得起的作物。他们与“市场”挂上钩，却失去了对自己生活的掌控。

不幸的是，从生态学角度看，这种回报是有毒的。即使市场受得了，土壤也受不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壤变得越来越贫瘠，再也无法支撑加诸其上的额外需求。逐渐地，就像使用类固醇的运动员变得孱弱一样，土壤变得枯竭、退化，农作物产出开始走下坡路。在印度，井水浇灌的农田产量目前几乎是渠水浇灌者的两倍。某些类型的土壤尤其不适合常年浇灌。常年渠水浇灌会提升水位。当水顺着土壤上升时，会吸收盐。盐水通过毛细作用渗到地表，于是土地变成水涝地。这些“涝水”（笔者自造的词）通过植物呼吸释放到空气中，导致土壤的盐度更浓。含盐度达到 1%就对植物有害了。这就是所谓的土壤盐碱化。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资源与环境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表明，世界上五分之一的灌溉地已经盐化。

到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巴基斯坦 3700 万公顷灌溉田中，有 2500 万公顷估计不是盐化就是水涝，要么两种现象都有。在印度，受影响面积估计在 600 万至 1000 万公顷之间。根据“秘密”的政府研究，萨尔达尔萨罗瓦尔大坝受益区 52%的土地有水涝或盐化倾向。

坏消息还没完呢。

全长 460 公里、混凝土堤岸的萨尔达尔萨罗瓦尔奇迹运河，及其 75000 公里的支流运河和小支流运河网络，旨在灌溉覆盖 12 个县、总面积达 200 公顷的土地。卡奇和绍拉斯徹县（古吉拉特邦“抗渴”运动的招牌）处于这个网络的最末端。

运河系统用一个混凝土构成的网络，覆盖了该地区原有的天然排水网络。这就像重新建构一片树叶的叶脉。当运河阻断一个天然排水渠的通道时，就阻挡了季节性水的自然流动，导致水涝。对此，技术上的解决办法是将天然排水网络映射到该地区，然后依样画葫芦，用一个与

运河同时施工的人工排水系统来取代这个网络。问题是，你可以想象，这么做得花多大的代价。排水系统的成本，并没有包括在项目里面。大多数灌溉工程通常都不考虑排水系统的成本。

世界银行南亚地区副总裁大卫.霍普（David Hopper）承认，世行通常不把南亚地区灌溉工程的排水系统算进成本，因为包含充足排水系统的灌溉项目在经济上是不可行的。为相同灌溉面积的农田配上足够的排水系统，其成本是灌溉系统的五倍。世行解决该问题的办法是，先完成灌溉工程，然后坐等土壤盐化和水涝发生。当所有钱都花光、土地荒废、人民绝望的时候，谁会突然冒出来？嗨，近在家门的世界银行工作人员！他口袋里鼓鼓囊囊的是什么？不会是为排水工程准备的贷款吧？

在巴基斯坦，由世界银行提供贷款，在印度河上修建了塔贝拉（Tarbela，1977 年）和曼格拉（Mangla，1967 年）两座大坝。大坝受益区如今已成水涝地。目前，世行已经为巴基斯坦提供了 7.85 亿美元贷款用于排水工程。在印度的旁遮普邦（Punjab）和哈里亚纳邦（Haryana），世界银行在干同样的事。

灌溉不辅之以排水，犹如动脉系统不辅之以静脉。毫无意义。

自世界银行从萨尔达尔萨罗瓦尔工程撤出后，排水工程的钱从何而来就变得扑朔迷离了。这并没有阻碍政府动手修建运河。结果是，大坝还未建好，奇迹运河还未投入使用，灌溉用水一滴还未输送，土壤就水涝了。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中，就有安置区。

萨尔达尔萨罗瓦尔灌溉计划的规划者，和以往工程的规划者略有不同。至少他们承认土壤水涝和盐化是真切的问题，需要解决办法。

然而，他们的解决方案之夸张，足以让一只善呼的白眉长臂猿大呼小叫不已，不送进呼吼医院不算完。

计划是在大坝控区内每 100 平方公里安装一个电子地下水传感器（这意味着需要约 1800 个地面传感器）。这些传感器与中央电脑相连，电脑将对数据进行分析，并向运河控制人员发出指令，阻止水向显示水涝迹象的地区流动。一个由“只灌溉”、“只排水”和“灌溉兼排水”的管井构成的网络将埋到地下，由中央电脑同步操控。盐化的水将用水泵抽出，与电脑计算得出的一定数量的淡水混合，然后再循环流入地表和地下排水系统（为此将征用更多的土地）。为了获得所宣称的灌溉效率，据拉胡尔.拉姆博士（Dr. Rahul Ram）为卡尔佩利克施（Kalpayriksh）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82%流进奇迹运河的水将不得不用水泵再抽出去。

这些规划者过去未曾实施过一项电控灌溉计划，连一个小型模拟实验也未曾做过。他们从未想到，可以拿一块已经退化的土地当试验田，先看看电控灌溉是否可行。不，他们打算用我

们这些纳税人的钱在整整 200 万公顷土地上安装这个系统，然后看效果如何。如果不管用怎么办？如果不管用，对策划者来说无关痛痒。薪水照领。养老金、津贴、从祸害民众的岗位上退休时能得到的一切，照拿不误。

怎么可能管用？这就像叫一位火箭专家去给一头不配合的母牛挤奶。如果连给运河砌内壁都做不到不坍塌（因而致使庄稼和老百姓遭受数不清的损害），又怎能指望这些规划者操纵好一个如此庞大的电控灌溉系统？

要知道他们连防止大坝一下雨就东掉一块、西漏个洞都做不到！

引用一句他们自己研究报告中的话：“在上述情况下，为把地下水和地表水融为一体所需的设计、实施和管理是错综复杂的。”

同意。我想说的，又岂止“同意”二字。他们推荐的处理这一错综复杂任务的方法是：“只有当所有地下水和地表水的供应都由一个单一主管机构来管理时，这样一个系统才有可能付诸实践。”

啊哈！这才开始有点意思了。谁将拥有这些水？单一主管机构。谁将出售这些水？单一主管机构。谁将从销售中获利？单一主管机构。单一主管机构准备按升卖水，而且不卖个人，只卖农户合作社（虽然合作社暂时还不存在，但无疑单一主管机构可以凭空造出来，并且强迫农户们合作）。电脑水可不同于普通河水，很贵的。买得起的人才有份。

渐渐地，小农户会被大农户排挤，离乡背井的故事又会一幕幕重演。

由于拥有电脑水，单一主管机构将能决定由谁来种庄稼，种什么庄稼。据说，得到电脑水的农民不可以种植甘蔗，因为这样会用尽运河最下端数百万饥渴百姓的份额。然而，单一主管机构已经向运河源头附近的十家大型糖厂颁发了营业执照。此前在某个场合，单一主管机构曾宣称，乌凯大坝的受益区中仅有 30%会用于种植甘蔗。但是，该区域如今 70%都种着甘蔗（区域的 30%水涝）。在马哈拉施特拉邦，在单一主管机构一个下属分支机构的鼎力协助下，仅拥有该邦灌溉地十分之一、活动能力却极强的蔗糖团体用掉了该邦灌溉水的一半。

除了蔗农的问题，单一主管机构最近还宣布了一个计划，打算沿着奇迹运河修建一系列设施：五星级酒店、高尔夫球场、水上公园。天底下能有什么理由证明这一计划的合理性？

单一主管机构说，这是唯一能筹足资金来完成该工程的办法。

我实在为卡奇和绍拉斯徽的数百万善良民众担忧。

水能流到他们那里吗？

首先，我们知道河水量比单一主管机构所宣称的要少很多。

其次，缺了讷尔默达萨格尔水坝，萨尔达尔萨罗瓦尔的灌溉能力还要降低 17% - 30%。

第三，奇迹运河的灌溉效率（系统运送的实际水量）被随意定为 60%。把系统的渗漏和地表蒸发因素考虑进去，全印度最高的灌溉效率也只有 35%。这就意味着可能只有一半的大坝受益区能得到灌溉。哪一半？当然是上游那一半。

第四，水要流到卡奇和绍拉斯徹，奇迹运河还得曲曲弯弯绕过十个糖厂、若干高尔夫球场、五星级酒店、水上公园和以下几个县：巴罗达、凯达、艾哈迈达巴德、甘地讷格尔（Gandhinagar）、马赫萨那，都是些种植经济作物、政治上很有势力、拥有很多姓佩蒂尔的农户[10]的县。（单一主管机构已经违背自己的政策，向巴罗达划拨了相当大数量的水。巴罗达得到了，能把艾哈迈达巴德拉下吗？古吉拉特邦好几个势力强大的集居中心，也会凭借其政治影响来分得一杯羹。）

第五，即使水能够流到卡奇和绍拉斯徹（可能性几乎为零），还得通过管道输送到那 8000 个嗷嗷待哺的村庄。

要知道，世界上喝不到安全饮用水的 10 亿人当中，有 8.55 亿住在农村。这是因为，要给分散居住的农村人口提供饮用水，必须建造一个长达数千公里，耗费巨大能源，由管道、高架渠、水泵、水处理工厂构成的网络，工程成本令人望而却步。没有人为了向农村人口提供饮用水而修建大坝。没人负担得起。

摩尔斯委员会初到古吉拉特邦，得知古吉拉特邦承诺为偏远农村输送饮用水，颇为叹服。他们要求看看详细的饮用水计划。

没有计划。（现在还是没有。）

委员会问成本算出来没有。“几百亿卢比吧”答得好轻松。如果由专家通过计算得出估值，应在 10 亿美元之巨。这笔费用并未包括在工程成本中。那么，这笔钱从哪儿来呢？

别管了。问问而已。

[10] 译注：Patel 是一个常见的姓，多为有钱有势者。

有意思的是，法拉卡堰坝（Farakka Barrage）把恒河水分流到加尔各答港（Calcutta Port），致使居住在下游的孟加拉国 4000 万人的饮用水供应减少。

说到民族主义，有时候有的事办得真绝，计算之精准让人不寒而栗。

造一座大坝从 4000 万人民那里夺走水。造一座大坝假称为 4000 万人民送去水。

统治我们的这些神是什么人啊？他们的权力难道无边无际吗？

我在河谷拜访的最后一个人是白吉.柏（Bhaiji Bhai）。他来自昂达瓦村（Undava）的塔迪维部落，昂达瓦村是政府为修建奇迹运河及其 75000 公里的网络系统而征用土地的首批村庄之一。白吉.柏因为奇迹运河而失去了 19 英亩土地中的 17 英亩。这条运河不客气地横穿过他的田地。算上步行道和陡峭倾斜的河堤，河宽 700 英尺，就像为巨人自行车手建造的室内赛车场。

运河网络影响了 20 多万户家庭。人们失去了水井和树木，运河把房子和农田隔在两岸，迫使人们走上两三公里到最近的桥，到了河对岸又得往回走上两三公里。23000 户家庭，就算 10 万人吧，将像白吉.柏一样受到严重影响。他们不算“受工程影响人士”，没有资格获得安顿。

白吉.柏跟他在凯瓦迪亚聚居区的邻居们一样，一夜间变成了贫民。

白吉.柏和村民们，他们为拍摄政府日历而被迫摆出笑脸。白吉.柏和村民们，他们敢怒而不敢言。白吉.柏和村民们，像臭虫一样，被据说是他们自己的国家压扁。

我到他家时天色已晚。我们席地而坐，喝着甜得有点发腻的茶，天光渐暗。他说话的当儿，我脑海中掠过些许印象，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我想不出缘由，但知道以前没见过他。后来我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我没认出他，但记得他的故事。我在一部老纪录片中见到过他，那是十多年前拍的，就在这个河谷。他身体弱了许多，胡子也因为上了年纪而变软了。但他的故事并没有变得老旧，依然新鲜生动，充满激情。他不慌不忙把自己的故事娓娓道来，我的心却要碎了。可以看出，这故事他已经讲了一遍一遍又一遍，期待着、祈祷着有一天，某位路过昂达瓦村的陌生人不是别人，正是幸运之神。或是上帝本人。

白吉.柏，白吉.柏，什么时候你才会生气呢？什么时候你才不再等待呢？什么时候你才会说“我受够了！”，然后拿起武器，无论什么样的武器？什么时候，你才会向我们展示你那令友人共鸣、令对手胆寒、不可战胜的全部力量呢？

什么时候你才会击碎信仰？你会击碎信仰吗？还是让信仰击碎你？

要牵制一头兽，得打断它的四肢。要牵制一个国家，得制服它的人民。对他们的命运，得展示出绝对支配权。让他们明白，最终得由你来决定谁生、谁死，谁兴、谁衰。为了展示你的能力，你炫耀你能做的一切，轻而易举就能做的一切。你如何随便一按按钮便可摧毁地球。你如何发动一场战争，又如何寻求和平。你如何从一个人手中攫取一条河流，再送给另一人。你如何让沙漠变绿洲，如何砍伐一片森林再另辟一处植树造林。你恣意妄为，击碎一个民族对古老事物的信仰—土地、森林、水、空气。一旦信仰破灭，他们还有什么？只有你。他们会转而相信你，因为你是他们的一切。即使他们鄙视你，也会爱戴你。即使他们明知你是哪种人，也会信任你。即使他们被你压榨得就要断气，也会投你一票。你给他们喝什么，他们就喝什么。你给他们呼吸什么，他们就呼吸什么。你把他们的家当扔在哪里，他们就在哪里住下来。他们只能这样。要不又怎么办？没有更高一级法庭来制约你。你既是他们的母亲，又是他们的父亲。你既是法官，又是陪审团。你就是世界。你就是上帝。

权力的拥有，不仅靠它所毁坏的、还靠它所创造的来加以巩固。不仅靠它所索取的、还靠它所施与的来加以巩固。而权力的缺失，不仅因受损者的无助、还因受益者（或自认为受益者）的感激而成定局。

这一冷酷的现代型权力，隐藏在貌似民主的宪法中，貌似高尚的条款的字里行间。它掌控在那些由一个表面上自由的民族选举出的代表们手中。然而，人类文明历史上其它任何世纪，没有一个帝王、暴君、独裁者得到过这样的武器。

一天天、一条条河、一个个森林、一座座山峦、一颗颗导弹、一枚枚核弹，几乎不知不觉中，我们在被制服。

大坝之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正如核弹之于这个国家的军火库。它们都是大规模杀伤武器。它们都是政府用来控制国民的武器。它们都是 20 世纪的象征，标示出人类智慧在哪一刻把生存本能抛到了脑后。它们都是文明正在自我毁灭的致命标志。它们代表着人类与其生存的星球间的联系之割裂，而且被割裂的不仅仅是联系，还有理解。它们搅乱了我们的心智，使我们再也看不到蛋和鸡、牛奶和奶牛、食物和森林、水和河流、空气和生命、土地和人类生存之间的联系。

我们能找回迷失的心智吗？

也许。一寸寸土地，一座座大坝，一枚枚核弹。也许，通过用特定方式打特定战争。我们可以从讷尔默达河谷开始。

今年 7 月将迎来 20 世纪最后一个雨季。讷尔默达河谷的褴褛大军已宣布，当萨尔达尔萨罗瓦尔水库的水位上升，夺走他们的田地和家园时，他们不会搬离。无论你对这座大坝是爱还

是恨，无论你想要还是不想要这座大坝，都应该知道正要为它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当结清应付款、轧平账目的时候，你要有勇气观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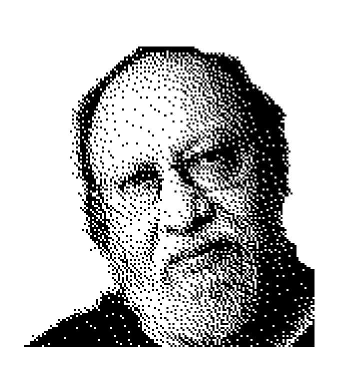
我们的应付款。我们的账目。不是他们的。

亲临实地吧。

（阿兰达蒂·洛伊，印度作家。此文首刊于《天南》文学双月刊，该杂志旨在以文学方式介入社会问题。原文链接：http://cochina.org/?p=783）

【问】

7-6 阿希斯·南迪：印度人不会为经济增长率牺牲自由



“印度有更大的尝试的机会，就算中国在发展方面会一直领先于印度。这是因为印度对大量异质的群体、个人、知识分子、思想、知识体系的声音都更加开放。所以，社会中的选择更为宽广。在中国，如果有人决定建一座大坝，人们没有办法阻止它。但是在印度，他们已经阻止、搁置或延缓了一些大坝的建设。”

作者：蒋亦凡

在今年来华参加“从西天到中土：印中社会思想对话”的七名印度学者中，阿希斯·南迪（Ashis Nandy）是最年长的一位。他出生于 1937 年，童年时印度仍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之下。他被誉为印度后殖民理论的奠基者之一，年轻时接受医学训练，继而进入临床心理学、社会学、精神分析，并且长期立足这些领域研究政治和暴力，关切底层人群和边缘知识，反思科学，怀疑由专家领衔的“高级知识”。

他在上海的两场演讲，几乎不用讲稿，气势磅礴，引领人们思考殖民史和现代性带我们的隐性创伤——那种既不珍惜过去也不为未来负责的进步观——并反思激进的世俗主义为我们社会的伦理观带来的伤害。

南迪目前是成立于 1963 年、位于新德里的发展中社会研究中心（Centre for the Study of Developing Societies）的高级荣誉研究员。此外，他还担任隶属于该中心的“中国研究所”（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的理事。该机构是印度最早和研究范围最广的中国研究机构之一。从 1978 年起，该中心开始编辑期刊《中国报告》（China Report），在该领域内广受尊敬。南迪说这些是他保持与中国的联系的主要方式。

南迪戏称他对上海的印象是那里充满了黑帮和革命者。问他何以道来，他说缘于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所读的书籍报章，那上面有很多关于上海的故事。他说上海在当时并不显得有多远，上海在亚洲想象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现在，他说，在印度只能看到有关上海的经济和高楼的新闻了。

12 月 7 日下午，南迪在下榻的国际饭店接受了采访，轻松、友好，而健谈。同在的是参与本次印中社会思想对话学术策划工作的台湾交通大学社会与文化研究所教授陈光兴。在采访期间，陈教授与南迪的即兴对话十分有价值，我们征得陈教授同意，节选刊入。

印度的民主和选举

蒋：在中国，人们对印度的民主有两种对立的看法：一种认为，印度固然有民主，但相当混乱，不值得效仿，因为这导致了其效率低下，贫富差距巨大等社会问题；另一种则认为，与中国的体制相比，印度的民主体制无论如何都有其优越性，例如言论自由的保障程度更高等等。您如何看待印度的民主现状？

南迪：坦白地说，中印之间现在的增长率相差大约两个百分点，我不相信大多数印度人会为了提升两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率而牺牲言论自由——虽然一些发展鼓吹者可能会这样选择。这是已经被证明了的！在 1975 年到 1977 年之间的“紧急状态”（Internal Emergency）期间，英迪拉•甘地就曾试图贩卖用社会控制来换取更高效、更低腐败和更快发展的观点。印度人都不买账，自由是可以让人上瘾的。于是她在 1977 年的大选中惨败——这很好地说明了印度人要什么和不要什么。在她自己的选区，一个落后邦的农村选区，她丢掉了超过十万张选票！

另一个方面看：印度是一个极其多样化的社会，在其中有着众多的群体、部族、种姓、族群，以及语言群体，如此种种。除非你允许这些人发出自己的声音，否则很多政策制定者和那些职业化的、自称的“印度人的施主”就会开始忘记这个社会中还有那么多的多样性。我想没有任何其他的制度可以在这种情况下运作。不仅印度是这样，整个南亚都是这样。巴基斯坦通常被认为是一个特别暴力的国家。但是在过去的 60 年中，巴基斯坦民众以非暴力的方式将四个军事政权推翻。我常说，这应该被列入吉尼斯世界记录！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孟加拉国。他们同样没有流血就将一个根深蒂固的军事政权推翻。这应该能说明一些问题。

蒋：在去年二月您在接受一位中国学者的采访（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沈双博士，访谈刊发于《今天》文学杂志 2009 年秋季号）时，您提到您认识到的“文化”的一个特殊含义：一种普通人的抗争方式——反抗权利剥夺，反抗政治冷漠。按照我的理解，你会主张将对这种文化的培育的事业充分交由本地民众和社区自身去开展，但是这其中有没有知识分子的角色？

南迪：不是作为先驱和领袖，而是一种更加谦卑的参与者。他们应该能够整理、强调和翻译普通民众所表达的焦虑、感受和不那么缜密的思想，把它们变成更加耐久的东西，变成能够被加工成为关于社会变迁和解放的理论的东西。知识分子只有在这种意义上才在其中有自己的角色。我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去倾听民众，向他们学习。他们的任务不是把理论立场强加给民众，让他们为之工作，而是应该倾听民众在说什么，然后以此为材料创造理论。普通公民是任何政体中的主演，普通公民的角色是重要的。

蒋：您在与沈双博士的访谈中谈到：印度的民主从来都没有让您失望过……

南迪：确切地说，我并不是这么说的，它恰恰常常让我失望。我说的是：那些组成印度民主政体的人——印度民众——他们从未让我失望。确实，他们直至今日一直在明智地选择，即便他们中间有着很大的不同和多样性，即便他们有着所谓的“落后”。

蒋：但民众还是会陷入暴力和仇恨的政治，比如 2002 年在古吉拉特发生了印度教民众针对穆斯林的大规模暴力。

南迪：没错，这件事的确发生了。所以当时统治古吉拉特邦的政党（印度人民党）和领导人后来为他们在暴力中的共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虽然在古吉拉特邦他们一直在掌权，但是他们已经输了两次全国大选。

这个党是一个极端民族主义政党，有人说他们是右翼政党，但它事实上并没有经过慎重考虑的意识形态，而只是极端民族主义政党和多数主义政党，仅此而已。当时的总理瓦杰帕伊，一个广受尊敬的人，在骚乱事件之后要求古吉拉特邦的首席部长（纳兰德拉·墨迪，被广泛认为在这场印度教狂热分子针对穆斯林群体的种族清洗式的暴力骚乱中负有不作为甚至是共谋的责任）辞职，但党内有别的人给他撑腰，公开让他不要辞职，于是他就没有辞职。于是印度人民党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不过，组织骚乱或者种族迫害并不是那个党的专利，别的党也干过这事儿。1984 年，在英迪拉•甘地被她的锡克教保镖刺杀之后发生的那场大规模反锡克骚乱也是一场有组织的暴行，当时执政的国大党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顺便提一句，古吉拉特邦政府向我提起了刑事诉讼，因为我针对 2002 年的暴力事件在《印度时报》上写文章反对他们，案子还在继续着，不过对我来说不是什么问题。

我的观点是：在一个民主政体中，为了动员政治支持，政党们有时会挑拨民众。而知识分子、民权运动和媒体这时就有责任去揭露这些政客和政党。一个开放社会需要永恒的警醒。

蒋：就是说，在这种民主体制中，民众的观点和行动的确会被政治家和意识形态家煽动？

南迪：对，的确有这种危险，但那种危险是有限度的而且通常是地方性的。这种种族迫害在全国范围内很难组织。刚才举的两起事件都是由全国性政党发动的，但是都没有超越某种地理界限。我要说的是，如果没有民主政体的制衡，而极端民族主义政党上台，那就更加危险——那就没有办法去制衡他们了，没有公开的批评，没有人权组织的诉讼，或许甚至都没有一份像样的不偏不倚的记录。

蒋：中国的不少经济学家都在谈论印度的发展模式，且有不少人认为基于民主政体的印度模式优于中国模式，也有一些言论认为一些年后印度将超越中国。请问您如何看待所谓的“印度模式”？如果您不认为印度模式的存在，那么您如何看待印度相较于中国的优势和劣势？

南迪：我仍然认为，无论怎么说，印度有更大的尝试的机会，就算中国在发展方面会一直领先于印度。这是因为印度对大量异质的群体、个人、知识分子、思想、知识体系的声音都更加开放。所以，社会中的选择更为宽广。在中国，如果有人决定建一座大坝，人们没有办法阻止它。但是在印度，他们已经阻止、搁置或延缓了一些大坝的建设。反坝积极分子制造出的大量噪音已经增加了提出建坝规划的政治成本。现在在印度少了很多对宏大发展计划的机械的、无批判的接受。我想，不仅是环保主义者和人权团体，普通民众也已经变得更加明智而且懂得怀疑。他们想要发展，但同时也知道它的某些成本。他们知道：如果公民漠然处之，那些从发展中受益最少的人们就会为此付出极大的代价。结果是，未来我们或许不会有很多惊人的增长。惊人的增长在亚洲语境里常常导致了长期的独裁统治，从韩国的李承晚到台湾的国民党，从军事统治下的泰国到苏哈托治下的印度尼西亚。发展史的确显示：惊人的发展常常与对国家的控制携手并进。我认为：最终，如果一国公民能够直接接触政治权力，这个社会就不容易出问题，政治家们就会不得不从他们身上学东西。民众的声音的存在本身就是重要的，它是对极端的一种制衡。

蒋：您称印度为一个“富有活力的多元社会”（robust plural society），那么以印度为参照，中国算不算一个“富有活力的多元社会”？

南迪：中国是一个多元社会，至于是不是“富有活力”，还得再看，得看政治制度。因为这些多元性在公共生活中是否能够发声，这得由你们来告诉我，我回答不了。

蒋：那么普通印度民众是否已经非常了解他们身处这样一个多元社会，身边住着持有相当不同的世界观和政治诉求的人们？生活贫困、受教育有限的底层民众对自己的社会了解多少，他们政治知识是否比较有限？

南迪：从我们所做的大量调研中可以很容易地发现——我们中心以大规模的对选举过程的调研而著称——人们的政治选择取决于人们对政治有多少了解。 所谓的“弱势人群”或农村人口

的政治知识和有权势的人们的一样丰富。因为中产阶级不那么喜欢政客。虽然他们有政治看法，他们设法与直接的政治参与保持距离。乡村穷人和弱势群体同样不喜欢政客，但是每一项调查都显示：他们有着丰富的政治知识并且严肃地看待政治。或许这是因为政治对他们真的很要紧。

顺便说一句：调查显示：政客、官僚和警察是大众最不喜欢的三种职业。

蒋：这是不是说他们非常擅长动用策略来实现自己的政治利益?

南迪：那他们可是相当地擅长！此外，他们也牢牢掌握着政党的动向及其社会支持基础，以及政党候选人之间的区别，而且他们还能给出支持某个候选人或政党的政治理由。

蒋：他们是怎么学习的？

南迪：通过参与那么多的选举！我们从 1952 年来就一直有选举！除了大选，还有各个州的选举，现在还有地方政府选举，有时政府倒台后又会进行再选举。以印度规模之大，那可是很多的选举！即便是年轻人也参加过很多次选举，所以选民们在政治上已经变得老到了，精明而多谋。你不能就那么用虚假的诺言或是政治煽动去骗骗他们。政客们怕这个怕得要命！

蒋：选举是正式的政治参与渠道，除此之外，还有别的政治学习途径吗？

南迪：对，你说得没错，这是所有民主政体在某种程度上正在面临的情况。选举大家都知道，但是很多人，特别是城市中产阶级，正逐渐变成被动、犬儒、只会看看电视的公民。他们变成了被动的参与者和政治的旁观者，而不再是积极的公民。你说得对，这的确在成为一个问题。

在印度这种情况会好一点，因为选举对于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意义重大，选举为他们的生活带来切实改变。这就是为什么印度的公民参选率几乎是美国的两倍——因为弱势的和缺少教育的人投得更多！中产阶级可以认为政治肮脏而不去碰它，但是对于部族社区、穆斯林、原先的贱民和低种姓来说，选举是一种表达他们的苦楚和异议的途径。假设你是一个来自低种姓的人，从来就被压迫和剥削，一个和你同样来自低种姓的人让你感到更安全，然后你就投票给他（她）。如果你的社区里没有人参政，那么你自己就得充分了解政治，好去决定哪个候选人和哪个政党最能照顾你的利益。我估计，农村地区的政治参与程度普遍比城市更深。

蒋：印度是否正越来越多地被来自较低阶层和种姓的人们统治？

南迪：是的，传统的上层阶级精英越来越难步入政坛，因为他们从来就是人口的少数。在一个民主国家，数量是要紧的。

蒋：照这么说，在不久的将来，印度将主导性地被来自社会下层的人士统治了？

南迪：在印度的很多地方已经是这样了。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婆罗门阶级基本上没有当过首席部长。

“损失感”：不育的社科和断裂的传统

蒋：您在 12 月 4 日在上海美术馆的演讲中，一个最大的关键词是“损失感”（sense of loss）。您说，在“南方”（南迪习惯用于称呼第三世界的词）的社会科学领域，正是因为缺乏对现代性、启蒙价值和进步观念在我们的历史和社会中所造成的损失的感受，所以其社会思想和学术普遍缺乏创造力，或者用您的话说，是“不育”。依您的观点，什么是中国现当代的还没有被社会科学知识分子充分哀悼的“损失”？

南迪：我对中国社会科学的了解非常有限。不过，我本来期待中国在经历了那么多的动荡和苦难之后，在经历了革命和领导人更替之后，能为我们提供一些更加独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能够处理全球和国内问题的社会理论。中国至今没能用她的苦难经验以及丰富的传统来提出看待当代政治和社会过程的替代性的方法。虽然经受了暴力的侵害，但中国已经向当代对暴力的研究，其民族志、心理学和社会史，做出了她应有的贡献。我想，源自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理论将对亚非世界乃至拉美社会具有直接的相关性。

我猜想这种断裂的原因是这样的：缺少充分的思想交流，思想缺少足够的多样性，甚至可能没有足够多样化的用来产生新理论的本土理论立场。只有通过这种思想的冲撞，新理论才会浮现。所以我认为在这种意义上，中国浪费了本可以不仅向中华文明，而且向世界文明作出巨大贡献的黄金机会。

再给你一个例子：中国农民与俄国、印度的农民一起，在传统上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坚韧的农民。数百年来，这三者以其独立、自主，甚至是固执、不屈不挠的怀疑主义，以及拒绝仅仅为了改变而改变而闻名于世。他们为了自己对世界的理解而抗争，依照自己的对美好生活的理解而生活，并在其中不断创新。

但是，让人难过的是：中国农民的价值被低估了。中国经历了激进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开始将农民看作是这个过程中的拖累，或仅仅是工业化所需的劳动力的来源。可是我认为，农民生活方式能对中华文明做出直接的贡献，不必非得把他们统统无产阶级化。我认为它能够被用来纠正城市生活方式和工业化过程中的放纵。

当前，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和壮大中的城市部门及其中产阶级似乎都持有同一种观点：根本没有必要去通过倾听社会中其他成员的声音来保证现代化进程不会成为一个压迫性的进程——

就像它在很多社会已经发生的那样，特别是西方社会。在中国，就像在印度一样，城市化和工业化本身常常变成目的，而传统和文化遗产却被看作包袱。这种取向不相信在一个社会的过去和今天之间应该维持某种连续性。

这说明我们没有充分地认识到：我们的社会都已经经历了太多的断裂，一些本该被保护起来的历史连续性并没有得到保护。现在我们至少可以看清：城市化和工业化在我们两国的社会中都已经赢得了这场政治斗争，那么这胜利的一方应该更慷慨地给予另一方以话语权。我担心印度农民和部落人口今天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陈光兴：阿希斯，容我插一句，是关于农民的有趣的话题。很遗憾，作家韩少功因故没能参加上周六与您的对话，我们邀请他就是想让他谈农民问题。他追随了一条知识分子传统，有意识地进入乡村，立足乡土创作文学作品。沈从文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也是这样。中国一直就有这么一种传统。他们是土生土长的知识分子，他们对自己的乡土文化有着足够多的了解和信心。

南迪：我很高兴你指出这一点！

陈光兴：这条知识传统如今仍然在那儿。我们并不是没有资源，即便在现当代。

南迪：在中国那么大的一个社会和历史那么悠久的文明，它肯定会有。一定得有人注意到伤疤然后去设法做些什么。现在我得追着你让你帮忙看看他的作品有没有译成英文。

陈光兴：但如果我们进入到社会科学里来看，整个社会科学就是以城市为中心的，或者是以城市为参照的。如何研究农民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恰当的方法论是什么？整个的马克思主义框架也是用来回应工业化的，比如阶级形成，等等。但你该怎么恰当地研究农民呢？

南迪：即便在马克思主义框架中，中国也做了创新。毛泽东的确谈论了农民，的确尝试了将革命从城市无产阶级带入乡村。但是最终，那没能满足那场运动本身。最终这场运动还是被那孕育了马克思主义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给俘获了。城市工业化图景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隐藏的联系结果比毛泽东想象的更强。所以一旦毛泽东死了以后，一旦他的影响和对他的记忆开始褪去，那种隐藏的联系就变得更加公开——它重新确立了自己。我并不反对工业化和城市化，某种形式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总会存在于社会中，而且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健康的。我的立场是：如果你想把城市工业文明建立在乡村生活方式和乡村文明的废墟上，那就太过分了。曾几何时，当一个文明或文化体被想象成一种建立于辩证过程上的东西的时候，这里面有一种自然的制衡机制——在其中你能在增加城市工业化比重的同时，将这种进程置于控制之下。毛泽东的模式里，这种辩证法是未加明言的。它本来有可能带来农民生活方式的存续，并承认这种生活方式对于社会的哲学意义。但那事实上并没有发生。巧的是，那也正是甘地的愿景。他坚

信城市工业化文明如果没有农民生活方式的话，是不完整的。如果我可以从字里行间读出隐含意义的话，他们两位都认为农民生活方式必须成为对城市主义和工业主义意识形态之放纵的矫正。

陈光兴：如果我们聚焦于分析模式本身，而不是政治实践，我听说在中国大陆，由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整个中国历史被根据生产方式来重绘（remap）了。但是所谓的"生产方式"又是基于工业化的发展起来的理论，换句话说，欧洲经验和欧洲参照被照进了中国历史。整个战后的历史编撰都源自于这一等式。我的意思是，即便是生产方式概念也是从特定的历史时期冒出来然后被重绘入历史的不同瞬间的。所以你无法获得对与过去相连续的历史流的深入的理解。你所能说的不过是：这是古代的阶级斗争——可是那时候并没有阶级，那是别的什么东西。不仅如此，在历史的早期，经济因素在社会构成中是否真能决定什么？印度学界或者马克思主义学界怎么分析这些？是否与这相似？

南迪：没错！因为来自于城市工业化文明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模型同时是西方殖民主义、西方资本主义和西方城市工业化进程三者的经验的副产品，于是，你最终还是成为城市工业化世界的观点的俘虏。所以，即便当你谈论农民，你就急于替他们说话，却不准那些农民为自己说话，而得由你来说。你颂扬农民，但这种颂扬到你一走就结束。

而甘地却超越了这一点，他并不试着替农民说话。他丢掉鞋子和西装，放弃了在英格兰的律师背景，穿得、过得都像个农民。可是，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在他发起的运动的内部发展了起来，因为没有人有这个意愿和能量来学着像农民那样思考并以此为基础来创造。在那时，几乎没有人预见了城市化和工业化以及世俗化进程在今天的胜利。毛泽东和甘地听起来都在为社会中溃败的部门——农民——说话，但是他们不知道城市工业化的愿景会变得多么地强势，因为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工业化和城市化还没来得及发展得太成熟。"我们必须为它说话，给它空间"，很多人这么想；"我们必须承认它"，毛泽东这么想。所以当农民包围了城市，当他们掌握了政权，最终，他们用手中的权力建立了一个以城市为中心的社会。这是他的劫数。而甘地的劫数是：他认为他可以改革乡村以使它们可持续。他不了解，在亚非世界中，甚至是在他下一代的印度统治者的心目中，对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渴望是多么地强烈。所以这就导致了我们今天看到的问题——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当今遇到的抵抗越来越被边缘化，这些抵抗被看做古怪、向后看、倒退、反进步、反现代，等等。

蒋：根据中国社会学家李银河在自己的博客中引用的调查数据，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拜金的国家。她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中国的"无神论"。您在 12 月 6 日在复旦大学的演讲中也提到了我们需要反对极端世俗主义的高歌猛进，需要为信仰保留空间，因为这是伦理道德和对未来的关切的来源。那么，在中国这样一个宗教信仰生存空间有限的国度，我们应该如何处理拜金问题呢？

南迪：这是个悲剧。因为即便在西方，当资本主义诞生的时候，它是骑着新教伦理的精神而来的。众所周知，新教伦理被认为是西方发展的文化引擎。但是我们却没能将我们的公共生活和商业文化与我们的宗教传统相联系。我们买来了那种愿景，但是还没能真正将实现这种愿景的手段与任何的伦理或宗教传统相联系。虽然伊斯兰、儒教、印度教传统上都支持商业活动，或者叫"商业友好"——比如在印度自古有商业种姓，在中国自古社会中就有商业的空间，中国商人自古就远离国土从事贸易。但我们并没有立足与这些传统。事实上，我们已经破坏了那种能够约束我们的行为，使我们能够矫正现代社会中的病态的那些伦理准则。我的感觉是，在未来的几十年中，我们将为之付出沉重的代价，不仅是在中国，在印度也是这样。

普世价值和民族主义

蒋：近年来，在中国，针对"普世价值"是不是存在和是不是值得追求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即便最高领导人多次表示对"普世价值"的尊重和追求，但仍然有不少人公开对它表示强烈的怀疑和批判，比如：认为"普世价值"只是西方价值，是用来制约中国的陷阱。您认为"普世价值"是否存在吗？

南迪：我想，即便在非西方国家，很多这些价值人们一直都在追求。很多调查也显示：在那些经济上相当成功，同时将这些价值斥为与"亚洲价值"、"家庭价值"和"宗教传统"不相容的国家，比如沙特阿拉伯和新加坡，人们也持有这些价值观。

大家都喜欢自由。很多人相信：人们只有在基本需求得到保障之后才会要求自由。他们认为只有在面包得到保障了之后自由才会到来。事实上，人们既要面包，也要自由，两者都有优先地位。普通民众不是孩子，虽然很多国家把他们当作不知道自由是什么意思的孩子。我倒要挑战这些国家，让他们给人民选择，看看他们究竟是怎么想的。那就让我们寻找答案！至少让人们去通过研究来寻找答案！我愿意等着经验研究证据来确定这个问题的答案。但至少到目前，我没有看到证据让他们可以这么做。

蒋：在印度的公共讨论中，人们谈论"普世价值"这个概念吗？

南迪：有人管它叫"普世价值"，也有人坚持说虽然这些东西是普世价值，但它们也是印度价值。我倾向于同意后一种观点。我认为，自由，说出自己想法的自由，素来是很多国家的传统的一部分。我也不认为即便是最独裁的统治者曾经完全压制这种自由。你不能像李光耀和马哈蒂尔那样用谈论"亚洲价值"或"家庭价值"来冻结社会变迁和社会、政治批判。民众知道那些其实不过是花招。所谓普世和非普世之间分割其实只不过是为了固化国家控制。我们必须对它们保持怀疑。

蒋：您对民族主义有尖锐的批评。但是，您对基于西方和启蒙价值前提的现代性的批评是否恰恰会被民族主义者用来支持他们的意识形态呢？

南迪：我不认为民族主义者能用我的理论，因为对民族主义的批评是我的写作中的最大主题之一。顺便提一下，民族主义（nationalism）和爱国主义（patriotism）是有区别的。爱国主义是一种形式的地域性（territoriality），它是人们所具有的一种情感。作为一种地域性的形式，它不局限于人类。你同样能在猫、狗、鸟类身上发现这一点。鸟类在冬天往南飞，比如很多俄国的鹤在冬天飞来印度，在冬天结束时又飞回俄国，因为它们具有地域性——爱国主义有点像那个，每个人都喜欢自己出生和度过童年的地方。而民族主义就不一样。民族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而爱国主义是一种情感。民族主义有时候是建立于爱国主义之上的，但是它是一种有关敌人与朋友，责任与义务的理论。民族主义还坚持认为你首先是一个中国人然后才是个汉人或者藏族人。为什么？至少三千年来你一直都是汉族人，为什么"中国人"的身份就具有优先性呢？

而传统的爱国主义概念是不同的。一旦有紧急局势，你把优先性给予你的国家，你为了国王和国家而战斗。但是如果人人都说国家要比基督教、伊斯兰和佛教更重要，那这会在民众中造成反弹。然而，很多人觉得除非且直到人们承认国家要比任何宗教或文化、亚文化等等都重要，否则他们不会为国家而战。我认为这就太过分了。这不仅导致了更多的暴力、流血，以及更多的国际冲突，同时也带来更多的分歧和分离主义。

至少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是毫不含混的——我们必须对抗民族主义。另一方面，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当他们为了自由和反对宰制而战斗时，他们并不是民族主义的。如今，在我们两国，民族主义已经如此强大以至于即便是对于中国或印度的正常的批评也变得困难了。可是向我们两国这么巨大和复杂的文明如果没有持续而热烈的内部批评，怎么可能更新自身？

蒋：您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有没有什么观察？无论是历史上的还是当代的。

南迪：事实上，印度的民族主义还要严重，至少调查数据是这么显示的。所以这对印度来说要比对中国来说更成问题——当然，中国也有民族主义。无论如何，那种沙文主义的民族主义应该受到细致的讨论和批判性的评估。中国的知识分子可以对此作出贡献。因为我猜测：中国政府当前并不喜欢极端民族主义思想。他们应该已经预见到了在未来几年里这会变成让人头痛的事情。民族主义的用处是向你本来没有什么意义的"政治自我"和"政治参与"提供意义——因为你本来并不直接参与政治权力，你对政治进程的接触少而又少，于是民族主义给了你的政治参与意识一个宣泄口。这可不是什么好玩的状态。好政治是那种你不需要对它想太多的政治——就像呼吸，你不必去刻意想它。政治应该像那样，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民族主义，特别是当它变成张扬的民族主义的时候，常常是正常的政治参与的替代品。我对中国了解得还不多，还不足以对中国的民族主义做出一个最终评判。

（阿希斯·南迪，印度政治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原文链接：
http://westheavens.net/%E3%80%8C%E8%AE%BF%E8%B0%88%E3%80%8D%E4%B8%AD%E5%9B%BD%E6%B5%AA%E8%B4%B9%E4%BA%86%E8%B4%A1%E7%8C%AE%E4%BA%8E%E4%B8%96%E7%95%8C%E6%96%87%E6%98%8E%E7%9A%84%E9%BB%84%E9%87%91%E6%9C%BA%E4%BC%9A-%E2%80%94/）

【切】

7-7 许知远：重新想象印度



“倘若印度代表一种政治理念，中国则代表另一种，它们之间的竞争不仅是国家间的，也像是理念间的——民主而喧闹、集权而一致，到底哪种体制的运转更有效。”

一

倘若加尔各答代表着旧印度，班加罗尔则象征着新时代。在这个时代，空间与时间模糊了，一切都是透明的、平面的，就像我正穿越的班加罗尔的机场大厅。浅蓝色的玻璃幕墙、光洁的地面，色彩鲜艳的广告灯箱，它可能是新加坡、上海、吉隆坡。比起老牌的都市纽约、巴黎、伦敦，这些新机场更明快、整洁、宽敞，洋溢着后来居上者的自得。

它也给我一种期待的秩序感。一条高速公路通往市区，两旁的路灯散发出乳白色光线，每一盏都亮着。出租车干净、宽敞，司机的英语流利，他还使用计价器。

这符合、可能也过分地符合我对于班加罗尔的想象。过去的十多年里，这个印度南部城市的软件公司、呼叫中心，就如同中国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的工厂一样，被视为东方崛起的象征。

“二十年前，印度还因驯蛇人、穷人、特里莎修女著称。这个形象转了个。如今这是个充斥着聪明头脑与电脑天才的国度。”托马斯•弗里德曼那本平庸却大受欢迎的著作里这样写道。也是这本著作把班加罗尔的声誉推倒了顶峰。自诩为现代哥伦布的托马斯•弗里德曼声称“世界是平的”，他的旅行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而给与他最初灵感的是这“印度硅谷”中最著名的软件企业的首席执行官——Infosys 的南丹•奈利卡尼。

我在加尔各答市场街的书摊上买了南丹•奈利卡尼的《想象印度》，他去年的作品。我最初抱着一丝轻视。人们总喜欢僭越，在获得财富与名声之后，还要把自己打扮成知识分子、意见领袖。他还是弗里德曼的挚爱，那位《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像是这浅薄年代的传教士，妄

图用一些简单的概念与词汇，来忽略世界的复杂性。他那推平世界的十种力量，适合工商管理学硕士的课堂教材，却无助于理解世界的真实模样。在某种程度上，它就像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与“技术决定论”的拙劣翻版。

我最好压抑一下自己的刻薄劲。是啊，人人都会轻蔑地讥笑一下别人的浅薄——它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但当你面对印度这样一个复杂的国家时，还是抑制不住地要找一个快捷的入口，泰戈尔的诗歌、甘地的精神、德里的泰姬陵，恒河旁的朝圣者，或是班加罗尔的软件公司……

《想象印度》的行文是托马斯•弗里德曼式的，从一个世界名人跳到另一个世界名人，经他们之口传达某个理念，再不失时机插入自己的个人感受。其中还有某种故作天真的惊叹——你看，不到二十年，印度的模样已经大变了。

但这本书仍值得阅读，尤其对于一个外来者来说。政治、经济、能源、教育、技术、环境、传统，它涉及了当代印度的每个方面，而经济变革是贯穿的主线。在奈利卡尼的眼里，一九九一年开始的市场化运动，是构造今日印度的主要力量。他这一代是“桥梁的一代”：他们成长在一个国有体制年代，政府占据着经济生活的“制高点”；当他们开始第一份工作时，这个体制开始松动，印度社会被压抑的创业精神开始复苏；而在过去二十年里，这种热忱汇集成一个浪潮——除去中国，再没一个国家比它的经济增长更快。奈利卡尼处于这股浪潮的最前端——如果班加罗尔是“新印度”的皇冠，Infosy 则是皇冠上的明珠。这本书暗含的信息是，商业管理哲学可能推广到整个国家。

我喜欢他的开阔眼界和这股雄心。印度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许诺与支持这种雄心。我很难想象，中国会产生对应的人物。柳传志或是马云，他们都是卓越的商业领导人，并有一种大众偶像式的魅力，但他们会写一本《想象中国》，谈论这个国家的困境与希望，给予自己的解剖与方案？很显然，这不仅仅是缺乏才智与兴趣。

二

但班加罗尔吸引我的，不是软件公司、呼叫中心，商业领袖，而是一位历史学家，拉姆钱德拉•古哈。离开北京前，我读到他的《甘地之后的印度》，我很久没读到这样令人心动的历史著作了，能将典雅的叙述和透彻的分析，如此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厚度还超过八百页。它还有着畅销书的特质，给予读者一把钥匙，如此复杂的当代印度史，经由一种理念而串联在一起。

我们约在 Koshy 咖啡店见面。这里下午嘈杂、热气腾腾，墙壁上挂着黑白的照片，那是英国人统治下的印度景象，有一种危险的怀旧——那是个更单纯、美感和有秩序的年代。自从一

九四零年创办以来，它就是本地的艺术家、作家、新闻记者和风雅人物的聚集地。这里用蓝色桌布，服务生们的白色制服像是中国警察在八十年代的服装，只是少了两个红色肩章。市区的味道与机场不同，而硅谷的味道与景观都被隔离在郊区的工业园区了。市中心仍是那个摩托车、破建筑、英国殖民遗产构成的印度，偶尔的几座现代购物中心，都显得鹤立鸡群。

古哈准时而至，白棉布衬衫，暗黄色裤子，运动鞋，身形魁梧，他曾是个板球好手，而他第一本引起广泛注意的书，是关于板球的历史。

“他只是个体育历史学家”，一位小说家曾不屑一顾地说。当时，他们正就印度的民主问题在报上打笔仗。除去情急中的小说家，没人能把《甘地之后的印度》的作者不当回事。他刚刚坐下，一位热情的读者就前来表示敬意，《华尔街日报》欢呼他是“首席印度记录者”，查理•罗斯邀请他出现在夜晚谈话里，更重要的是，印度人拥抱了它，这样一本严肃、厚度十足的作品，登上了畅销书榜首。这本书的命运也像是印度现实的延伸。绝大部分印度人读不懂英文，这里有十五种官方语言，不同区域的人们有着自己的独特文化传统与语言方式。古哈对我说，它已被翻译成这十五种语言中的六种。

这也是这本书的核心命题：是什么把这样广泛的人群和区域变成了一个叫印度的国家。十九世纪的英国殖民者们感慨，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所谓的“印度”。人们觉得是旁遮普人、孟加拉人、马德拉斯人，而不是“印度人”。欧洲人依靠某种语言、区域、或是抽象的民族本质，而成为一个个的民族国家，而印度，“旁遮普与孟加拉的差异，要比苏格兰与西班牙之间还大”。这种怀疑也贯穿了二十世纪。宗教、种姓、语言、阶级，这些屏障难以克服，似乎意味着不可避免的混乱的冲突，穷人又太多了，他们能理解民主制度的含义吗？

但印度不仅存在下来，而且生命力旺盛。古哈相信，“民主”是理解这一切的钥匙。比起广泛传诵的经济故事，他认定“当代印度真正成功的故事是政治而非经济”。正是民主政体，才让这么多嘈杂的声音与争端，共同存在，相互激发。而印度也让对民主这个理念，做出了新的补充。

古哈热忱、亲切，但我们却没有太多的好说的。他所知的一切都已在著作与文章中表达一清了，更糟糕的，我还同意他所有的看法，认定他的视角。他是我最欣赏的那类知识分子，既有强烈的热情，又保持着冷静与批评的态度。在印度沉浸在自我庆祝时，他列举出“印度无法成为超级大国的十个理由”。他赞扬了这么多印度的民主，也对于它的弊端忧心忡忡。

他对中国议题，没有兴趣。倘若印度代表一种政治理念，中国则代表另一种，它们之间的竞争不仅是国家间的，也像是理念间的——民主而喧闹、集权而一致，到底哪种体制的运转更有效。

在此刻看，中国似乎获胜了。在印度，我时常感受到对中国的焦虑。它既有战争的挫败——四十年前与中国的那场战争，让印度丢掉了独立后所有的骄傲，也有意识形态的遗产——六分之一的地区仍被毛派分子占领者。天知道那些黑皮肤的人是否了解毛泽东思想，他们却宣称自己是他的信徒。而此刻是经济上的竞争。很少有中国人把印度当成严肃的竞争者，如果你到过印度的城市与乡村，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基础设施上，中国已领先太多，中国人也普遍比印度人富裕得多，当印度宣称自己有两亿人已是中产阶级时，一定招来了中国人的嘲笑。但在印度的媒体上，中国却一再出现，他们比中国人更热衷于讨论龙象之争。

“这是媒体泡沫，明年是战争五十年，肯定有更多的争论”。他轻描淡写地带过。比起他的精神偶像泰戈尔，他对于中国几乎算得上冷淡，除去一次为了批评印度的迟缓的效率，他提到了一位入狱的上海市委书记——这么高阶的官员也能入狱，印度需要这种效率。他沉浸在印度的纷纭头绪中，要清理这一切够他花去几辈生命了，他正在写两卷本的甘地传记——甘地对于世界的影响仍未得到足够的描述，他的早年生活也没有得到详细的研究。

有那么一两个时刻，谈话突然终止了，我不知该问什么，他也不知该说些什么，各自喝上几口咖啡，听着周围一片的嘈杂，班加罗尔的傍晚已在窗外来临，摩托车发出轰鸣声，背着黑色电脑包的青年人带着满脸的疲倦。

我意识到自己的尴尬。不管中国比印度多建造了多少公路与大楼，多消费了多少汽车与名牌时装，在智力与创造领域上，中国却可悲地落败了。一百年前，当泰戈尔环游世界时，他是伦敦、巴黎、纽约、柏林的贵宾，人们倾听他的东方智慧。而中国的一流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却从未受到如此礼遇，他们是西方的热切学习者，却很少有人乐于询问他们对世界的见解。这种失衡也留在中国与印度之间。泰戈尔有无数的中国追随者，却从未没有一个中国诗人、艺术家激起这样的回响。如今，我来到这里拜会拉马钱德拉•古哈，像是谭云山追随泰戈尔的延续。当我了解中国的民族主义历史时，需要依赖一位印度学者杜赞奇的论述。

这种失衡弥漫到细节里，从加尔各答、瓦拉纳西、圣蒂尼克坦到班加罗尔，不管是城市还是小镇，我总是钻进书店，把行李中塞满英文书，很多与印度无关，只是英语世界最新的出版物。我在如此辽阔的北京，找不到这些书。在富裕的中国，你可以买到一切，却买不到最新的书籍，你有数不清的电视频道与报纸，却不能在上面讨论任何严肃话题，所有的欲望都被鼓励，除了探求人生的意义、社会的目的的话题。这正是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的职责与人生意义所在。

是我的虚荣作怪吗？在中国崛起的这个故事中，我们的角色令人可悲地弱势，甚至全然缺席。印度的存在，像是提醒我们的状况。“印度是个多元社会，它创造出了民主的魔力，法治和个人自由，社群关系与多元文化。这是个多么适合知识分子的地方……我不介意在这里重新发现印度十次。”一位美国大使在离开新德里前，这样说过。

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呢?我们该怎样重新发现中国，辩论关于我们国家的一切？我们差点忘记了，自由的争辩，也是人类的尊严所在，即使它不比食物、居所、性更重要，也至少同样重要。

（许知远，《生活》杂志联合出版人，《亚洲周刊》与《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原文链接：http://cochina.org/?p=763）

➢➢

此电子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Co-China 论坛开始于 2009 年 8 月，每月在香港举办一场公开讨论，并借助网络视频直播、文字直播等方式放大现场。目前已举办二十场论坛，嘉宾有艾未未、长平、陈冠中、贺卫方、胡泳、梁文道、廖伟棠、卢思骋、闾丘露薇、毛向辉、欧宁、潘毅、冉云飞、宋以朗、许宝强、叶荫聪、张铁志、周保松、朱大可、朱凯迪等。 下一场论坛将于 6 月 11 日下午 2:30 在湾仔轩尼诗道 365 号 9 字楼举行。

Co-China X In-media：女性主义——在大陆和香港之间

也许“女性主义”会让你觉得有些陌生，但你一定知道“包二奶”、“性骚扰”、“计划生育”，也一定听说过遗弃女婴、性别歧视。其实，性别议题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因为地缘关系，加上这些年中港之间日益频密的往来，香港和大陆之间，尤其是临近的广东，在这方面又有些独特的现象。比如《天水围的夜与雾》里呈现的中港合璧的家庭，比如来港产子的大陆孕妇，比如在老板多为男性的港资企业工作的女工。本期论坛邀请中港两地的专业人士共同探讨这些跨地域的性别议题。

讲者：

蔡泳诗：香港新妇女协进会主席。关注性别歧视、性骚扰等妇女问题，通过政策评议、教育讲座、行动倡议、调查研究等途径致力于消除女性在各个层面受到的歧视。

李军：《南方都市报》记者，广州新媒体女性网络发起人。李军力图在工作实践和社会活动中倡导性别平等，改变文化偏见。她策划组织了“10 位女性的声•鸣”，“打工族影像：她们的故事”等性别维权活动。

林蔼云：香港独立媒体创办人之一，民间记者。林蔼云关注女性议题，对网络在促进公共空间性别意识方面的作用尤有兴趣。

吕频：妇女传媒监测网络负责人，主要从事与妇女权利有关的倡导活动。吕频编辑了基于社会性别和妇女人权观点的独立电子周报《女声》，同时为大众媒体撰写时事评论，传播性别平等的观念。

主持：
叶荫聪：香港独立媒体执委，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讲师。
杜婷：「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负责人。

时间：6 月 11 日（周六）下午 2：30——5:00
地点：湾仔轩尼诗道 365 号 9 字楼
twitter 直播账号：@CoChinaOnline (http://twitter.com/#!/CoChinaOnline)
新浪微博直播账号：CoChina 論壇（ http://t.sina.com.cn/1729620664)
视频直播：http://make.tv/cochina
音频直播：http://now.in/radio/cochina

注：为了丰富「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的主题，我们在固有论坛的基础上开始一个 Co-China X 系列，这些讨论、沙龙由 Co-China 同一些友好团体合作举办，Co-China 主要负责网络传播，将更多有价值的讨论呈现于网络。这次同香港独立媒体（In-media）的合作是我们的首次尝试，今后会同更多机构合作，希望这个系列可以带给大家更多元的视角和声音。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请发一封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subscribe@googlegroups.com，也欢迎大家转发分享。

论坛网址：http://cochina.org/
论坛 twitter：Co-China 論壇（http://twitter.com/#!/CoChinaOnline）
论坛新浪微博：CoChina 論壇（http://t.sina.com.cn/1729620664 ）

轮值编辑：方可成、黄隽咏
版面设计：豆弟
技术支持：毛向辉
出品人：杜婷